






伟大
也要有人懂
一起来读毛泽东

韩毓海 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 京

目录



第一章 “地才”



第二章 “惊奇者，人类之生涯也”



第三章 “其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第四章 “说空话”与“办实事”



第五章

批判地思想



第六章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第七章

父老与“子弟兵”



第八章

古田与“星星之火”



第九章

“战友乱发的流弹”



第十章

毛主席与“毛派”



第十一章

长征：意志的赞歌



第十二章

血的哲学



第十三章

安得倚天抽宝剑



第十四章

朴素的政治，朴素的文明



第十五章

人民是我们的观世音



第十六章

赶考

001

第一章

“地才”

公元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南岸上屋场。

这一天是西方的圣诞节，而按照中国的传统纪年方式，毛泽东的生辰应为癸巳年、甲子月、丁酉日、甲辰时（即当日上午7点--9点），因此，日本学者竹内实在《毛泽东》一书中说：“那是太阳在东方升起的时刻”。

与鲁迅一样，毛泽东生肖属蛇。“静若处子，动若蛟龙”，蛇也被称为“小龙”或“蛟龙”，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人们称他为天才，而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把自己称作“地才”。拥抱大地是蛇的本性，毛泽东把“大地”比作中国和人民，“静若处子”就是含蓄低调，这正是毛泽东性格的重要方面。

1973年6月22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马里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特拉奥雷，特拉奥雷说：我们非洲的人都认为毛主席是天才，而且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

法国人教导我，拿破仑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但我认为同毛主席对世界的贡献相比，拿破仑不及毛主席的三分之一。毛泽东摇头说：你把我吹得太高了。我是地才，地就是土地吧。都是人民群众的经验，我作的总结。没有人民，啥事都干不成啊！请你少吹一点了，我的朋友啊，你也不要强加于我。

一方水土一方人。毛泽东就诞生在中国湖南的大地上。

湖南地理闭塞而风光秀丽，自古号称“四塞之国”，湘、资、沅、澧四水流入洞庭湖而又汇入长江，八百里洞庭的周边，蜿蜒着五岭山脉和衡山山脉，这里有中国五岳之一的南岳山，在三湘四水美丽的大地上，覆盖着浓密的树木，苍翠的竹林、茶山和果园，散落着色彩斑斓的稻田、棉田、麻田和菜地。毛泽东诞生的时候，湖南已经有3000万人口，这里山高流急，民性倔强，“吃得苦，霸得蛮，不怕死，耐得烦”这四句话，是对湖南民风的经典概括。

湖南又称楚地，“惟楚有才”一句，出自《左传》。楚地最著名的人物是屈原，他的诗篇以湖南的山河为背景，以香草美人为比兴，以长歌咏叹变四言，铿锵鼓舞，屈原是中国浪漫主义的鼻祖。毛泽东19岁时所做《讲堂录》笔记，前11页便是手抄的屈原《离骚》和《九歌》，而毛泽

东本人的诗歌，也鲜明地继承了屈原的风格。

1975年7月，82岁的毛泽东在与芦荻谈到自己的一首诗时说：“人对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侣，感情总是很深的，很难忘记的，到老年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

毛泽东当时谈到的那首诗，题为《七律·答友人》，写的正是湖南：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支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虽说四周皆山，地理闭塞，不过，近1000年来，湖南却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中心，把湖南看作是中国的“新儒学”——理学和心学的主要策源地，其实也并不为过。

理学的开山人周敦颐即是湖南道州人，他是《太极图说》和《通书》的作者，他的《爱莲说》，至今是中国孩子们喜欢诵读的美文。公元976年创办的岳麓书院，是中国四大书院之一，1167年，朱熹曾经在此与书院主持人张展开辩论，是为“朱张论学”。1507年，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在此讲学弘法，明末清初的王船山以《读史通鉴》总结中国历史，晚清的魏源，则以《海国图志》和《圣武

纪》开辟了思想和知识的新局，从此，湖南便以“经世致用”的新风引领中国的思想与学术，岳麓人更以“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而自豪于乡曲。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理学思想的核心是：通过读书和学习，人人皆可成为圣贤，而圣人不过是肯用功学习的常人。毛泽东毕生提倡学习和“改造我们的学习”，他正是一个酷爱读书的湖南人。

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说：我是中了书的毒了，离不开书。他指着周围书架及书桌上的书说：这是《稼轩》，那是《楚辞》。于是在座的大家都站起来，参观毛泽东的各种藏书，田中感慨说：今天使我感到，不能借口忙就不读书了，要好好读书才好。毛泽东这时便说：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楚辞集注》）送给你吧。

田中后来回忆道：毛泽东这是借屈原的例子，含蓄地

把美日关系比作秦与楚的关系，从而提醒我：日本不要被美国所绑架。与美国混在一起，最终吃亏的还是日本。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为两事”。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主张“六经皆史”，史即“事”也，人只有通过劳动、行动和做事才能表现他自己，空谈误人，空谈误国。毛泽东的《实践论》继承了王阳明的《传习录》，他毕生倡导“实事求是”，他是个辛勤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息的湖南人。

近代以来，湖南又以“湘军”闻名。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左宗棠平定了新疆，民国初期的湖南才子杨度，曾做《湖南少年歌》道：“我家数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湖南其实是个“兵窝子”。

中国历史上长期文武分治，居于领导地位的士大夫阶级是个动脑不动手的阶层，而这种风气到了近代湖南，方才为之一变。曾国藩的追求是：“朝出鏖兵，暮归讲道”，“上马杀贼，下马读书”，而毛泽东则将此发展到极致：以思想和学问治军，将战争升华为哲学。

湖南独立的自由思想，不磨的斗争志节，培育了“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的毛泽东。

韶山，是湘江边的一座大山，韶峰高达两三千米，是南岳 72 峰之一，韶山绵延 20 里长，如水流泻地，故名“韶山冲”。韶山的落脉处是一座树色苍茫的小山，叫韶山嘴，一条清澈湍急的泉水，经韶山嘴，弯弯曲曲，向东南奔去，在韶山嘴的对面，就是山水环抱的南岸，那里有一栋半瓦半茅的青色房屋，叫做上屋场，那时，在这所房子里住着两户人家，以堂屋的正中为界，一家姓毛，一家姓周。

毛与周，不分家。而日后改变了中国和世界历史的那个属蛇的孩子，就诞生在这里。

韶山毛氏的兴起，可以追溯到明初征伐云南的时代，明洪武十三年（1380 年），韶山毛氏的始祖太华公，因为军功，由云南澜沧封官入湖南，而至今云南澜沧江畔，还有一个村子叫“毛家湾”，据说，那里就是韶山毛氏的起家之地。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生于 1870 年，他当过兵，是个勤劳节俭，吝啬苛刻的富裕农民，他脾气火爆，欺压自己的妻子和儿子是家常便饭，毛泽东毕生对这个粗暴的家长缺乏好感，以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

经这样说：我的父亲如果活在今天，就应该坐“喷气式”。

毛泽东的母亲文氏，1867年生于湖南湘乡四都唐家坨，此地与韶山冲相距10余华里，仅一山之隔。因在家中排行第七，小名叫文七妹，她没有念过书，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她没有自己的名字，直到1966年，到韶山串联的红卫兵质问韶山毛泽东故居解说员高菊村说：毛主席在与斯诺谈话时，明明说过自己的母亲叫文其美，你怎么能说毛主席的母亲没有名字呢？

毛泽东的母亲是有自己的名字的，不过，文七妹只是她的小名，1936年，毛泽东与初访保安的斯诺谈话时的翻译黄华是河北人，因南北口音的不同，黄华遂把毛泽东母亲的小名翻译为了“文其美”。

毛泽东母亲的真名叫文素勤，1939年，毛泽民在苏联养病时，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曾分别为自己和毛泽东填写了一份详细的履历表，而在母亲姓名一栏里，填写的就是“文素勤”。

文家家境小康，因为祖先葬在韶山冲，每年总要祭拜扫墓，就想在当地找个落脚点，于是，便将文素勤许配给了毛贻昌。

毛泽东的母亲善良、宽厚、美丽、智慧，长着中国

女性最羡慕的梨子型脸庞和佛陀一样感人的眼睛，哲学家梁漱溟初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即为他俊美的形象所震动，称其“貌如妇人好女”，的确，毛泽东的相貌，主要是继承了母亲的形象。

在毛泽东诞生之前，文素勤生下了2男2女，但是，长子、次子和两个女儿都不幸夭折了，这对她造成了很大的打击，毛泽东刚刚出生，母亲便抱着襁褓里的婴儿，拜韶山龙潭前的一块巨石为“干娘”，并当即发愿：为保此子平安，立誓从此食素，永不杀生。

这块巨石名为“观音石”，从此，毛泽东有了乳名“石三伢子”。

毛泽东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甚至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作和尚。母亲虔诚的信仰对毛泽东影响巨大，毛泽东少年时代，文氏得了重病，于是，虔诚的儿子便一步一叩首，上南岳拜佛以求母亲平安。

毛泽东在中国深刻的传统中诞生，这种传统包括在湖南兴起的新儒学，而且这种新儒学中更融合进了强烈的佛学因素。这就特别表现为“理学”与“心学”的不同。朱熹认为，每个人通过刻苦读书便可成为圣贤，因此，他方才说“满街皆是圣人”。而王阳明则因为受到佛学的影响，

转而认为劳动、做事就是修行，而那些毕生辛勤劳动的人，就是圣人。

众生平等，卑贱者最聪明，劳动者是最高贵的人，毛泽东青年时代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批注说：“小即大”，“上即下”，“我即宇宙”，“万即一”，“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后来他又说，“六亿神州尽舜尧”。

毛泽东没有像母亲所期望的那样作和尚，而是成为了革命家。1938年，他曾对埃德加·斯诺这样说：我成为一个革命者，就是受到我母亲的影响。

1910年，16岁的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远行，从韶山出发，去邻县湘乡，就读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父亲阻挠他，甚至逼迫他交出因为去湘乡上学而“误工”的工钱，而母亲支持他，于是，文家的亲戚帮助他筹措了这笔“工钱”。

临行前，毛泽东把一首诗悄悄夹在了父亲精心保管的账簿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必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据说，这是西乡隆盛的诗，西乡隆盛，被称为日本乃至世界上“最后一个武士”。而实际上，这本是一位日本

高僧的诗作，西乡隆盛只是抄写了它。而毛泽东却把这首诗改了一个字，即把学不成名“死不还”，改为了“誓不还”，

父亲精心保管的那个账本留了下来，1968年被订为“绝密”资料，长期被封存于韶山纪念馆文物保管室。

这份账本则详细记录了毛家的收支情况，1921年，毛泽东率弟弟和妹妹离家投身革命后，韶山家里的房屋和20亩水田即由外婆家和毛震公祠代管，账本的记录显示：到解放前夕，毛家已经欠银4739元，即使将家产全部卖掉，所得也只有3380元，仍背负着1359元的债务，因此，韶山土地改革之前，毛泽东家实际上已经沦为赤贫，而毛家土改时被划为“富农”、毛泽东出身“富农”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曾国藩是湘乡人，他极为重视在湖南和湘乡推行“新学”，东乡高等小学堂便是一所新学堂，而毛泽东则是这所学堂里唯一的湘潭人，他口音不同且衣着寒酸。但毛泽东入学时写的一首命题诗，却使举坐皆惊，这首诗叫《咏蛙》：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

毛泽东有“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在当时阅读的《新民丛报》关于“国家”问题处，留下了他如下批写：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国家也，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是他第一次讨论传统王朝与现代国家的区别，以及宪法与人民的关系。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只读了半年，便就继续挑着他简单的行李，去了更远的地方——湖南省城长沙，那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了，毛泽东受到革命的鼓舞，短暂地参加了新军，退伍后，他花了一块钱投考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并以考试成绩第一名被录取。在那里，他写了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而这是目前所见毛泽东早年唯一一篇作文。

在这篇作文中，毛泽东继续讨论了法律、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之衰落，乃是因为执政者与人民之间缺乏信任，这就集中表现为人民不相信法律，因为法律建立在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上，而那样的法律，只是分裂国家与社会、人民与执政者的工具。

根据这样的观点，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商鞅的“农战”法令，他认为商君法的实质，就是“农战”面前的人人平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之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人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拏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

尽管饱受儒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中最为毛泽东青睐的一家，无疑便是法家。在留下的第一篇作文里，毛泽东之所以高度肯定了商鞅和法家，是因为商鞅颁布的“农战”法令具有深刻的平等思想，“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没有谁是天生高贵的，只有那些辛勤劳动和英勇战斗的人，才是值得尊重的，而商君法的实质，就类似于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1931年11月，刚刚当选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的毛泽东，第一次主持立法，就是制定和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土地法》，中国的女性和无地的农民，第一次有了土地所有权以及选举和被选举权，实现了由法律保证的平等。

当时毛泽东这样说：

同时，广大妇女群众参加了生产工作。这种情形，在国民党时代是决然做不到的。在国民党时代，土地是地主的，农民不愿意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良土地。只有我们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对农民的生产加以提倡和奖励以后，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才爆发出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则规定工人有监督生产的权利，可以享受免费医疗、失业津贴、伤残抚恤、婴儿补助、困难救济、丧葬津贴。

工农和女性获得了上述权利，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主持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这项法律规定：中央苏区必须把土地税收的五分之一用作教育经费，毛泽东和他的老师徐特立，还直接参与编写了一套完整的教育大纲，其中除了数学、语文外，还有生理卫生、园艺、商品、速记和演讲课程。

在语文课本里，苏区的小学生们念的是这样的“毛版”新三字经：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

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进行人口普查，统计人口为六亿零一百九十一万二千三百七十一人，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选民登记，并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普选。

1954年9月15日，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建立在全民普选基础上的宪法，在毛泽东主持下诞生，而此前，全国有一亿五千多万人参加了这部宪法草案的讨论。

以革命造成人民的空前平等，并以法律保护这种平等，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革命者的毕生追求。

1974年5月3日，毛泽东与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谈话，当时，毛泽东坚持说，基本粒子不“基本”，因为它一定是可分的。

1977年，在夏威夷开的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则说了这样一段话：

“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统一。”

毛泽东不会想到，他自己会为理论物理学的发展划出一个时代。而他也不可能想到，他与李政道的缘分，还会

以另外一种方式持续下去。

2015年，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James Lee）通过大数据分析提出，在过去的150年里，中国的教育结构发生了四次大的变化：

1865—1905年，即清政府废除科举之前，超过70%的教育精英是官员子弟，他们主要来自全国各地的“绅士”阶层。

1906—1952年，超过60%的教育精英是地方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他们主要来自江南和珠三角地区。

1953—1993年，则是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约超过40%的教育精英来自全国的无产阶级、工农子弟。

1994—2014年，超过50%的教育精英来自各地区的有产家庭，与特定的重点高中。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长时段统计。

而做出上述发现的李中清教授，就是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的儿子。

今天，毛泽东这个名字依然令人颤栗——有人出于热爱，以至于说起他不禁热泪盈眶，当然，也有人出于憎恨，甚至说起毛泽东来则“恨得要死，怕得要命”。而无论热

爱还是憎恨，却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平等或“均平”的时代。

南怀瑾说，毛泽东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所未有、人类历史上所未见的三大奇迹：一，看病不要钱，二，上学不要钱，三，干部与老百姓“共穷”。尤其是第三条，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这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也不可想象的。干部不但以身作则参加劳动，且生活方式与劳动者几无不同——这是空前的平等。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在与江青谈话时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接着，毛泽东念了新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像历史上那些开天辟地的伟人一样，毛泽东的思想是早熟的，更是特立独行的。而他的思想就形成于湖南这片人杰地灵的沃土，如果说有一个经世致用的“湖湘学派”，或者有一种“湖南学风”，毛泽东毫无疑问是集大成者。

毛泽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者，但更是最伟大的继承者，而且，他对于传统的态度和理解，一旦形成，终生

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

1945 的毛泽东留下了这样一张照片，他头戴八角帽，脖子上随意地围着格子围巾，与一群蓬头垢面的农民挤在一起看戏。

这张照片后来出现在美国的杂志上，冠之以令人感慨的命名：“大地与平等”。



019

第二章

“惊奇者，人类之生涯也”

《商鞅徙木立信论》那篇雄文得了100分，语文老师为此写了7条夸赞的批语，也许这并不稀奇，因为毛泽东的作文总是得100分。

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也仅仅是读了半年，毛泽东就离开了这里，因为他要思考“宇宙”这个大问题，而这个题目，恰恰是学校教不了他的。

学校使毛泽东感到厌倦的更主要原因其实是：当时的新学堂流行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它把达尔文《物种起源》中对生物学的研究移植到人类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据说，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

然而，这种把人等于“动物”的思想，却与毛泽东所受到的深刻的中国传统教育相抵触，这造成了青年时代毛泽东第一次思想和精神的危机，毛泽东第一次对西方思想产生了怀疑，其实就是从他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退学这个时期开始的。

离开西学堂，毛泽东为自己制定了一个严格的自修计划，他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早上图书馆一开门就进去，中午只是买两块米糕充饥，算作午餐，直到图书馆关门才出来，就这样，毛泽东的读书自学持续了半年之久。

湖南省立图书馆门厅里，挂着一幅《世界坤舆大地图》，毛泽东每天走到地图前，总要驻足良久，陷入沉思：世界如此之大，如果这只是一个奉行丛林法则的动物世界，它能够存在下去吗？如果世界上的人生活得如动物一样，这种人生有意义吗？这样的世界难道不应该改造吗？

1951年，已经成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北京与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的老同学周世钊等人谈到这一幕时，依然感慨万千。他说：

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未曾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

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了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过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

决不！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那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从上述决绝的语气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充塞在青年毛泽东心灵里的那种巨大痛苦和抱负，而在那个时候，母亲的信仰或许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只不过，当这个20岁的青年以佛陀的目光凝视这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动物世界时，他的心却不是寂灭、消沉下去，而是一日日的澎湃、长大起来。

毛泽东在自修时苦苦思索的问题是：如果说宇宙的本质就是“物质”，那么，“人类文明”的地位究竟何在呢？

如果人是一种生命的存在，那么人这种生命的存在，又与动物有何区别呢？

那时的毛泽东，就像一个修炼武功秘籍的少年一样，把自己封闭在图书馆里废寝忘食，苦苦思索着“宇宙问题”的答案，而一时却没有令自己满意的结论。

图书馆半年“闭关”之后，毛泽东又在几所学校报了名，并分别交了一块钱的报名费。这些学校五花八门，有商校、警察学校，甚至还有一所学习造肥皂的学校，最终，毛泽东选择报考了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因为那里不收学费且膳宿费低廉。

毛泽东后来说：“有两个朋友也鼓励我投考，他们需要我帮助他们准备作文，我替那两位朋友写了作文，也为自己写了一篇。3个人都录取了——因此，我实际上是考取了3次。那时候我并不认为我为朋友代笔是不道德的行为，这不过是朋友之间的义气。”

显然，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把“同志”当作一个最庄严的称呼，他还没有用“同志”这个词，来代替“朋友”一词，他也还没有像后来那样，把同志之间共同的信仰，置于哥们情义之上。

毛泽东报考师范学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经过深

思熟虑，认为自己此生最适合做教员，实际上，直到晚年他还说：“我的理想是做教员，没想到要做党的主席。”他还说过：“四个伟大，讨嫌！统统去掉，只留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

毛泽东入学半年之后，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与第一师范合并，更名湖南第一师范学校。1913-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了五年书，他对湖南第一师范的感情很深，毛泽东后来赞美这所学校说：我没有读过大学，但湖南第一师范，比较当时一般大学的水平却要高得多。

“一师是所好学校”。正是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对“宇宙问题”的思考终于有了答案，他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宇宙观。

1917年秋天，24岁的毛泽东一面听讲杨昌济老师的修身课，一面在这门课的教材《伦理学原理》上做了大量的批注，《伦理学原理》是德国哲学家泡尔生（1846-1908）的代表作，而毛泽东的批注，则结合这部作品，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人生观和宇宙观。

宇宙的本质是什么呢？毛泽东回答说：宇宙的本质就是变化。

他这样写到：

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成毁灭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也，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

既然宇宙的本质是变化，既然“毁非灭也”、“死非灭也”，那么，对于变化、成毁乃至死亡，便不应取消极悲观之态度。

什么是人的意志呢？毛泽东说：意志，就是人对于变化所怀抱的积极态度。

毛泽东还极为独异地说，意志起源于“好奇心”。

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中这样写到：人生如攀高山涉大海，人生如探险，充满逆料，但这也正是人生之奇绝之处，“平和”并不是人生所要追求的境界。

而毛泽东则在这一段的旁边批注说：“此数句可证人类以惊奇为贵。惊奇者，人类之生涯也”。

“惊奇者，人类之生涯也”，毛泽东立志追求波澜壮阔的人生。

当时之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而毛泽东则倡议拥抱这样的时代，他呼吁以强大的意志，去直面这样一个令人震惊和“惊奇”的时代，他认为，失败不可怕、变局不可怕，既然“死非灭”、“毁非灭”，故“巨

变”不足畏，而只有不变和僵化才是最可怖的：

国家有灭亡，乃国家现象之变化，土地未灭亡，人民未灭亡也。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今之德意志即从前之日耳曼也，人民犹是也。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伦理学原理》认为，变化可以唤醒古老的民族，震惊则可以促使之觉醒，而反过来说，一个民族的退化，一个时代的衰老，就是因为它对于世界丧失了新奇与震惊的感觉，从而归于麻木：

征之历史，国民皆不免有老衰萎缩之时，若思惟行为一定之习惯，若历史沿袭之思想，若构造，若权利，与时俱增。于是传说足以阻革新之气，而过去足以压制现在，对待新时代之能力，积渐消磨，而此历史界之有机体，卒不免于殄灭。当是时也，各人又安有能力，用以生殖传衍，本旧

文明之元素，以构新历史之实质耶？人类全体亦然。虽非历史所能证明，而以此论推之，知其不免于绝灭。征之物理学，恒性及太阳系，皆当历生长老死之阶级。其生也，自他星体而分离，由是发展焉，成熟焉，经无量数之生活，而乃老衰焉，萎缩焉。若地球，若人类，亦莫不然。

毛泽东则认为，中国正处在这样的时刻，他说，中国人之麻木，就在于其缺乏意志力，而所谓缺乏意志力，就是指中国人缺乏面对变化的勇气，丧失了对变化着的世界的“好奇心”和“惊奇”感。

而这样的人生是僵死的人生。

泡尔生说：假如人生可以规避一切危难，一切失策，那么，所谓努力、冒险、所谓对于胜利的喜悦和对于失败的沮丧，也都会随之被消灭殆尽，而那样的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呢？

如果胜利不由斗争而得来，那种“无抵抗之成功，则必深厌之”，就好比下棋知道每局必胜，打猎已知每猎必获，如此一来，下棋和打猎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呢？

而毛泽东在这一段旁批注说：“此缘吾人有好变化，好奇之心。人不能有俄顷不变化者”。

从此，毛泽东形成了这样观点：求知是人类意志支配

下进行的活动，如果泯灭了好奇、求变的意志，也就没有知识的进步。

在毛泽东看来，当下之中国，并非缺乏读书人，中国的问题在于读书人头脑保守僵化，他们沉溺于固定的知识范式和程式中不能自拔。中国缺乏的也不是一般的知识，而是批判地对待知识的态度和求变的勇气。

泡尔生把人类斗争的意志称为“抵抗力”。他说，“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姑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

如果土地能自动长出庄稼，就无所谓农业，如果自然气候适应人体，那么就无所谓建筑，如果上天把一切都替我们准备好了，就无所谓人类文明。如果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是仙境，那么，人类恐怕还处于蒙昧状态。

正因为我们居住的不是仙境，所以，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人类的意志力才得到发展，正如洪水使我们建造堤坝，火灾使我们改进建筑一样——正是斗争的意志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创生。

而毛泽东在这一段旁，慨然批注说：“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益增其怒号”。

泡尔生又说，正是随着人类势力的增加，外界抵抗之

减弱，所谓的“仙境”和“大同世界”终将形成。

而泡尔生的这种看法，却是毛泽东不能同意的。

他这样批注说：

“此不然。盖人类之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

毛泽东随即便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宇宙的本质是变化，而变化的根源则在差别，没有差别，也就没有变化，而没有变化，就没有宇宙与人生。

他据此质疑佛教所谓“平等即无差异”之说：

“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佛言泯灭差别，不知其于道德界善恶问题如何处之？”

变化的根据就是差别，所以，没有差别的世界是不存在的。而这就意味着：所谓“大同世界”、“自由平等博爱之说”，就像泡尔生所谓的“仙境”一样，也都是不存在的，毛泽东说，与其说那是理想，不如说那是一种“谬误之理想”：

然则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用不能绝，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乎？有之，其惟仙境。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

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往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

之时，而想往平安。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又生出波澜来。然大同亦岂人生所堪乎？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相处于大同之境矣。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即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史时，恒赞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相争之时，事态百变，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

这段话令人深思。因为它无疑通向毛泽东晚年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辩证法，但更重要的却是毛泽东在此所阐释的深刻道理——沉迷于安逸和宁静，是通向僵化保守之歧途，畏惧变化与斗争，乃是腐败堕落之征兆，不敢正视矛盾，则是陷入蒙昧的根源。

因此，承认变化、矛盾和斗争，此“非好乱也”，因为这就是宇宙的真谛，是人心的本来。

正是站在宇宙论的角度，24岁的毛泽东深刻地思考了死亡。

毛泽东认为，死亡体现了宇宙变化的实质，正是死亡提示我们变化之不能停止，正是死亡告诉我们有未知之世界在，也正是死亡提示我们，我们所拥有的知识总是有限的。

他说：死亡乃“人生未尝经验之奇事也，何独不之好奇乎？”“人类者生而有好奇之心，何独于此而不然”？

直面死亡——毛泽东的“好奇心”可谓大矣，正是基于这种博大的好奇，他指出：人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是没有完结的，以宇宙之广大，现实世界不过只是宇宙之一隅而已，除现实世界之外，尚有其他未知之世界在，而死亡就时刻提醒我们那个未知世界之存在，真正的大知，是敢于直面未知世界之知。

而毛泽东的这种觉悟，正可谓是“大智”导向了“大勇”。

在中国思想中，如此深刻地思考死亡的文献是不多的，何况当时做出这种深刻思考的毛泽东只有24岁。

24岁的毛泽东这样说：

宇宙间非仅有人生一世界，人生之外之世界，必尚有各种焉。吾人于此人生之世界已种种经验之，正应脱离此世界而到别世界去经验。人生不死，长住于此老旧之世界，

无论无时代之变易则无历史之生活，其内容非吾人所能想象，即曰能之，永远经验一种生活，有何意味乎！倘以为死乃痛苦之事乎？是殊不然。吾人未有死之经验，如何之其有痛苦？且吾以理推之，以为死之事未必痛苦也。盖生死为两大界，两界之中间由生递嬗至死，其事当必至渐，其距当必至微。老人安然寿终，在一种自然状态之中，其事当必如此，然则有何痛苦哉？吾尝推人之所以甚畏死者，非以痛苦乃以变化之剧大也。人由生之界忽然而入死之界，其变化可谓绝巨，然苟其变化之后，尚可以之其归宿之何似，则亦不至起甚大之畏惧。今乃死后之事毫不可知，宇宙茫茫，税驾何所？此真足以动人生之悲痛者也。虽然，吾意不如此焉。人类生而有好奇之心，何独于此不然？吾人不常遇各种奇事而好之乎？死也者，亦吾有生未尝经验之奇事也，何独不之好乎？无论其无痛苦，即有痛苦，此痛苦诚亦奇境，虽前途黑暗不可知，此黑暗不可知之世界，不诚又一奇境。或者乃惧其变化之巨，吾则以为可贵，于人生世界之内，向何处寻此奇伟之巨变，于人生世界所不能遇者，乃一死遇之，岂不重可贵乎？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况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引以为壮乎！

死“亦吾有生未尝经验之奇事也”。故死不足畏，而

直面死亡，不过是直面一不可知之“奇境”；敢于直面死亡，也就是敢于直面宇宙的本质，就是敢于直面无穷尽的未知世界，这便是以包纳宇宙的襟怀，直面人生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

而这不禁让我们想起毛泽东后来的那些名言：

“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这就是24岁时的毛泽东。

当时，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这样写到：“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此言学皆起于实践问题，故皆范于伦理学”。

而20年后，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则这样指出：实践这种认识活动的基本特点，主要的不是“实现预想的目的”，而是“在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

用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话来说，实践，就是不断面对和发现宇宙人生之“奇境”。

当年，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这样说：宇宙即差异。

而20年后，他在《矛盾论》中则说，矛盾的普遍性，是指世界就是差异。

我们当然不能说，毛泽东在24岁时就已经形成了他的思想，而在此后的20年里，毛泽东的思想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但是，这些保留下来的批语的确显示出：当时只有24岁的毛泽东，已经开始尝试在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的矛盾和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创立一种“新学”，这种“新学”虽说还不是后来的“毛泽东思想”，但很显然，毛泽东立足于宇宙和世界大势，开一代学风和文风，创立一种崭新学说的抱负，在他24岁的时候，就已经呼之欲出了。

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又说：人之“天性”，即宇宙之本性，人之意志，即“自然之冲动”，故宇宙之本性、人之意志，实则为一，而这就是“生命力”，而人生就在于发扬蹈厉这种生命力：

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其蹈厉，催陷廓清，其强如大风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绝不可能有阻回者。苟阻回之，则势力消失矣。吾尝观古来勇将之在战阵，有万夫莫当之慨，发横之人，其力至猛，谚所谓一人舍死，百

人莫当者，皆由其一无顾忌，其行动为直线之进行，无阻回无消失，所以至刚至强也。豪杰精神与圣贤之精神亦然。泡尔生所谓大人君子非能以义务感情实现，由活泼之地感情之冲动而陶铸之，岂不然哉，岂不然哉！

生命力贯通宇宙与人，故我即宇宙，“宇宙即我也”，故“知我”就是“知天下”，知天下，也就是“把天下事当作我自己的事”。

毛泽东的这种议论，使我们想起王阳明的话：

盖知天之知，如知州、知县之知，知州则一州之事皆己事也，知县则一县之事皆己事也，是与天为一者也。

宇宙是一生命力，我之意志，亦一生命力，故“我与天为一”。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在宇宙运行的滚滚巨流面前，站起来了24岁的毛泽东。

与批注《伦理学原理》同时，毛泽东还写了一篇长达4000余字的作文，名为《心之力》，这篇作文震动了全校，他的老师杨昌济，先是为这篇文章判了100分，后来又加上了5分，以体现对这篇文章无以复加的赞许。

《心之力》一文在当时被广为朗读传抄，根据周世钊、罗章龙等一师校友的回忆，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这篇宏文

的磅礴气势。

王阳明说：“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大道”，即宇宙的运行，这就是生命力进入物质，并改造物质的运动过程，而它的最高成就，就是人心——即人的心智的发展。

宇宙之道，就是生命力的运行和进化，而它的最高成就，便是有心智的人，是人的心智的进化和培育——而这就是文明的成就与硕果。

在青年毛泽东看来，求知，就是永远保持对于未知世界的惊奇，而人生，就是为创造新世界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被同学们称作“毛奇”，意思就是“宇宙中的奇男子”。

老师们格外赏识他，而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则是教授伦理学的杨昌济和教授国文的袁仲谦二位先生。在保留下来的听课笔记中，毛泽东记录了国文老师的见解：

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夫子以好学称颜回，曰不迁怒，不贰过，盖行事之大难者也。

这表明，湖南第一师范，特别是杨、袁两位老师传授给他的，与其说是知识和学问（理论），还不如说是对待生活和人生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埋头苦干的品质（实践）。

在青年毛泽东那里，我即宇宙，天地与我为一，生命力充塞于宇宙之间，“在天为日，在地为电，在人为心”，故游乎自然天地之间，便可培育强大的心灵和“抵抗力”。

听课笔记里这样说：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袁仲谦和杨昌济，都把培育和塑造学生的心灵和意志力作为教育之根本，而为了发现、培育心灵和意志的力量，杨昌济还发明了一套独特锻炼方法：他废止朝食，行深呼吸，主张静坐，常年行冷水浴，冬天也不间断。

在学习、追随老师方面，毛泽东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暑假期间，他与另外两个同学同住湘江岸边岳麓山上的爱晚亭中读书，每天仅吃新蚕豆饭一顿，既废朝食，也不晚餐，毛泽东更把“浴”扩大范围，在太阳下，大风里，暴雨下，赤膊而立——毛泽东把这叫做“日浴”、“风浴”和“雨浴”。

岳麓山上有一幅对联：“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在岳麓山上，爱晚亭下，毛泽东等一天早晚的生活，

便是体操、静坐、读书、看报和讨论问题。夜里，他们就露宿在草地上，彼此离的远远的，以与宇宙相接，吸纳天地之气。

于是，毛泽东在当时的日记中这样写到：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在24岁的毛泽东看来，中国固然面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此不足畏也，不足叹也，不足悲观丧气也。

恰恰相反，这种变局，正为青年一代提供了焕发斗争意志和“抵抗力”的千载难逢的大舞台。

面对大厦将倾，面对江河日下，毛泽东呼唤他的学友们站起来，“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在听课笔记《讲堂录》中，还记载了这样一段极有洞见的话：

中国固自由也，人民与国家之关系，不过讼狱、纳赋二者而已，此外无有也。故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惟无关系也，故曰缺乏国家思想、政治思想。中国自由，西国专制；中国政法简，租赋轻，西国反之。

被征服的民族不自由，言其近例，台湾朝鲜是也。

中国待属国甚宽，苞茅贡聘之外，均听其自治，越南、高丽是也。越南归法，五人聚语有禁，藏兵器者有禁，夜不得闭户，便巡查也。高丽归日，事事听其主治，而民戢戢如牛羊也，盖其苦尤有甚于台湾也。

“中国自由，西方专制”，这一论断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都属于极为“反潮流”的见解。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衰落，就在于社会缺乏组织能力，这就表现为国家与人民之间，几乎没有关系，于是，中国就没有现代国家思想和政治思想。而毛泽东青年时代形成的这种真知灼见，今天读来依然令人耳目一新。

1917年，毛泽东被选举为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此前，这个职务一直是由教师担任的。而毛泽东上任伊始，即提出应创办一个工人夜校，他的理由是：

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一入学校，俯视社会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神圣不可捉摸之物。

中国社会的分裂，就表现为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巨大差别，而现代科学技术不产生于中国，就是因为中国的读书人鄙视动手，从而使得知识与实践、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不能结合在一起，更在于知识者与劳动者，是

判然分离的两个阶级。青年时代便形成的这一观点，毛泽东坚持了一生。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王阳明说：“新民”就是“亲民”，而与天下人同心同德，就是“明明德”，也就是“亲民”。

因此，要改造中国，就必须从加强国家组织能力入手，而要加强国家组织能力，则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组织，而这样的新社会组织，应该由“新人”、或者“新民”组成。

1918年4月7日，是个星期日，这一天，毛泽东等14人，在蔡和森家开满桃花的庭院里，成立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起初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学会宗旨改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

新民学会最终发展到八十名成员，大多数成员后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如毛泽东、何叔衡）以及早期领导人（如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罗迈、夏曦等），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都在残酷的革命中牺牲了。

这就是24岁时的毛泽东：他以《伦理学原理》批注开一代学风，倡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通过对中国和西方历史的比较，提出了中国之衰败，在于“抵抗力”——国家和社会组织能力低下的独特见解。他从组织新民学会、

创办工人夜校入手，立志去创造一个新社会和新世界。

这就是24岁时的毛泽东：1917年暑假，他和另外一个同学不带一文钱，徒步走遍长沙、宁化、安化、益阳、沅江五县，行程九百多公里，进行历时一个多月的农村调查。

他后来这样回忆说：“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1925年，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执行委员及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毛泽东，再次来到长沙，他漫步湘江，再登爱晚亭，感慨系之，吟成《沁园春·长沙》一首，再现了第一师范时代“立此大心”时的豪情壮志：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第三章

“其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043

1918-1923年间，是世界和中国发生天翻地覆大变革的时代，在历史的激流中，冥冥之中的那只巨手，几乎是猝然间将毛泽东托举起来，使他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巨变。

在短短的五年间，毛泽东的父母和恩师杨昌济相继去世，从此他的身边再无长者。

在短短的五年里，他获得了令他终生骄傲且心碎的爱情，他成为了一个伟大女性的丈夫，也成为了一个伟大儿子的父亲。

在短短的五年之中，毛泽东由湖南长沙的一介书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随即又成为了中国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由一个小学教员，成为中国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中冉冉升起的新星、巨星。

这五年注定了毛泽东的一生，注定了毛泽东的人生不会在宁静的校园里度过，从此后，他便永远不可能像他自

己所期望的那样，当一个“教书先生”了。

而这巨变如风暴走过夏季宁静的原野，来的如此迅疾而猛烈，事先几乎毫无征兆。

1918年6月，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大部分成员先后毕业，而摆在他们面前的最现实的问题，便是升学或者就业。新民学会的成员都是抱负很大的青年，他们的共同意见自然是继续学习深造，而且是出省乃至出国去深造。而恰好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机遇摆在了他们面前——这就是留法勤工俭学。

留法勤工俭学这件事，与李石曾这个人物最有关系。李石曾的祖父是前清宰相李高阳，李家非常有钱，李石曾1914到法国经商，办了一系列企业，其中最著名的是巴黎豆腐公司，他从家乡河北蠡县招募了一批老乡，在巴黎生产几十种豆制品，而恰逢当时法国流行素食主义，结果豆腐公司赚了大钱。蠡县，因此也被称为北方的侨乡。

李石曾因把中国的豆腐引进到法国而发了大财，但他的抱负却是要做一个有思想、搞文化的“儒商”，他长期参与一战期间负责招募和遣散中国赴法劳工的劳务中介机构——惠民公司的经营，并在吴稚晖等人的协助下，在巴黎办了一本《旅欧杂志》，宣传劳动和互助——当时，这

就叫做无政府主义学说。而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李石曾经营的那些机构，便是“非政府组织”（NGO）。

一战结束后，法国效法美国，想把庚子赔款的一部分退还给中国，并计划在法国办一所大学，专门吸收中国学生去留学，作为著名的华商和 NGO 组织者，加之在中法两国的政界都广有人脉，这件好事就落在了李石曾的头上，于是，他专门办了一个银行，把法国的庚款存入其中，并创办了中华教育基金会，来经营这件事。

1918年6月，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应北京大学之聘，举家迁居到了北京，居住在鼓楼附近的豆腐池胡同9号。而两个月后，即这一年的8月15号，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杨门弟子”一行20余人，便浩浩荡荡追随导师而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出省，也是他第一次来到北京。

经杨昌济的托付，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介绍毛泽东等四人，与李石曾在其位于香山的别墅见面。在看了毛泽东写的赴法勤工俭学计划书后，李石曾当即答应：为湖南青年先办三处留法预备班，分设于北京大学、河北的保定和蠡县。

尽管执笔了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书，但毛泽东本人却

并没有出国留学的打算，这里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一贯主张“反潮流”而非“赶时髦”，在他看来，崇洋之风，不可放纵，中国不是一般地缺乏知识，而是缺乏“抵抗力”、缺乏独立的思想和批判的对待知识的态度，若没有对于西方文明的批判的态度，留学则很容易导致邯郸学步。

毛泽东不愿出洋留学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放心不下母亲的病，在赴京前，毛泽东写信给两个舅舅，感谢他们照料病重的母亲，并打算在秋收之后，接母亲来省城长沙治病。

毛泽东是借钱来北京的，他必须生活。于是，杨昌济再找蔡元培批了一个条子给当时的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在图书馆。

而这张便条，至今还珍藏在北京大学的校史馆里。

1918年10月间，毛泽东被李大钊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了助理员，他每天的工作便是打扫卫生，并负责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一般为二三百元，毛泽东的月薪只有八元，没有读过大学的毛泽东，就这样成为了北京大学的管理者，虽然是最低一级的管理者，他管理的是15种中外报刊，而这些报刊

在当时是非常宝贵的。

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份工作，与一般的知识分子不同，毛泽东从不鄙视体力劳动，而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匆匆走过的北大贤达们其实并不知道，早在一年之前，这位个子高高的图书管理员，就已经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这篇特立独行的文章，那篇文章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痼疾，便是体力与脑力的脱节，它使知识流于空说而不能实行，这是知识与实践相脱离的一种表现。

北大图书馆是个好地方。1920年，27岁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特使格里高利·纳莫维奇·维经斯基，通过北大的一位俄语外教（谢尔盖·波列夫伊）认识了李大钊，也正是在沙滩红楼北大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里，维经斯基与李大钊首次谈到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而李大钊还立即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找陈独秀。

而毛泽东所管理的阅览室，就在李大钊办公室的旁边。

毛泽东也就是这样结识了李大钊，他在天安门广场，亲耳聆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并阅读了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虽然在当时，毛泽东还分不清“庶民的胜利”与“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之间的区别，分不清以建立“非政府组织”

的方式改造中国，与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改造中国之间的区别，或者说——他当时还分不清“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

多年后的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发表了《时局问题及其他》的演讲，他这样说：

我讲同志们今天你们很幸福，我们那个时候中国社会给我们的知识很少很少，什么叫帝国主义者也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也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马克思，好像也没有，连马克思的名字都没有听到讲过。1914年至1917年这几年中，中国人民就在那么一个中国的情况之下，至于1914年之前就更不用说了。

正如毛泽东所感叹的那样，在北京大学，他才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这个人、有十月革命这回事。如果没有来到北大，没有近距离地与李大钊、陈独秀相处，他几乎很难成为后来的那个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著称的毛泽东。

北京大学是中国共产党的摇篮，中共最早期的干部，很多出自北大的“新青年”：邓中夏、何孟雄、张国焘、罗章龙、张太雷、伍中豪、刘仁静、黄敬等，毛泽东是其中的一个，也是最著名的一个。

刘仁静，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德文系，他是中国第一个能够以德文阅读马克思原著的人。而与他同届的张国焘，进入的则是北京大学理工预科，张国焘和刘仁静，是两个参加了中共一大的北大学生。

罗章龙，1818年考入北京大学德文系，他是毛泽东湖南一师时的校友，罗章龙在中共三大上被选举为央局执行委员。但后因反对米夫、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的作为，却走上了另立组织的歧途——毛泽东曾经不无遗憾地说：这个人后来转向了。

何梦雄，1919年入北大政治系，他与刘仁静、张国焘和邓中夏一样，是由李大钊发起的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何梦雄曾担任中共第一任北京地委书记，1931年被国民党杀害于上海龙华，年仅32岁。

邓中夏，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晚刘、张一届，他是毛泽东在北大工作期间最谈得来的朋友，后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和湘鄂西苏区的主要领导人，1933年被国民党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年仅39岁。

伍中豪，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他是比林彪更年轻的红军纵队司令，1930年战死于赣南苏区，年仅25岁。

邓中夏、伍中豪，名字大气磅礴，而其中都有一个中字。

他们都毕业于今天的北京大学中文系。

世界上没有一所学校像北京大学那样，与一个国家和一个政党的命运，联系如此紧密。

也正是在北京大学，那些敢想敢干的湖南孩子收获了他们想要的，与毛泽东同行的新民学会成员几乎都得到了公费留法的机会，毛泽东也不例外。使他放弃留学的诸多原因中，大概还有一个鲜为人们所提及，那就是他在北京，陷入了与恩师的女儿杨开慧的爱情。

半年后，当毛泽东离开北京的时候，他开始与杨开慧热烈的通信，在信中，杨开慧称毛泽东“润”，而毛泽东则称杨开慧“霞”，而“霞姑”是杨开慧的乳名。

1919年3月，在北京的毛泽东接到舅舅的来信，得知母亲的病情加重了，他于3月12日离开北京赶回湖南，并想中途绕道上海为第一批留法的湖南青年送行，而到了南京，他发现自己竟然不名一文了，更糟糕的是，他仅有的一双鞋子也被贼偷走了。不过，好运又一次解救了他，在南京火车站，他意外地遇到了新民学会的成员易礼容，他借钱给毛泽东，于是，毛泽东买了一双鞋和到上海的车票，3月下旬，在目睹朋友们登上去法国的轮船之后，毛泽东立刻启程返回湖南，赶到母亲病床前亲侍汤药。

毛泽东知道，作为长子，家庭的重担落在了自己的肩上，他必须挣钱养家了，于是，回湖南后的当月，毛泽东便开始在长沙修业小学担任历史老师，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正式的职业。

毛泽东回湖南一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了，长沙成立了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1919年7月14日，湖南省学联的刊物《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担任了这份刊物的主编。

当然，毛泽东并不是两手空空的回到家乡，北京之行虽然短暂，却使他知道了世界上有马克思、有俄国十月革命，还有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解放”和“世界革命”这种大事。

于是，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的开头，毛泽东这样写到：

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它的软化。

从那之后，毛泽东便放弃了文言写作，虽然他的典雅文章总是令人交口称赞，并使他在学校里得100分，从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北京大学归来，毛泽东改用白话写作，

只是与当时的白话文章不同，毛泽东的文章里依然有中国古文波澜起伏的气势，大气磅礴的肌理，自《湘江评论》时代起，他开始创造出对现代汉语影响巨大的“毛文体”。

而《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就是这样的例子，它的结尾以四个感叹句、四个设问句破题：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避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只不过，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新思潮”，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更准确地说，不是列宁主义，那时，毛泽东的思想还在无政府主义与列宁主义之间徘徊，而相对来说，他更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学说，即建立各种非政府组织——工会、农会、女权会、商会、学生会、教师联合会乃至警察联合会，并由这种“小联合”，逐步走向“民众的大联合”。

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改造社会，并不一定要采用革命的或者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

《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这样比较了马克思主义

和无政府主义：

平民既已将贵族资本家三种法子窥破，并窥破他们实行这三种，是用联合的手段，又觉悟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少，我们的人数是这么多，便大大的联合起来。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法国的人，叫做马克思。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人，叫做克鲁泡特金。

毛泽东像自己的母亲一样，主张“劝善”，主张“助人而不害人”，因此他当时认为：克鲁泡特金的“意思”，比马克思“更广、更深远”。

《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使人感到震动的地方在于，它把“天地与我为一”、“天下事皆己事”这一主张，以更加磅礴的气势和更加通俗地语言喊了出来：

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毫无疑问，这个时期仍然主张“劝善”的毛泽东，还只是一个温和的社会改良派，而远不是后来那个雷霆万钧的革命家。

然而，正像当时那个世界的转变是迅疾的那样，毛泽东的成长也是很迅速的，他从一个温和的社会改良派，转变为一个革命家，前后大概只不过用了几个月的时光。

《湘江评论》刚出了四期，便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了，湖南省学联也被勒令解散，而这一切都是在荷枪实弹的士兵的打砸中完成的，这是毛泽东人生中所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打击，当冰冷的枪口指向了他和他的同伴的时候，毛泽东的“劝善”梦想破灭了。

如果说有谁把毛泽东由一个温和的改良派推向了革命派，那么这第一个人便是湖南军阀张敬尧。

人生的打击接踵而至，这一年的10月5日，毛泽东的母亲文素勤病逝了，毛泽东怀着悲痛欲绝的心情奔回韶山，在母亲灵前长跪不起，日夜守灵，并和泪写下了《祭母文》。

母亲出殡那天，毛泽东写下了泣母联两幅，其中一幅

是：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需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送走了母亲，毛泽东也告别了过去的人生，他从此不再一味地相信“劝善”，11月26日毛泽东怀着悲怆回到长沙，他就立即着手重建湖南学联，并发誓将张敬尧驱逐出湖南。

12月6日，毛泽东发动湖南各校总罢课，湖南学联代表长沙一万三千名学生向全国发出“张敬尧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回校”的誓言。

同日，毛泽东率湖南驱张请愿团，离开长沙奔赴北京。

从此，那个温和寡言，写得一手典雅古文的书生与母亲一起离去了，“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而那个学佛的孩子没有丢下笔，但这支笔却从此变成了无坚不摧的猛烈炮火。

既然纯洁的精神不能“住世”，那么，这个污浊的旧世界也就不值得留恋和“改良”。现实逼迫毛泽东最终选择了《民众的大联合》中所提出的第一种方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从此立志要以革命的方式去摧毁旧世界，而这正是马克思30岁时在《共产党宣言》中许

下的诺言。

在北京，毛泽东再次见到了他的恩师，但此时的杨昌济却已重病不起，起初只是被诊断为胃病，而随后德国医院的大夫却发现：杨昌济身体的免疫系统出了大问题，且腹腔器官均已衰竭，他已不久于人世。

在病榻上，杨昌济给后来的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写了一封堪称“遗书”的信，向他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信中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杨昌济临终前郑重写下的这封“托孤信”，寄望的竟是他的两个学生，而对于自己的一双儿女却未及交待。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在北京病逝，在痛失慈母之后，毛泽东又失去了精神上的父亲，他从此只能在没有人生导师的世界上，孤独前行。

一周之后，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也去世了。这一次，毛泽东既没有赶回湖南，似乎也没有表现得痛不欲生。那一年，毛泽东27岁，父母和师长几乎是在一瞬间离他而去，巨大的痛苦使他艰于呼吸视听，这个27岁的青年无从咀嚼这种痛苦，因为人生的遭际和家庭的重担，如塌方一样落在了他的肩上，他知道，只是痛苦无济于事，虽然他现在

的处境是一贫如洗、四面楚歌，可是他必须挑起自己肩上的责任。

1920年1月25日，阴雨绵绵，杨昌济的丧仪在北京宣武门外法源寺举行。20余年前，广东新会人梁启超与湖南浏阳人谭嗣同便是在此寺相逢，并结拜为兄弟。20余年后，毛泽东在法源寺送别了自己的恩师，“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毛泽东发大宏愿，继续走上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而这就是他肩上的责任。

在送杨昌济的灵柩回湖南的半途中，毛泽东再在上海停留，为的是送第二批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为此，一贫如洗的他不得不卖掉唯一的冬衣，方才凑足了一张去上海的车票。在上海，毛泽东靠给人洗衣服谋生。他当时只是这样写信告诉长沙的朋友说：洗衣并不累，但却要来回坐公共汽车收衣服、送衣服，于是，挣得的辛苦钱就这样浪费了。

1921年1月16日，在新民学会在新文化书社举行的常会上，毛泽东还这样说过：“我很想学一宗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这种工作学好了，向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

1920年6月，穿着已经洗得发白的蓝长衫的毛泽东，

在上海拜访了《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而此前，陈独秀恰好刚刚与李大钊介绍来的维经斯基见了面。

在这个世界上，毛泽东可能是第一个喊“陈独秀万岁”的人，他们相见恨晚。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为在北京散发传单被捕，毛泽东即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被捕及营救》，文章结尾说：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兑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这可算是罪罚相敌了！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绝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高至坚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实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实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在上海，毛泽东与陈独秀谈话通宵达旦。这两个书生，一个曾经因为“劝善”而几乎送命，而另一个则因为主张科学和民主进了班房，惺惺相惜、痛定思痛，共同的遭际

教育了他们，使他们认识到：“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只有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才能救中国。要追求真理，必须进行斗争，而真理在掌握世界之前，必须首先武装自己。

正像鲁迅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是世上最明快的哲学，因为它立足于最朴素的道理：人是要吃饭的，不劳动者不得食，而人吃不上饭，那就要革命。

而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读过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经李大钊的介绍，他也已了解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此前，毛泽东一直在寻求通过批判西方思想而为人类解放提供光明出路的“宇宙大道”，但却没有找到。如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大道，而且，与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毛泽东有着深邃的哲学天赋、深刻的历史修养和灿烂的文采，在毛泽东读过的西方思想家中，除了马克思之外，还没有哪一个人同时具备真理的明快、哲学的深邃、历史的视野和逼人的文采。

这时的毛泽东认识到：正如差异推动了宇宙的运动一样，社会差别导致的阶级矛盾，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从那时起，毛泽东就成为了马克思毕生的读者，成为

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奉者。而且，毛泽东对于马克思的理解，甚至与李大钊和陈独秀也不相同，因为后者当时所信奉的，主要还是马克思的政治学说，而为毛泽东所信服的，却是马克思哲学的深邃和历史的视野，这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这次长谈是毛泽东一生的转折，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次转折，因为就在那次谈话中，陈独秀提出：要立即在中国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党。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当时的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了任何人。”他还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这一年的6月11日，张敬尧被驱逐出湖南，7月，毛泽东离开上海返回长沙，并于8月初回到韶山。

“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南岸上屋场的老屋犹在，但父母却已经双亡，毛泽东与弟弟们商议说：留在家里种田是没有出路的，大家必须一起出去做事，欠别人的债，马上还清，而别人欠我们的，则一笔勾销。就这样，毛泽东带着弟弟和妹妹离开了故乡韶山。

从1920年9月起，毛泽东被母校湖南第一师范聘任为校友会会长、一师附属小学主事，毛泽东一生中获得的第一个“官职”便是小学校长，而他上任后题写了一幅对联：

“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挂在附小小礼堂。

这不过是对“天下事皆己事也”的又一通俗阐释。

文化大革命期间，湖南一师拟将这句话当作校训，而毛泽东得知后却拒绝他们这样做，他的理由是：这句话原是写给小学生的，虽曰对联，却未讲对仗，给孩子写的话，必须用孩子们能接受的语气，但这却不适合成人。

新中国成立后，小学校长出身的毛泽东又给孩子们写了一句意思相近的话：全中国的少年儿童团结起来，做新中国的新主人。

毛泽东安排小弟泽覃、妹妹泽建到附小读书，安排大弟泽民担任附小的庶务，他切实地履行起大哥和家长的职责，而由毛泽东照料的弟弟和妹妹，也都跟随大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是一条牺牲之路，毛泽东的弟弟和妹妹，后来都为“天下事”——中国革命牺牲了。

正如毛泽东后来所痛切的回忆的那样，他并没有很好地照料弟弟妹妹，更没有一心一意地当校长，因为他当时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天下事”——宣传马克思的学说和

筹备创立共产党组织上去了。有一次，当小弟泽覃抱怨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毛家祠堂，你的祖宗也不是马克思”时，毛泽东气愤地骂了泽覃，甚至要找根棍子去打他。

1920年7月31日，长沙《大公报》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发起新文化书社》启事。在这篇启事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说清楚什么是“新文化”，而现在我们才知道：关于生产劳动的文化，劳动者阶级的文化，才是新文化，而这种新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说，现在全中国全世界都还没有新文化，“只有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沿岸的俄罗斯”。中国最大的积贫积弱不是别的，而是思想和知识的匮乏，“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而解决这种脑子的饥荒，就是创办新文化书社的缘起。

8月2日，长沙新文化书社宣告成立，毛泽东是27个投资人之一，他们一共捐资400元，其中以新民学会的女会员陶毅捐资最多，当时，她和杨开慧一样爱着毛泽东，而刚刚返回湖南不久的杨开慧闻讯，立即动员母亲把父亲丧葬费的结余全部捐献出来，使书社的启动资金增加到519元。

毛泽东担任书社的特别联络员，易礼容则是总经理，

毛与易，一个主外，一个主内。负责新文化书社店面经营的人易礼容，就是那个在南京火车站借钱给毛泽东买鞋子的人。

毛泽东表现出他惊人的经营天才，经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信用担保，书社得以从各大出版机构批量进货书报杂志，而免去了押金，长沙新文化书社成为了当时经营最好的书店，也是销售《新青年》、《每周评论》最多的书店。

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省学联的骨干成员中，发起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那时他提出：驱逐张敬尧、实行湖南自治，这些不过都是“小事”，而当萧子升来信提议“改造东亚”时，毛泽东则回信说：问题在于改造中国与世界，“东亚无所取义”。

这一年的冬天，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了。他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用毛、杨二人的话来说，这就是“不做俗人之举”。杨开慧当时这样写道：

从此我有了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我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如他被敌人捉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去共一个命运！

而事实证明，这绝非纯情少女在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时所说的话。

当然，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朋友中，毕竟也还是有“俗人”的。

1921年，新民学会的主要成员萧子升从巴黎经北京返回了长沙，萧子升就是那个与毛泽东一起徒步考察了湖南五县的同学，萧子升与毛泽东和蔡和森，被称为“杨门三杰”，只不过，杨昌济临终向章士钊推荐的救国人才中，却没有萧子升。

萧子升后来则说，杨先生之所以早逝，就是因为他所发明和倡导的斯巴达式的生活修身方式，损害了他的健康。

萧子升是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成员，也是新民学会派往北京联系赴法勤工俭学的代表，他生性温和而懦弱，被毛泽东戏称为“萧菩萨”。不过，萧子升却很得李石曾的信任，并担任了李的秘书，1927年之后，李石曾成为蒋介石政权里的高官，随即提拔萧子升做了农政部次长。

分别仅仅两年，毛、萧二人却发现：他们彼此思想和境遇都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他们彻夜长谈，最终却因为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而相对流泪。

萧子升后来回忆说：“毛泽东能够征服他的听众，并

使他们着迷。他具有一种说服别人的可怕的力量，很少有人能不被他的话语所打动”。但是，这一次，萧子升却没有被毛泽东所打动。

毛泽东认为，要改造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造，实现劳动阶级的专政，仅靠办书店、办教育是不行的，因为办教育、办书店需要有钱，而有钱人都是李石曾这种达官贵人，他们根本不在乎大多数劳动者的死活。

而萧子升依然还是坚信无政府主义，他认为革命会带来牺牲，而他宁愿没有牺牲，通过文化和教育的逐步改良，来获得后代的幸福。

毛泽东嘲笑说：你这种理想，1000年也不可能实现，那种不能实现的理想等于空说。而萧则回答，他愿意等1000年，愿意空说1000年。

直到1921年7月他们还在争论，于是，他们一起搭船离开长沙，在船上继续争论。

萧子升回忆说：“那是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同床而睡，一直谈到黎明，毛泽东一直劝说我加入共产党，他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不要一千年，只要30年至40年的时间，共产党就能够改变中国。”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预言极为精确，但当时的萧子升

却认为，这不过是天方夜谭。

那天乌云密布，山雨欲来，两个赤诚的朋友从洞庭湖出航沿江而下，毛和萧共处一个舱室，毛睡下铺，第二天一早，萧子升醒来时，他发现下铺空着，当他走出舱室，看到毛泽东独自站在甲板上，手里拿着一本书——《资本主义制度大纲》。

萧子升在武汉中途下船，替李石曾办事去了，而毛泽东则继续航行去了上海，毛、萧二人从此分道扬镳。

此番分手，地老天荒，萧子升后来说：多年之后我方才才知道：那次毛泽东去上海，是为了参加一次重要的会议，而这次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像萧子升一样，当时没有谁认为这次会议很重要，彼时中国最重要的两位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李大钊是因为忙于北京大学的校务不能与会，而陈独秀则由于当时刚刚担任了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不能抽身，便只是派了他的代表周佛海来主持会议。

而当中国共产党经过25年的浴血奋战，成为主宰中国命运的决定性力量之后，1945年4月21日，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面对着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党的精华，毛泽东引用了《庄子》中的一句话，如此感慨万千

地形容了中共一大：“其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历史证明，领导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的，并不是什么博学鸿儒，而是具有批判的思想、行动的意志，敢想敢干的新青年。

如果马克思主义不与实际相结合，它至今恐怕依然还是高妙的理想，依然还是空说。

中共一大结束一个月后，即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1921年10月，又在长沙成立了湖南分部，毛泽东任主任。

尽管中共一大将“争取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写入了党纲，但事后证明，在与会的12位代表中，率先身体力行这一纲领的人，便是毛泽东。

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写到：世界上有两种学问，一种在于解释世界，一种在于改造世界，前者为理论，后者为实践。而毛泽东认为，“学皆起源于实践问题”。

毛泽东不是空谈家，他立即组建了安源工人俱乐部，而擅长经营的易礼容，则协助毛泽东创办了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并发行了中国第一张红色股票，在安源，创办了长沙新文化书社的毛泽东和易礼容，又共同开创了“劳动

者持股”这种新型的所有制形式。

当时的易礼容，是湖南省除毛泽东、何叔衡之外的第三个党员。

一年之后，毛泽东发动了安源路矿工人一万七千人举行罢工，毛泽东认为：罢工的成败，全靠是否能够取得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与同情，必须采用“哀兵必胜”的策略，必须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于是，他为工人俱乐部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

1922年9月18日，在地方商会和绅士的调停下，工人俱乐部与资方代表签订协议，工人要求的条件得到满足，安源罢工取得成功，这支哀兵胜利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大规模的工人运动。

1927年，当毛泽东发动秋收暴动时，他手中掌握的武器，其实就是安源矿警队的那几百条枪，安源罢工的骨干力量，又成为了毛泽东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基础。

1915年，毛泽东曾经在长沙的报纸上，以“二十八画生”之名征友，结果是来了“三个半”人，一个是罗章龙，另外两个的名字他后来忘记了，而那“半个”，就是李立三，因为他听了毛泽东的话之后，没有表态就走了。

1922年7-9月间，李立三协助毛泽东领导了安源罢工，

而另一个在安源罢工中协助毛泽东的人是刘少奇，他来自湘乡，是毛泽东母亲的同乡。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1923年，与他一起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的北大学生邓中夏说：隆郅，你的名字太复杂了，一般工人不能认得，不如改了为好。看到工会门口站着三个人，邓中夏便说，你就改叫“三立”吧。李隆郅说：“三立”太俗了，我改叫李立三吧。

当时，他们谁也没能想到，“立三”这个名字，日后会与中共六大后形成的一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联系在一起，而载入史册。

李立三也是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的成员，与萧子升不同，他因“思想过激”而遭李石曾和吴稚晖排斥，1921年10月，李立三、蔡和森、陈毅等103名留法学生，被法国当局驱逐回国，到达上海之后，蔡和森即被留在上海党中央工作，而李立三则被派回了他的故乡湖南。

在见到毛泽东三天之后，李立三便跟随毛泽东去了安源，开始领导安源的工人运动。

李立三与蔡和森，既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校友，也是周恩来留法期间的学友，正像谈到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就不能不从他们与易礼容、李立三一起领导安源罢工说起

一样，讲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也不能不追溯到他们与李立三、蔡和森的共同友谊。

今天想来，日后那些改造了中国的“同学少年”，似乎生来即是有缘的。

1922年10月23日，杨开慧因为难产，紧急住进了美国耶鲁大学创办的长沙湘雅医院，该院的产科大夫李振翩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校友，也是新民学会的成员，他为杨开慧做了剖腹产手术，次日清晨，毛泽东的长子岸英在长沙湘雅医院诞生。

毛岸英出生的时候，毛泽东正在领导两千长沙泥木工人举行罢工，他正吹着哨子走在工人游行的队伍里，没有及时赶到产房。而当时的党中央，对他的行动也没有表示任何的声援与支持，关键时刻，唯一能够帮助他的人，只有新民学会的成员李振翩。

51年后，即1973年8月2日晚，80岁的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了青年时代的友人——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振翩博士和夫人汤汉志。他们感慨万千，彻夜长谈。

李振翩说：现在中国人地位提高了，我们在国外也觉得他们看得起中国人一些了。

毛泽东回答说：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赶跑了日本帝

国主义。第二就是打败了美国的走狗蒋介石，他跑到台湾去了。再就是派志愿军到朝鲜，打败了美国人。

然后，毛泽东动情地说：现在开慧不在了，岸英也牺牲了。我这个人不行了。腿也不行了，气管也不行了，眼睛也不行了，耳朵还可以。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近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比如对你们吧，大致看得清楚，细部我就看不清了。

李振翩说：主席的一举一动都同全世界有关系。

毛泽东则幽默地说：自从尼克松总统到中国，就在这个地方（用手指汤坐的位置），跟他谈了一次话，还有基辛格博士，后头又跟尼克松谈了一次，从此名声就不好了，说我是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勾结帝国主义。我喜欢美国人民。我跟尼克松也讲过，我们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帮助各国人民起来革命。我是个共产党员，目的就在于打倒帝修反。现在还不行，大概要到下一代。

1950年11月25日，新婚不到一年，刚刚过了28岁生日的毛岸英战死朝鲜疆场。

毛岸英战死后，周世钊问毛泽东：岸英为你吃了那么多苦，他已经够苦的了，你怎么舍得让他去朝鲜战场！

毛泽东沉思了良久，徐徐回答说：老百姓的孩子可以血洒疆场，我毛泽东的儿子为什么就不行呢！我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我的儿子不上战场，以后国家有难，谁还会派自己的儿子去上战场呢！

也就是在那次与周世钊的谈话中，毛泽东重述了青年时代立下的宏愿：“为全中国、全世界受苦的人贡献自己的一切”，并追忆起新民学会的那些“同学少年”。

1931年，新民学会的主要创始人蔡和森因叛徒出卖，牺牲于广州军政监狱，年仅36岁。

1976年11月，新民学会的另外一个主要创始人萧子升病逝于乌拉圭。

萧子升晚年著书，仔细地描述了与毛泽东徒步走遍湖南五县的经历。

那一年的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毛与萧生于同年，也均享年83岁。

区别在于：毛奋斗了一生，而萧则空说了一世。

当新民学会的主要成员李振翩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合泪写下这样诗句：“仰望巨星今不见，长使世人泪满襟。愿化悲痛为力量，加紧服务为人民。”

1984年11月16日，世界著名细菌学和病毒学专家李

振翩在美国逝世，享年 84 岁，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发去唁电，时任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打电话向汤汉志表示慰问。

李振翩毕生致力于以医学救世济民，临终前一天还在实验室埋头工作。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新民学会的另一个主要创始人易礼容被国民党追捕，于 1929 年流亡日本，一度与党失去了联系。抗战爆发后，易礼容回国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全国解放后，易礼容在全国总工会工作，而他的搭档，还是当年一起领导安源罢工的李立三。

1968 年 11 月 5 日，因为受到刘少奇的牵连，易礼容被投入秦城监狱，那一年，易礼容已是 70 岁高龄。1975 年，经毛泽东亲自干预，易礼容被释放出狱，1978 年，易礼容案彻底平反。

1997 年 3 月 28 日，易礼容在北京逝世，享年 99 岁。

他是最后一个去世的新民学会的会员。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其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今天看来，如果没有毛泽东，如果没有新民学会那些“同学少年”，没有“嘴巴大的能塞进一个拳头”的李立三，如果没有善于经营、胆大心细的蔡和森、易礼容和刘少奇，中共能否像毛泽东当年向萧子升预言的那样，用 30-40 年就能取得全国政权，恐怕尚在未定之天。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长沙新民学会这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新青年，仅凭中共一大那 12 个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一定会是另外的一幅画卷。

077

第四章

“说空话”与“办实事”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因忙于工人运动而四处奔走的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1936年，忆起中共二大，毛泽东对斯诺这样解释说：“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能出席”。

中共二大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党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当作“最高纲领”，而党的使命则是实现“最低纲领”，即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国家。

实际上，使毛泽东放弃与会的主要原因，可能就是他对党放弃支持工人运动而感到困惑不解，因此他才说，自己当时“找不到任何同志”。

毛泽东没有听从共产国际的命令，而是继续独自领导了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而这次罢工，同样奇迹般的取得了胜利。在当时，除了易礼容、李立三、刘少奇等几个一

起领导工人运动的湖南旧友之外，毛泽东在党内确实找不到任何同志。

导致当时中共中央政策迅疾转向的，是苏联和共产国际态度的转变。

1922年8月，曾经参与领导了10月革命的越飞，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出任驻华全权大使，在与北方的吴佩孚政府就外蒙和中东路问题谈判失败后，越飞转而依靠南方的孙中山和国民党。

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在这个宣言中，苏联政府和孙中山一致认为：中国不存在社会主义生存发展的土壤，苏维埃制度不能引进中国。中国革命的目标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的充分独立。

作为苏联不支持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之交换条件，孙中山表示：苏联军队不必从外蒙古撤退，中东路问题则由双方协商解决。

《孙文越飞宣言》签署后，越飞立即代表苏联政府，宣布向国民党提供200万卢布的款项以及8000支步枪、两辆装甲车等武器援助，并派遣教官来广州，以帮助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让国民党用苏联提供的枪炮，去打拒绝与苏联合作的吴佩孚。

苏联的援助，乃是国民党建军的基础，而如果没有黄埔军校，当然就不会有后来的蒋介石。

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派出了一个特别代表团访问苏联，团长即是36岁的蒋介石，团员中则有共产党人张太雷，而当时的蒋介石告诉苏联人说：自己正在刻苦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而这为他在共产国际那里博取了极大的好感。

那时的斯大林极为欣赏蒋介石，他当然不会想到，蒋介石会用苏联给他的枪去杀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史，是一部与共产国际、特别是与斯大林等人的瞎指挥不懈抗争的历史。

中共之所以能坚持一定程度的独立自主，在于从成立伊始，就有着自己的干部基础，而这一基础是由两部分人构成，其一是长沙新民学会的会员，其二是留法勤工俭学的成员，而他们都是“五四运动”造就的新青年。

这两部分成员，先后汇合于北京大学和法国里昂大学，随后又由于领导中国早期的工人运动而走在了一起。

1923年4月，毛泽东被从长沙工人运动的前线，调到上海中共中央工作，6月上旬，毛泽东离开上海到广州，参加中共“三大”预备会议。

中共“三大”，是在中国工人运动陷入空前低潮时召开的。

就在这一年，爆发于河南，并席卷中国北方的“二七工人大罢工”，被军阀吴佩孚残酷地镇压下去了，成千上万的工人惨遭屠杀，长期经营的中共北方组织，在一夜之间就被破坏殆尽。

血淋淋的惨剧迫使中共认识到：在军阀的武力面前，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是如此弱小，而貌似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竟然是如此不堪一击。

与此同时，西欧各国爆发的、力图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人起义也纷纷失败了，在整个西方，苏联陷入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为了打破这种封锁，苏联布尔什维克转而希望在亚洲——中国和印度找到盟友。

在这种形势下，列宁发表了《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一文，他指出：欧洲的资产阶级已经陷入全面的反动，而亚洲的资产阶级还在同人民一起反对反动势力，所以，目前共产党人不应该继续追求“世界革命”，而应该与亚洲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列宁选择的盟友是孙中山和国民党，而《孙文越飞宣言》便是列宁策略的体现，苏联支持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被称为“国民革命”，这就意味着，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不是共产党，苏共指示中共：它的使命只是配合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而在国民革命中，共产党要一切服从国民党。

为了支持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革命，苏联更把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们调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实际上等于把这些人“雪藏”起来，为的就是防止他们的“过激行动”破坏苏联与国民党的合作，或者说，防止中国的工人运动，影响资产阶级革命的顺利进行。

项英、李立三、张国焘、向忠发等早期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就是这样先后被派往了苏联。

如果不是蒋介石后来背叛革命，这些中国早期的工人领袖们，也许会就这样终老异乡，一生默默无闻。而1928年之后，这些人当然也将不会再有机会被陆续派回中国，代表共产国际，去打击“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了。

对于年轻的中共领导层而言，1923年是令他们心碎的一年。这些人参加共产党，原本就是为世界革命的大同理想所鼓舞，是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今，他

们却被告知说：世界革命像蓝天一样遥远，共产主义将被永远推迟，而那或许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中国要进行的是资产阶级革命，而在那场革命中，共产党不过是国民党的附庸。

这是一次信仰的危机吗？如果说是，那么，这种“信仰”的危机，在后来的中共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

作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毛泽东竟然没有被派往苏联，这的确算是一个极大的例外。

固然，毛泽东本人一向对吃“洋面包”不感兴趣，但更重要的则是：在共产国际看来，毛泽东似乎并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领导的安源罢工，性质与“二七罢工”完全不同，总起来说，毛泽东领导的不过是一系列总体上和平的劳资谈判，毛泽东主张的“工人持股”和劳资合作，是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的，毛泽东不算是“激进派”，他这样的人留在中国，对国共合作有好处。

毛泽东自己后来也多次说道：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他只能算是个“中间派”，他的立场，最多算是“中间偏左”而已。

正是这个例外成全了毛泽东，也成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也正是在士气极其低落的中共“三大”上，首次提出了他别具一格的设想，在现实的逼迫下，毛泽东力图去创造了一种学说，这种学说奇迹般地重新叙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一学说，后来被称为“毛泽东思想”。

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主张呢？

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中这样说：毛泽东所提出的，其实就是农民问题。

他说：中共三大讨论的问题，“都是在会前已经再三讨论过的，只有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共的历次讨论中，直到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重视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

“毛泽东的发言是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东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

张国焘还回忆说：“毛泽东向大会提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

果中共也重视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那样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最大的贡献。”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脱颖而出，他指出，在中国这样一种外有帝国主义，内部军阀横行的处境下，不必说夺取全国政权，就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生存，仅靠工人在城市里起义是办不到的，因为这要依靠“党军”，而如果不发动广大的农民入伍，“党军”则无从建立。

国民党之所以被苏联看好，就是因为它目前掌握着一定数量的“党军”，而这些“党军”的来源，则不过就是共产党人澎湃在广东海陆丰地区进行农民运动的成果。

毛泽东同时还预言，国民党不可能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因为国民党的干部、特别是军队里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地主和乡绅的子弟，让他们去打击军阀是可以的，而让他们代表农民、组织农民去革地主和乡绅的命，则是完全办不到的。

孙中山固然有“平均地权”的良好愿望，可他的这一良好愿望，却必然使豪绅地主成为打击的目标，因此，孙中山的这种革命思想，不可能依靠国民党来实现。

可见，国民党并没有苏联所想象的那么了不起，如果

没有共产党人动员农民入伍，国民党甚至在广东也根本不能立足。

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式必须是军事斗争，而不是社会运动和城市罢工，这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

毛泽东的这种主张是极其务实的，而他关于农民是“党军”来源的呼吁，则立即引起了国民党左派的重视，此后不久，毛泽东便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办的广东和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但是，与毛泽东不同，当时年轻的中共领导层恰恰是“不务实”的。当时的中共中央由一批洋派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空怀高远的理想，而在他们眼里，毛泽东一身土气，而毛泽东如此轻易地放弃工人运动、城市运动和社会运动，简直就是个没有理想的“机会主义者”。

的确，毛泽东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写过书，即使写了，那时恐怕也没有谁愿意给他出版。毛泽东来自农村，他没有在大城市长期生活过，更没有留学的经历，在这方面，他根本不能与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和刘少奇相比，陈独秀之所以重用他，只是因为他老实肯干，能吃亏会办事而已，而在陈独秀眼里，毛泽东实际上不过就是个土包子。

对当时执迷于工人和知识分子运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来说，让他们接受毛泽东的思想，而不是将其视为“异端邪说”，那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这里起码有三个原因：

其一，毛泽东的设想，不但与共产国际的指示——看起来也与马克思的经典学说背道而驰。马克思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学说，而在那里根本就没有农民的地位。

其二，当时的中共领导层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且是由高度西化的高级知识分子组成，他们与中国的下层，特别是农民相隔甚远，这些人完全不了解农村与农民，他们对于农民的印象，就是愚昧、落后、保守和自私。

其三，这些高度西化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的治理经验缺乏认识，在这些“反传统主义者”眼里，中国传统几乎全是糟粕。

难怪张国焘当时曾这样讽刺说：那个一身土气的毛泽东，还生活在黄巢、朱元璋和李自成的时代，而黄巢当年占领了广州，就一把火把整个广州城烧掉了。农民是很愚昧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苏维埃，农民还以为苏维埃就是苏兆征（中共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的儿子呢！

中共“三大”之所以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进行国民

革命，同时在国民革命中不遗余力地争取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只是形势所迫、迫于无奈，而绝非被毛泽东的主张所说服。历史证明，毛泽东要说服共产党接受他的主张，要付出血的代价，他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中共“三大”最终选举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和谭平山五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会议规定：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令人惊叹的是，中共三大所形成的中央局五位成员中，“杨门弟子”竟然占了三位，他们是：毛泽东、蔡和森和罗章龙。

毛泽东希望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都能开成一次高水平的思想和学术讨论会，以“不断推进伟大的思想解放，使党在思想上团结起来”，但是，中共“三大”显然还不是一次学术讨论会，而在当时的中共领导层看来，30岁的毛泽东可能什么都有，而就是没有学问。

当时欣赏毛泽东的主张的，的确并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左派，即以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和汪精卫为代表的那一派。他们认为，通过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以组织发动农民入伍，建立党军，这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

尽管在毛泽东看来，国民党左派的姿态是虚假的，他们重视农民运动，只不过是因为农民是国民党建军的兵源，而一旦国民党建军成功，农民运动便会被否定——而毛泽东对于国民党左派的这种判断，不幸很快就变成了事实。

无论怎样，在当时的共产党中央里，毛泽东确实是国民党能够和愿意接受的人才，而那时的国民党能够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仅此一点，就显得比同时期的中共更成熟、更务实，也更了解中国。

1923年12月底，毛泽东在广州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章程委员会审查委员。

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离开广州，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担任组织部秘书，按照孙中山的部署，毛泽东负责国民党的党员重新登记，即国民党的“整党”工作。

随即，这一年的3月13日，毛泽东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三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部署了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毛泽东再一次参与了国民党的“建军”工作。

毛泽东最初参与“整党”，所要整顿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他一开始参与建军，则是建设黄埔军校，而

不是建立工农红军。

那个时候，毛泽东所代表的就是国民党左派，而在当时的共产党眼里，毛泽东的立场则是偏右的，是“机会主义”的。

而从那时起，在中共党内，毛泽东头上的两顶帽子：“机会主义”和“右倾”，一直被戴到了遵义会议。

1970年10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和夫人，他回顾自己一生的革命生涯时这样说：“我是中间派，中间偏左，我这个人不算什么左的人”。

1973年6月24日，毛泽东又跟周恩来说：“我们是现实主义者，说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

1972年7月24日，毛泽东在谈到国际问题时又这样说：“我们外交部有条路线，中左路线，喜欢左派和中间派，就不喜欢右派。世界上右派当权，你怎么办呢？而我呢，都喜欢，特别喜欢右派，尼克松这类人，我就说服我周围的这些人。”

“说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毛泽东并不是左派或者右派，他是他自己所说的实事求是派。

马克思的道理是：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改造世界，

而王阳明的名言则是：六经皆史，史即“事”也。离开了做实事，再好的经典也是废话。不能实践的知识，便不是真知，而实事求是——这就是毛泽东的哲学。

然而，做“实事求是派”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这意味着毛泽东同时要招架来自左派和右派的猛烈攻击。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变得名声不好”，被说成是“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并非源自他晚年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实际上，他变得“名声不好”，被说成“右倾”，是从中共三大就开始了。

说服共产党不易，而与国民党打交道则更难了。毛泽东在上海主持的国民党重新登记工作，受到了叶楚傖等国民党老右派的强烈抵制，年青的毛泽东，根本就不在这些老政客们的眼里。整顿这些腐败老朽，连孙中山都难以做到，当时只有30岁的毛泽东就更是勉为其难了。

看来，在中国办一件“实事”，实在是太难了，而同时为两个党服务，又实在是太累了，毛泽东对来自国民党右派的攻击他可以满不在乎，但要忍受共产党同事对他的打击和污蔑，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在那个时候，党内唯一同情毛泽东的李大钊去了莫斯科，陈独秀对毛泽东身为共产党员而为国民党如此卖力也深感不满，毛泽东在

中共党内因此陷入了孤立。

拼命工作而又遭受“夹板气”的毛泽东在 1924 年终于病倒了，他咳血不止，诊断结果是胃出血。他向陈独秀请了假，陈独秀如释重负地放毛泽东回湖南休养去了。

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四大上，毛泽东被从党的中央局中选了出去，代替他的人自然便是“好做大言”的空谈家张国焘。

而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即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自中共四大起，毛泽东便离开了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层，而直到 11 年后，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才第一次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共是在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和碰壁之后，才把“实事求是”当作了行动的指南的。

093

第五章

批判地思想

从1924年底到1925年8月，毛泽东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退隐到故乡韶山，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什么也没有写，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退隐似乎成为了毛泽东人生历程中的一个特点——每当要做出惊天动地的决断时，他都会像蛇一样蛰伏一个时期，在沉潜中独自思考，或者说——孤独地思考。

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究竟在思考些什么呢？

他思考的，是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

基于这种思考，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于什么叫做“国民革命”，做出了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完全不同的判断。

这种离经叛道的判断太具有爆炸性了，而它又是如此深深地攫住了毛泽东的思想，“把酒酌滔滔，心潮逐浪高”，孤独至极的毛泽东只能归于沉默。

自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认为：“吾国二千年来之学者，

皆可谓之学而不思”。

中国缺乏的不是知识，而是批判地对待知识的态度。

所谓“学而不思”也就是盲从，就是“循习惯之势力，而笃信之、服从之耳”，毛泽东说，“学而不思之学派”，造成的是“有信仰而无诘难之社会”。

而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一种批判的思想，而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绝不是盲从。

马克思主义不是黑格尔主义的“绝对知识”，而是“诘难之思想”。后来，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这样概括说：

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毛泽东毕生不盲从权威，而在大革命时代，毛泽东所批判的，便是苏联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复杂分析，简化为了机械的“五种社会形态”的递进，这五种社会形态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

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斯大林对中国社会性质，做出

了机械而简单的判断：中国是封建社会，中国需要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资产阶级是最进步的阶级。

毛泽东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但那个时候的毛泽东自然也不可能知道：所谓“五种社会形态论”，根本就不是马克思的观点。

当时号称在刻苦研读《资本论》的是蒋介石。而毛泽东的一生，则主要不是通过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而是通过独立思考而接近了马克思的观点的。马克思与毛泽东的共同点，就在于批判的思想，而在中国社会性质这个问题上，即是如此。

与列宁和斯大林不同，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中国并不是西方那种“封建社会”，中国早就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和市场的统一，不存在西方那样的封建壁垒、贸易和市场壁垒，中国市场很大，商人纵横南北，获利很多，但是，也正因为中国“商业资本”的过度发达，才造成了其“工业资本”之不发达，即商人不必通过投资产业，就可以获利发财。

而这正是“工业革命”不发生在中国的一个原因。

于是，与西方式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相区别，马克思发明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社会范畴，以此来

概括中国的特殊性。

尽管当时的毛泽东不可能读过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但与列宁和斯大林相比，毛泽东与马克思对中国社会特殊性的分析，却惊人的一致。

毛泽东也认为，中国并非简单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有资本主义性质。

中国的官僚即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他们是赢利的官僚，而中国基层的土豪劣绅也同样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他们也是赢利性的“国家经纪人”。中国的官僚其实并不代表“国家”，中国的官僚阶级是一个“赢利性的组织”，即马克思·韦伯所谓的“家产制的官僚”——正如斯诺后来所说的那样，“在中国，当官只是为自己谋利赚钱的一种方式而已”。

因此，毛泽东把中国的官僚阶级称为特殊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而近代以来，官僚资产阶级更与帝国主义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发现中国的官僚是一个具有自身特殊利益的“赢利性的组织”，而非代表刻板无效的行政体系的人，并不是毛泽东，而是雍正皇帝，因此，雍正发动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以整肃官商勾结和赢利性的官僚，

但是，雍正的改革与新政，最终失败了。

而毛泽东独自的发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基础与根源，乃是基层的“赢利型经济”，是土豪劣绅。而要摧垮官僚资本主义，就必须从基层摧毁土豪劣绅，并以农民自己的组织，来代替土豪劣绅对于中国基层的控制。

要提高国家组织效率，就必须从提高社会自身的“抵抗力”入手，而靠雍正那种自上而下的“反腐败”运动，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困扰中国千年的治理体系失败问题的。

中国历代所施行的自上而下的“反腐败运动”，为什么会反复地陷入失败呢？这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基层社会没有组织。于是，国家要动员和控制社会，就非要依靠官僚不可。而官僚控制基层社会的抓手，就是基层的土豪劣绅，一旦官僚与基层的土豪劣绅结合在一起，那么，国家与皇权便对他们彻底无可奈何了。

中国国家之无效率，正是因为基层社会没有组织，由于基层人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所以，他们也就不能抵抗官僚的掠夺和压榨，由于基层无组织，所以国家欲动员社会，便只能依靠官僚和基层的土豪劣绅，而一旦赢利的官僚与基层的土豪结合，中国就会出现军阀割据的局面。

此时的毛泽东所做出的，乃是他毕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自一千以降，在中国基层社会形成的“乡绅”阶层，已经由中国基层社会的组织力量，逐渐堕落成为榨取和破坏中国基层的毁灭性力量，而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乡绅阶层，已经堕落为“土豪劣绅”。因此，组织农民的过程，同时也是以农民自己的组织——农会、妇女会等，来取代和打倒一千年来的乡绅阶层的过程，这是一个从最基层出发，重新组织中国、改造中国的过程——而用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术语来说，这就是一个重建社会“抵抗力”的过程。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的了解的确极为深刻，从少年时代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到青年时代的读《伦理学原理》批注和《心之力》，毛泽东已经形成了对于中国文明精髓的精深理解，在《讲堂录》中，他更指出了中国之衰落，便在于社会组织能力下降这个关键问题。

毛泽东自少年时代即推崇法家，在他看来，中国基层组织的形成，就源于商鞅的“五户联保”的户籍保伍制度，这就是郡县制的实质。而唐的府兵制，也是建立在这样牢固的基层组织的基础之上。然而，宋代以降，统治者为了根除基层民众有组织的反抗，以“募役法”等手段，解散了基层社会的组织，改由“乡绅”对基层进行统治，从而

形成了“国家能力不下乡”的局面。

而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已经指出：这就是造成中国基层社会没有国家思想、政治思想的根源，这也就是近代中国陷入“一盘散沙”的根源。

于是，正是这种悲剧性的恶性循环，为帝国主义宰治中国提供了前提和条件。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是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思想家横空出世的。与列宁和斯大林不同，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整体，因为中国有最坏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一概地认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进步的，是不正确的。

若笼统地以为革命要依靠资产阶级，则可能会把革命的领导权，稀里糊涂地交给最坏的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中国革命之所以需要无产阶级来领导，就是因为中国内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土豪劣绅，外有帝国主义这种特殊的国情。

因此，中国革命，并不是一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革命，因为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基层的土豪劣绅——这三个互相勾结的势力，才是导致近代中国瓦解的

内因和外因，这三者才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中国革命的性质究竟何在呢？

这便是后来毛泽东所概括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大革命。

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是毛泽东毕生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毛泽东与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持续了一生。

也正是通过批判的思考，毛泽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无论今天还是过去，毛泽东关于农民和农民运动的观点，都被视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在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马克思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学说，而农民是保守的力量，现代化进程，就是消灭农民和农村的运动。

但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恰恰又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固然是一个“去农民化”和“去农村化”的进程，而社会主义则不然。

马克思指出，欧洲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古代共同体—农业共同体—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转变，但是，这条道路并不具有普遍性。

从“农业共同体”向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过渡，是一种基于战争和殖民的暴力转变，这一进程，同时也是以消灭欧洲的农民为代价的，是以非洲的奴隶贸易、美洲的奴隶种植园为代价展开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是欧洲式的“市民社会”摧毁人类共同体的过程。

但是，如果排除暴力的外部干扰，人类文明发展，原本可以走农业的发达促进制造业发展的道路——即走一条更加健康的发展道路。

亚当·斯密也指出：如果不是“百年战争”彻底摧毁了欧洲的农业，那么，欧洲会走一条以农业带动制造业，再以制造业带动贸易的道路，而这条道路，要比欧洲后来的发展道路更自然、更优越、更健康。

在《1857-1858 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更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中国不但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共同体，而中国还是一个“天然的共同体”。由于中国土地干燥，所以，耕种离不开大型的公共水利工程，中国之所以能够保持统一，正是因为大型的水利过程——大运河把中国联系在一起，因此，马克思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天然的共同体”，它与以土地私有化为基础的“日耳曼共同体”相比，性质完全不同。

1868年，马克思系统地阅读了毛勒（Maurer）对于日耳曼共同体的研究，并做了大量的摘录，在那里，马克思指出：从历史上上看，以私人所有制为主、共同体所有制为辅的“日耳曼共同体”，并不比以共同体所有制为主、以私人所有制的为辅的农业共同体发展得更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实际上是后者发展得更好、也更有普遍性。

马克思更明确地指出：如果没有外部暴力的干扰，以共同体所有制为主、以私人所有制为辅的所有制形式，不必向欧洲式的市民社会转化，也可以实现向现代文明转型，换句话说：现代化进程，并不必然是一个“去农民化”、“去农村化”和“去共同体化”的进程，而社会主义进程，就是一种不以牺牲农民和农村共同体为代价而进行的现代转变。

在马克思看来，这条“更好的现代化道路”是否可能，全靠中国这个“天然的共同体”的现代命运。

因此，马克思引用黑格尔的“两极相联定理”指出：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命运，将决定西方和全人类的命运。

若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那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绝不是“城市消灭农村”的过程，恰恰相反，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把农村建设得更好，比城

市还要好”。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毛泽东的思想，那么，我们会发现，在马克思之后的共产党领袖中，只有毛泽东的思路是与马克思高度契合的，也只有毛泽东立足中国文明的传统，从消灭三大差别的角度，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

毛泽东是这样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像马克思本人一样，他是以批判的方式来建立起自己的思想的。

当然，1920年代的毛泽东对于农民潜力的重视，毕竟与马克思有所不同，马克思重视中国这个“天然的共同体”与“日耳曼共同体”之间的区别，为的是思考一条超越西欧资本主义的、更好的现代化道路，而毛泽东重视农民运动，则是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农民运动，才能使当时的中国避免陷入最坏的结局。

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国民革命要成功，之所以需要一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土地革命，是因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所针对的就是军阀统治的根子，军阀统治的根子在基层、在地方，它是通过榨取、控制地方起来的，而离开了对于地方和农村的掠夺，离开了地方和农村在财政和人力上的支持，军阀的统治就必然会瓦解。

1925年，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提出：军阀的总根子就是土豪劣绅，军阀不过是大的土豪劣绅而已。因此，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国民革命，就必须铲除军阀的根子“土豪劣绅”，而要实现中国的现代转化，就必须改变为土豪劣绅所把持的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

毛泽东年青时代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明的认识，也已经发生了深化，在年青时代，他推崇能文能武的曾国藩，而今，他认为曾国藩就是乡绅地主阶级的代表，是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湘军和“新军”，就是军阀的源头。

毛泽东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去认识组织起来的农民和农民运动的，借用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来说，在毛泽东看来，方兴未艾的农民运动才是中国真正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显然，毛泽东的贡献，绝不仅是张国焘所说的：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发现了农民、提出了农民问题。毛泽东的贡献在于，他立足中国历史，极为深刻地揭示出：中国社会近代瓦解的根源，就在于基层社会没有自组织能力，而要进行社会改造，就必须扎扎实实地从组织最基层的社会做起，从增强社会自身的“抵抗力”做起。

毛泽东的思想剧烈地压缩了中国历史。自秦到唐，中国用了一千年的时间才解决了“皇权土地所有制”的问题，而自唐末至清末，中国又用了一千年，才实现了“地主土地所有制”。而毛泽东的设想则是，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以暴风骤雨般的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建立中国现代土地集体所有制，以推动土地的社会化生产，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力图用一代乃至几代人的革命、奋斗和牺牲，来完成历史上数百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

毛泽东说，一旦从这个高度去认识农民革命，也就自然解决了“好得很”和“糟得很”的问题，也就明白了农民革命不是打家劫舍，不是痞子造反，而是从基层去建立一个现代新国家的必由之路。

他这样概括说：谁掌握了农民，谁就能掌握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能动员和组织农民。

在后来的中国革命历程中，毛泽东将这些话又反复说过多次。

毛泽东毕生厌恶人们称他为天才，这是因为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才是他的品格，因此，他更喜欢称自己是“地才”。

不过，毛泽东的思想的确太超前了，30岁的毛泽东，他的思想不仅超越了同时代的那些大知识分子，超越了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而且也超越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

这种说法有些惊人吗？或许是的，而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敢于和能够坦率地说到这一点的，恐怕也只有阿尔都塞、魏斐德、施密特等少数西方学者，而连毛泽东本人也都毕生谦虚地说，他自己只不过是斯大林的学生。

毛泽东后来曾经这样说过：我青年时很自信，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但又很不自信，以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鸦片战争摧毁的，不仅是一个古老的王朝，更是中国人的思想、理论和道路自信。

而毛泽东思想所建立的，也不仅是一个新的国家、新的社会，而更是中国人的思想、理论和道路自信。

可惜，当时的毛泽东不可能知道，他独立思考的结果，与马克思本人的论断是高度契合的，当时的毛泽东只是以为，他的思想既然不符合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也就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喜欢鲁迅的诗：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联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毛泽东毕生都是一个孤独的思想者。而这首诗，确实能够代表毛泽东毕生的心境。

1924—1925年之间，毛泽东之所以陷入了长期的沉潜与孤独，以至于近一年都没有发出声音，也只能从这个角度得到理解。

1925年5月15日，一个在上海日本纱厂做工的名叫顾正红的工人，被日本工头枪杀了，顾正红恰好是杨开慧在上海举办的工人夜校的学生，远在韶山的毛泽东似乎没有对这一事件做出什么表态和强烈反应。

但是，这一事件却随之演化为上海和广州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帝国主义国家及其在华开办的企业成为愤怒的工人、市民和学生攻击的目标，而这就是“五卅运动”。

“五卅运动”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它把以工农为主体的社会运动，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五卅运动”同时鼓舞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从而使国共合作有了真正的基础。随着反帝运动高潮的到来，国民党在广东发动了“北伐运动”。

“国民革命”从此正式拉开序幕，而这就是1925—1927年的“大革命”。

1925年8月，应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召唤，毛泽东离开

湖南韶山，回到广州参与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

但是，迅疾到来的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似乎没有使毛泽东感到欢欣鼓舞，在返回广州途中，毛泽东在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郭亮的陪同下，重游了青年时代读书游泳的旧地岳麓山和爱晚亭（1920年，郭亮与毛泽东一起领导了湖南第一纱厂的工人运动），而与为革命形势所鼓舞的郭亮不同，毛泽东的心情与其说是激昂的，毋宁说是沉郁中夹杂着些许的悲怆。

在重游故地所写下的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长沙》中，毛泽东心事浩渺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究竟谁才是主宰中国命运的力量呢？

是苏联所说的资产阶级吗？

是广东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看好的蒋介石吗？

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吗？

农民，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吗？

这苍茫一问表明：当时的毛泽东，对“大革命”的前途并不乐观，尽管此时的毛泽东还不可能预见到，仅仅是两年之后，郭亮的头就会被蒋介石砍下来，挂在长沙的城门上，但是，毛泽东的确很清楚地意识到；无论国民

党、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他们对于突如其来的“革命高潮”还缺乏真正思想理论的准备，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解都是不正确的。

“大革命”的前途并不明朗。

经过了长达半年多的沉潜和思考之后，毛泽东的心境已经大不相同。后来他多次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当官做老爷，革命需要“五不怕”：不怕杀头、坐牢、老婆离婚、不怕丢官和开除党籍。

实际上，毛泽东是在预见到革命可能失败的前提下，毅然投身到大革命之中去的，而这是他与许多革命者的一个重要不同。日本思想家丸山升后来曾经这样说过，毛泽东与鲁迅一样，正因为他们是“失败者”，因此才成为了最彻底的革命者——而丸山的这句话，今天看来，的确是非常深刻到位的。

第六章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²⁶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

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得了173票。

而在国民党中执委选举中，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则得了248票——只差一票就是全票。

“精卫填海，介石补天”，在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脱颖而出，成了国民党的希望之星。

这一年的10月5日，经汪精卫推荐，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

在离开了共产党的核心决策层之后，毛泽东却成为了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陈独秀和汪精卫，是两个先后重用毛泽东的人。

陈独秀欣赏毛泽东，是因为他认为含蓄低调的毛泽东不尚空谈，能办实事。

而汪精卫看好毛泽东，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他最了解

心狠手辣的蒋介石。

与其说当时的国民党左派希望用共产党来制衡国民党右派，还不如说，汪精卫希望用毛泽东来制衡蒋介石。

尽管蒋介石因担任黄埔军校的校长而掌握了枪杆子，但随即被提升为国民党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却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国民党的话语权。

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蒋与毛是在几乎截然不同的历史传统中长成的。

在中国历史上，浙江是长江南岸唯一的京畿之地。南宋定都于临安（杭州），浙江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由于国都有禁军和官僚组成的庞大的消费者，从而给都城周围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自南宋以来，浙江便是出买办商人的地方。南宋初期，明州（宁波）和永嘉（温州）出身的考官最多，故这一地区产生的进士和官员也最多，与此同时，浙江也以出胥吏著称，鲁迅的家乡绍兴，便以盛产“刀笔师爷”闻名。

如果说毛泽东的家乡湖南出兵、出书生，那么，蒋介石的家乡则出买办商人、文豪、大官和刀笔师爷。

直到19世纪初，杭州和宁波的地位方才被上海超越，但那时的上海依旧还是浙江人的天下，上海最大的银行家

虞洽卿是浙江宁波人，上海最大的帮会头子黄金荣的祖籍，则是浙江余姚。

蒋介石并不是孙中山指定的接班人，最早看好蒋介石的人是鲍罗廷，他是苏联派到广东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而鲍罗廷推崇蒋介石，是因为斯大林把蒋介石视为“革命军人”。

蒋介石是在上海崛起的，除了有着深厚英美背景的宋美龄家族的支持之外，蒋介石崛起所依据的社会力量，就是浙江的财阀和江湖势力。

而在这之前，蒋介石最大的后台不是别人，就是斯大林。

斯大林甚至还怀抱着一个极为天真的希望——希望蒋介石能够加入共产党。

1926年10月26日，苏共政治局在斯大林的主持下，通过了一份给中共的指示，禁止在中国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右翼和蒋介石的斗争，并明确地反对发动农民运动。

这份指示强调说：“只要一直存在帝国主义者和北方的危险，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国民党就应该会珍惜自己的盟友和志同道合者。立即在农村发动国内战争，在同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战争正在紧张进行的情况下，会减弱国民党的战斗力。”

而那个时候，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已不到一年，当时的斯大林脑袋里想的却是如何使共产党不要影响蒋介石的“战斗力”。

事实上，蒋介石这个斯大林所欣赏的“革命军人”一旦羽翼丰满，国民政府就再也无法控制他了。在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看来：或许只有一个人能够与蒋介石对抗，而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汪精卫看好毛泽东，不仅是因为毛泽东能掌握笔杆子，也不仅是因为毛泽东极有思想，而是因为毛泽东能够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国民党二大结束后，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他谎称共产党要发动兵变，绑架自己去苏联。借此蒋介石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要把共产党从国民革命军中清除出去，而且他还提出：共产党员不能再继续担任国民政府的要职。

也就是在国民党通过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的二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主持的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市的番禺学宫正式开班上课了。

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开课25门，每届授课实习4个多月，毛泽东所担任课程最多，而学员们所学习的，主

要是社会调查的方法和军事工作。

半年之后，毛泽东又主办了设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毛泽东开办的农讲所孕育了中国 2800 个农会，遍及 11 省，它成为日后中共再造乾坤的熔炉。

北大中文系学生伍中豪，就是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认识了毛泽东，在听了毛泽东几堂课后，这位北大高材生便心悦诚服地对毛泽东说：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而在北伐军十一军军政治部工作的刘谦初，当时正在跟湖北道台的孙女张文秋谈恋爱，刘谦初久慕毛泽东的大名，1927 年 4 月的一个晚上，刘谦初突发奇想，对张文秋说：我们一起去看看毛所长怎么样？

于是，这对恋人就这样手拉手敲开了武汉督府堤 41 号毛泽东的家门。

开门的是杨开慧，说明来意后，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而当时毛泽东的一双儿子，正是活泼好动的年龄，杨开慧抓了一把花生，才把他们领开了。

1930 年春天，张文秋生下了一个美丽的女儿，因当时刘谦初正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故为女儿起名思齐，取怀念齐鲁大地之意。

1931 年 4 月，刘谦初被捕牺牲，1937 年，张文秋携女奔赴延安。

1949 年 10 月 15 日，在中国开国大典结束后不久，刘思齐与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共结连理。

而此时，刘谦初、杨开慧早已牺牲，毛泽东与刘谦初仅此一面，杨开慧与张文秋也是仅此一面。无论是毛、杨，还是刘、张，他们都不会想到，1924 年 4 月，武汉，那个初春的晚上，他们见到的竟然是未来的亲家。

这只能说是上天的安排。

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共产党的黄埔军校。

而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偏偏遇到了农讲所所长毛泽东，这也只能说是上天的安排。

毛泽东是伟大的演讲者，他总是能够征服自己的听众，而与毛泽东不同，蒋介石则沉默寡言，没有什么思想，蒋介石迷信枪杆子，他只崇拜掌握了枪杆子的自己。

也许是认识到了自己的这个缺陷，1943 年，蒋介石精心策划，终于隆重推出了由陶希圣捉刀代笔的《中国之命运》，这算是蒋介石一生中最大的学术成果。而这本著作最大的理论创建，便是关于乡绅的论述。

蒋介石认为：乡绅是中国基层社会的组织力量、社会

保护力量，乡绅代表的是中国基层社会的自组织性，乡绅政治就是中国政治的实质，乡绅就是西方的市民社会，因为中国的乡绅比西方的市民社会产生得早，所以，乡绅政治是中国政治比西方政治高明之所在。

如果说蒋介石也有理论，那么所谓“蒋介石理论”的核心，便在于此处。

那时的蒋介石，其实是希望用这部著作，来回答大革命时代的“笔杆子”毛泽东对于他的挑战。

而在乡绅问题上，毛泽东的思想则与蒋介石截然相反，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治理失败的过程，就集中表现为“乡绅”堕落为“劣绅”这个过程。

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和中国的“自强”运动，传统意义上的乡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由于与近代化相伴随的国家赋税的空前加剧和税收的困难，传统的乡绅日益不能担负起代替国家向地方榨取的“重任”。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乡土中国的空间结构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乡绅”的淡出和“劣绅”的进入。

所谓“劣绅”，往往是以包税人的面目出现，搜刮乡里，无恶不作。在一系列早期农村社会调查报告中，毛泽东认为：如果不能以农民的自我保护组织“农民会”以填补这

种乡土中国权力结构的真空，那么，中国农村将成为“劣绅”的天下。

美国学者杜赞奇，则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丰富和印证了毛泽东的现代中国农村理论。他指出，与晚清和民国财政收入的逐年增加相伴随的，是一个地方和乡村无政府状态蔓延的同步过程，而这是由于近代国家为了税收的渴望，方才启用和依靠乡村和地方“黑社会组织”，杜赞奇把这种黑社会组织称为“赢利型经济”。

杜赞奇指出，尽管正式的国家机构可以依靠这些非正式的“赢利型经济”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它却无法控制这些非正式机构，于是，国家对于基层的榨取与基层社会的“黑社会化”，乃是一个同步的过程。

毛泽东与蒋介石并非生来有仇，在大革命时代，毛泽东与蒋介石是一文一武两颗最耀眼的明星，蒋介石的原配夫人叫毛福梅，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蒋介石的原配夫人——蒋经国的生母——与毛泽东“五百年前是一家”。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衰落，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基层被黑社会化的“劣绅”所把持，而中国的上层则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统治，而蒋介石所代表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旧中国的治理体系。

要推动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那就非得革蒋介石的命不可。

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是敌我矛盾，他们之间斗争的成败关系中国的现代命运，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遇到毛泽东，算是蒋介石倒霉。

1925年12月1日，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刊发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被当时的《中国农民》和《中国青年》转载，而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却拒绝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这篇文章。

尽管对当时的陈独秀来说，毛泽东这篇文章属于离经叛道，散布的都是“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在后来的西方思想家眼里，这篇文章却因为简洁地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而至今依然还是“曲高和寡”。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成为《毛选》中的第一篇文章。

历史证明，这篇文章不仅是指导国民革命，而且也是指导整个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献，就是这篇文章，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正式诞生。

那一年，毛泽东32岁。

今天中国的青年人，读过这篇文章的人似乎已经不多。而对这篇文章认识最为独到的人，却是德国思想家卡尔·施密特。

卡尔·施密特指出：人们往往把毛泽东这篇文章理解为纯粹的政策和策略性的，而这乃是一种致命的错误，实际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理论文献，它在政治理论上的地位，堪与马吉雅维利的《君主论》和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媲美。

卡尔·施密特认为，毛泽东这篇文章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回答了“世界的实质”是什么，以及“政治实质上是什么”这两个问题，而对于革命的策略乃至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相对而言，是建立在上述两个重要思考的基础上的。

这是一篇划时代的政治哲学文献，而政策与策略的论述，只是这篇文章的表面。

首先，毛泽东对于“阶级”是什么的理解，是与“世界是什么”的回答联系在一起的，而实际上，只有从后者出发，才能真正理解前者。

“世界是什么”？在毛泽东看来，世界就是“差异”，世界上是永远存在差异的，毛泽东说，就社会而言，差异

就表现为社会差别和社会等级。

这本是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所表达的思想，但它也正体现了马克思本人在其博士论文《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之差异》中所表达的基本观点。

世界的本质是差异，而差异就是发展变化的根源——实际上，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

显然，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毛泽东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已经不再像青年时代写作《心之力》的时候那样，把世界和宇宙的本质理解为“生命力”，而是理解为“生产力”了。这时的毛泽东更强调：矛盾和差异推动了世界的发展与变化，不过，毛泽东又认为，这种变化并不总是意味着革命。

毛泽东说，当社会差别和社会差异还不至于影响社会成员“过日子”的时候，这种差异和差别——或曰这种“矛盾”，就不是“对抗性”的，社会“等级”，也还不至于发展为对立的“阶级”，这个时候的社会冲突，就不会表现为“政治冲突”、“阶级斗争”、社会革命。

后来，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进一步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哲学总结。他说：所谓“矛盾是普遍的”，是指“差异”是永远存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矛盾和差异

都是对抗性的，换句话说，不意味着它们都是“政治性”的，存在矛盾和差异的地方，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条件已经成熟和具备。

正是延续着这样的思考，后来的毛泽东又写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论十大关系》这样的著作，而这两篇著作中的思想，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及《矛盾论》乃是一脉相承的，而它的源头，可以上溯到《伦理学原理》批注。

这表明：毛泽东的思想从诞生起，就是成体系的，是一贯的。

而这篇文章的第二个核心，便是回答了什么是“革命”这个问题。

所谓革命，只是在社会差异发生了“质变”时才出现的，或者说，革命只出现在社会矛盾转变成“对抗性”的历史过程中。这个过程，就好像水在95℃还是液体，而到了100℃就汽化了一样，这就是所谓“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毛泽东后来说，这一过程，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

对于社会而言，所谓革命状态，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作威作福，而另外一部分人则活不下去那样一种状态，即

所谓 1% 对 99% 的状态。到了这个时候，社会关系就转变为“敌我关系”，社会差异和社会差别，就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敌我矛盾”。

只有身处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方才是处于“革命状态”之中，而处于革命状态的人，他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区分敌友。因为所谓“朋友”就是让我活下去的人，而“敌人”则是使我活不下去的人。

所以，这篇文章一开头，毛泽东便如此急迫地写到：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中国过去一起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正是从世界的实质就是矛盾和“差异”的视野出发，毛泽东才展开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他说：

在中国，最坏的势力就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土豪劣绅，他们是革命者的敌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介于敌人与朋友之间，他们的特点是怀疑动摇。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可惜人数很少。在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就是那些活不下去的人，而绝大多数人处于活不下去的状态，这就是中国革命得以爆发的根本前提。

只有最广大的农民，才是革命可以依靠的真正力量。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大革命”所依赖的对象，却并不是绝大多数活不下去的农民，十分危险的是：大革命依靠的是蒋介石，而蒋介石代表的却是革命的真正对象——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土豪劣绅。

虽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但是，革命者对于“革命”还没有从思想上做好准备，而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依然还处于“政治上不成熟”的状态。因此毛泽东指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很可能就是一场“虚假的革命”。

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什么会破产呢？

这就是因为蒋介石集团代表的是上层的“赢利型官僚”（官僚资本主义）和基层的“赢利型经济”（土豪劣绅），他们是中国最坏的势力，而当时的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却把它们视为革命的依靠力量。

1927年春，正值大革命高潮，身居高位的毛泽东在武汉写了一首格调悲怆的词，在唐代，中国人把西域的来客，称为“菩萨蛮”，而毛泽东这首词的词牌的名字，就叫“菩萨蛮”——而这似乎意味着，他自己在中国政坛和思想界中的地位，如同“西域来客”一样属于异端。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放任蒋介石加强“战斗力”的结果，只能是使蒋更快、更加赤裸裸地举起屠刀。而在当时十分危急的形势下，只有农民运动才能挽救革命，而只有抓住农民，共产党才可能有力量与蒋介石抗衡。

1927年3月-4月之间，即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前夜，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写到：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

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堪称中国的《共产党宣言》，而它的第一节，就叫“组织起来”。

当《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的时候，如同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大革命”作为一场“虚假的革命”已经全盘失败了。这篇文章发表数日之后，蒋介石便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武汉的国民党左派随之也背叛了工农运动，千百万工人和农民被残酷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倒在血泊里。

从1927年4月12日开始，在上海，针对共产党人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屠杀进行了3天。蒋介石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举行了血淋淋的葬礼。

而仅仅几个月之后，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基督教婚礼，在大革命的葬礼之后举行的盛大婚礼是个象征，通过这次政治联姻，蒋介石投入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怀抱。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于蒋介石的背叛感到震惊，而中

共的反应却是“束手无策”。

大革命的失败印证了马克思的名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大革命的失败印证了毛泽东的判断：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将会与帝国主义、土豪劣绅结合起来，背叛革命，屠杀工农和共产党人。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的演讲中曾经这样感慨地说：枪是可以杀人的。我们党明白这个道理，付出了许多血的代价。

1927年的8月13日，毛泽东带着全家从武汉秘密潜回长沙，所谓潜回，是因为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自我罢免”了在国民党中的一切职务，虽然他此时的身份是中共中央的特派员，但当时中共中央的指示，却是要去发动城市起义，而不是进行农村暴动。

8月31日，毛泽东一家深夜回到了位于长沙郊外的板仓杨家，由于路途颠簸，年幼的毛岸英趴在毛泽东的背上睡着了，幼小的岸英绝不会知道，未来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而毛泽东放下儿子，甚至没有来得及与妻子杨开慧说道别的话，就匆匆地消失在夜幕中。

杨开慧的保姆陈玉英后来这样回忆说：

当时我正在生病，睡在床上起不来。后来，听说是毛主席送他们回来的。毛主席从屋后的竹山翻过来，脚都没歇，又翻过后山走了。

1927年8月31日夜，月黑风高，山迢水远，毛泽东与杨开慧就此永别。

1930年11月14日下午一时，经蒋介石的手令，时年29岁的杨开慧被湖南军阀何健枪杀于长沙识字岭。她身中数枪，手指深深地陷入泥里。

自此一别，毛泽东永失“骄杨”。

1923年底，毛泽东曾经抄写了唐人元稹的一首名为《菟丝》的诗给杨开慧。

诗曰：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曼，依倚榛与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斫将去，柔曼与之并。

而这首诗在杨开慧心中造成了巨大的误解，因为当时的毛泽东，正准备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杨开慧误以为毛泽东抄写这首诗的原因，是官做大了，厌倦了自己，是负心的表现。

实际上，毛泽东早已经明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为，政治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他自己选择的这条道路，意味着慷慨赴死，而杨开慧嫁给了自己，几乎就等于选择了牺牲。

当年的毛泽东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告别杨开慧去参加国民党一大的。

临行前，他把一首《贺新郎》夹在了杨开慧的阅读的书中：

挥手从兹去。

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翻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

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

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思恨缕。

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环宇。

重比翼，和云翥。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毛泽东谈不上是一个孝子，甚至不是合格的丈夫、合格的父亲。因为每当需要牺牲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和自己的亲人，毛泽东一家有6位亲人为中国革命献出生命，而这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者的领袖中，绝无仅有。

从个人角度出发，毛泽东没有任何理由去推翻他自己担任高官的国民政府，然而，毛泽东这样做了，这是因为——像新民学会中的绝大多数成员那样，毛泽东在风华正茂的时代，便立志发愿，要为全世界受苦人贡献自己的一切。

毛泽东是伟大的思想家、战略家、革命家，但是，而蒋介石则不过是个政客，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政治家》一文中说过这样的话：“我自来疑惑所谓‘政治家’，怕莫不是一种好东西”。

而毛泽东早就预见到，蒋介石不是个好东西。

毛泽东的人生时间表与历史一致，而与常人不一致。当大革命进入高潮的时候，他预言革命的危机，当“虚假的革命”失败的时候，毛泽东预言：真正的革命才刚刚开始。

1927年，目睹了蒋介石清党清共的大屠杀之后，鲁迅

沉痛地说：我一生从未见过如此杀人的，而被杀的竟都是书生，他们所犯的罪，无非是写了几篇文章，宣传了某种学说。

而在毛泽东看来，空谈误党，空谈误国，空谈会导致革命失败，空谈会造成杀人如草不闻声。

毛泽东从血光、火光、泪光和刀光中站立起来，他因此认识了一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毛泽东决定用枪杆子实现他的思想。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9月9日，对于毛泽东和中国而言，这似乎是一个咒符般的日子。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环。”

秋收暴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从那一刻起，伟大的中国革命才真正开始。

这是漫长的革命。这是最后的斗争。

133

第七章

父老与“子弟兵”

在毛泽东之前，近代湖南产生的最伟大人物是邵阳人魏源。

魏源与毛泽东，都是伟大的战略家和思想家。不同的只是，毛泽东是革命家，他领导了世界上最波澜壮阔的革命，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而魏源是改革家，他力图推动世界上最古老的王朝实行改革，但那场改革失败了。

魏源的一生是个悲剧，当他的名声和著作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的时候，在故乡中国，知道他名字的人却寥寥无几。

魏源呕心沥血所做的《海国图志》、《圣武记》和《元史新编》，不但没有唤醒沉睡的中国，反而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入侵中国的参考书。

毛泽东与魏源在战略思想上是相通的，基于近代中国的处境，他们发明了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这就包括诱敌深入、防御战中的进攻战、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人，以

及“打到敌人后方去”等等。

魏源的战略思想不为当时所用，这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而他的思想最终却在毛泽东手里发扬光大，并形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宏图战略，这则是中华民族之大幸。

在战略方面，毛泽东从魏源那里汲取了很多，而毛泽东与魏源对中国士大夫阶级痼疾的诊断也是一致的。

魏源的名言是：“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儒家和士大夫阶级空谈了几千年王道，但却使王道脱离了富强。这是历史的大悲剧。

而毛泽东则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王道”与“富强”的统一，从而使王道建立在了富强的基础上——毛泽东推行的“王道”朗朗上口，可歌可泣，被称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更把这种“王道”建立在一支前所未有的军队的基础上，而这支军队叫中国工农红军。

以军队推行王道，以王道节制军队，这是毛泽东的发明。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1千人，到达位于湘赣边境罗霄山脉的井冈山，这支军队原本号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但由于人数实在太少，于是，经过在永新县的三湾村整编之后，改叫了第一师。

当时，井冈山上有两个绿林好汉领导的农民武装，这

两个好汉，一个叫袁文才，另一个叫王佐。袁文才派来与毛泽东接头的代表叫龙清超，因为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毛泽东的演讲。

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很多人都认为，毛泽东此举其实就是投靠了土匪，毛泽东自己则当了“山大王”，因此，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并不是依靠工人，甚至也不是依靠农民，而是依靠“流氓无产者”起家的。

毛泽东确实是在井冈山起家，但他依靠的却是一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军队，这支军队后来被称为“人民子弟兵”。

在奔赴井冈山的途中，毛泽东为他的部队规定了行军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而这也就是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雏形。

当秋收起义部队在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整编时，毛泽东又为这支军队创造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即以党的组织和士兵委员会来打破旧军队的科层制。

所谓“群众路线”，其实就是从“官兵一致”中发展出来的。

“巍巍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头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从无到有靠什么，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

正像这首歌里唱到的那样：从无到有，靠的是共产党，

靠的是毛泽东，那么，共产党和毛泽东又靠的是什么呢？

毛泽东靠的是“父老乡亲”，是数千年中国文明的精髓。

而“人民子弟兵”这个名称的精髓，就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制度之中。因为“子弟”这种说法，所面对的是“父老”，刘邦入咸阳，曾经“与父老约法三章”，而项羽兵败垓下，也曾经说了这样一句话：“无颜面见江东父老”。

“父老”就是中国乡村共同体里的“贤人”，在墨家学说里，他们也被称为“侠”，在普通老百姓眼里，他们便是立足乡村共同体扶危济困、替基层百姓打抱不平的“好汉”。

1973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经这样说：鲁迅是“圣人”，而我只是“贤人”。

正是由于有了“贤人”的存在，中国基层乡村的治理理想，便不再是刑名和利诱，而是思想教育，它主张待共同体的成员如“学生”、如“子弟”，而不是如“百姓”，大而言之，它昭示着中国两条政治路线的分野，一条“胥吏”对“百姓”，一条“贤人”对“子弟”、“老师”对“学生”，而只有后一条线，即只有以百姓为“父老”，方才能够带出了“子弟兵”，只有“老师”对“学生”，才能培养真君子。

这些话，朱子、陆九渊、王阳明乃至曾国藩都说过，他们也都曾立志做这样的贤人，或做“文侠”，或做“武侠”，行侠仗义，从基层改造中国。

而这种治理依靠的，自然是文化和信仰，它所针对的是共同体成员的“心”，而不是“身”，所以，它主张用做学问的方式搞治理，主张读书与治理不可分为两事，这便是“一边打仗、一边生产，一边读书”，这便是“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这便是“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二事”。

极而言之，它强调政治工作的办法与搞学问无异，基本上均在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因此，毛泽东提倡用开会和思想教育的方式解决群众问题，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造成“必也使其无讼乎”这样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宋代的新儒家认为——这样的政治、这样的治理，也就是“三代之治”的理想。

三代尤远，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其实就是毛泽东书里写到的那些鲜活的主张、那些古老而年青的语句，以及共产党当年在井冈山、陕甘宁、太行山的实践。它表明：宋明儒学的最大贡献，便是使读书人深入基层，从基层出

发重新组织社会。而继承了儒家思想这一精华的，就是毛泽东。

什么叫做“与父老约法三章”呢？

1930年，正在遭受王明路线迫害的毛泽东，在江西苏区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详细地阐述了调查研究的方法，说明了怎样以做学问的方式搞治理，共分七条：

（1）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

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

（2）调查会到些什么人？

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如调查商业时，工农学各业不必在座。

(3) 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

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那种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个人或者二十几个人。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就是在做统计时（如征询贫农占农民总数的百分之几），在做结论时（如征询土地分配平均分好还是差别分好），能得到比较正确的回答。自然人多也有人多的坏处，指挥能力欠缺的人会无法使会场得到安静。究竟人多人少，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但是至少需要三人，不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

(4) 要定调查纲目。

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不明了的，有疑义的，提起辩论。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

(5) 要亲身出马。

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6) 要深入。

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作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

(7) 要自己做记录。

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开调查会”，这就是“与父老约法三章”的办法。

日本思想家宫崎市定的名言是：以为毛泽东凭一个人的天才就改变了中国，这是因为人们不了解毛泽东是站在了中国多少圣贤的肩膀上。毛泽东的伟大，不过是他使得“中国道路”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

他说：“近代以来的中国道路，既不落后于西方，当然也没有超越西方，因为中国只是走在自己的道路上。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必然还是如此”。

“浏阳河，转过了几道湾，几十里水路到湘江？江边有个什么县，出了个什么人，领导人民得解放？”

“人民子弟兵”制度，就是从浏阳河畔永新县的三湾村走出来的。

其实，近代湖南，倒是出了两个润之（芝），一个自然是毛润之，另一个乃是曾、胡、左、彭的中坚——胡润芝（林翼）。且有“泽东”，亦有“泽南”。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近百年湖南学风》讲湘军及其创始人罗泽南，他以为湖南学风之要害，全在“以思想建军”，“以学问治世”，而其关键，一言以蔽之，就在于知识分子、读书人与工农兵相结合：

或问（泽南）制敌之道，曰：“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语，其注脚也。”亦本周敦颐主静察机之说。其治军以不扰民为本。视东南安危，民生怨苦，如饥溺在己，与其所注《西铭》相符。军行所至，士民欢腾，或输敌情，或诉所欲，馈肉饷饭，如家人父子，得道多助，屡破大敌，而善以寡击众。众人化之，荷戈从军，蔚然成风。时为之语曰：“无湘乡，不成军”。藉藉人口，而不知无泽南，无湘军。惟泽南以宋儒之理学治兵，以兵卫民，皎然不欺其志。此湘军所以为天下雄，而国人归颂焉。倘好驰马试剑，漫事以

从军攫富贵，豪闾里，而不体泽南之以宋儒理学治兵，以兵卫民之指，意气自雄，是则泽南之志荒，而湘之所以为勇者亦耗矣。自来言宋儒理学，往往小廉曲谨，可以持当躬，而不足以任大事。顾泽南义勇奋发，本之间学。朝出鏖兵，暮归讲道。中间屡遭惨败，而志不挠，气益壮，讨部众而申傲之，或解说《周易》以自遣云。

钱基博先生很以庄存与、刘逢禄这样的同乡自豪，因为无锡乃是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的故乡，而刘逢禄就是率先发现和提拔了魏源这个人才的人。按照他的说法，近代中国的“经世学统”开于江苏，而大成于湖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实便是以朱子语录治军的典范。尤其是他指出，宋儒的缺点，便是将学问与读书考试相结合，从而堕入“小廉曲谨，以持当躬”，而惟有将学问与保家卫国相结合，只有知识和知识分子与人民相结合，方才可以上马杀敌，下马读书，朝出鏖兵，暮归讲道，方才足以“任大事”、成大事。

以理学治军，这就是以王道治军。“军队是所大学校”。毛泽东不仅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而且，他更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

在毛泽东的革命兴起之前，中华文明的武德，差不多已

经失落了近千年了。今天回溯这个历史过程，也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大致说来，春秋时代，军人以贵族为主，自然是很被尊重的，故而有“武士”和“武德”之说。而军人、武士被尊重，并不是因为他掌握暴力，而是因为他有能力制止暴力。“武德”的解释来自楚庄王，他提出“武”的字义便是“止戈”。

看看《商君书》最重要的篇章《农战》，便知我国历史上最健康的尚武时代，便是秦，“又战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有这样的民风、这样的制度，自然便有天下无敌的军队。西汉因为继承了秦“农战”的传统，因此才能够击溃匈奴，但是，因为西汉偏重亲戚权贵，秦以战功行赏罚的制度，即使在武帝时代，却也已经被严重破坏了。如此重亲贵、轻功臣的制度，再希望延续三军用命、为国死战的“秦制”，“此实难矣”。

果然，到了东汉时代，汉人一般都不愿当兵，也不能当兵，兵源多依赖内附的外族，所谓“五胡乱华”之根源，因此早已种下。

唐代建国，府兵制是基础，其核心是选拔品质优秀的农家子入伍，故每次征兵，都是在基层选拔积极分子的仪式，每次退伍，又起到了在基层壮大积极分子的作用。可惜武后以

来，国家不再重视军队，实质上便是更不重视基层，因为国家重视“文辞进士科”，从而轻视边疆、重视中原，从而轻武重文，漠视武德，结果铸成安史之乱，这哪里是偶然的呢？

唐末国家已经无力动员基层，从此便将基层征兵工作，委之于胥吏，这些胥吏则是王安石所谓“奸邪无赖之徒”，于是私兵泛滥，当兵如奴隶、配军，为防止兵士逃走，往往在其面上刺字。故自唐末、北宋以来，直到国民党统治时代，“拉壮丁”就等于征兵。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是唐代的好文章，其中哭天抢地的悲叹，不过凝结为后世两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而已，可见中国之积弱，又哪里是一朝造成的呢？

当兵光荣、光荣者方能当兵，这是共产党在中国所形成的新气象，而一切不抱偏见者，便不能不承认这种事实：共产党的一个伟业，就是结束了落后挨打，毛泽东的一个成就，就是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就是“武德”的体现。以人民战争之汪洋大海，制止了帝国主义旷日持久的暴力，划分出三个世界的蓝图，这就是人间旷世之武德。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拒腐蚀，永不沾”，“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是晚年的毛

泽东夜不成眠，写给人民军队、普通战士的诗，其中讲解的，也就是武德、什么是“王道”。

“从无到有靠什么？”靠的是“父老乡亲”，而在这个虎狼世界上，中华民族“抵抗力”之重新焕发，就在于毛泽东振奋了“武德”。

1928年1月，毛泽东布置部队从遂川县城分兵下乡，与此同时，他还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骂人。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残余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队伍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在庆祝两军会师的大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首次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朱毛会师”的牵线人是毛泽覃。大革命失败后，身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毛泽东的小弟泽覃逃到了南昌，并最终追上了周恩来率领的南昌起义的部队，周恩来派他到叶挺的部队工作，1927年底，朱德派毛泽覃去井冈山与毛泽东取得联系，毛泽覃最终成功地找到了自己的哥哥，也把南昌起义的残部带上了井冈山。

井冈山方圆八百里，却只有八个村子，缺吃少穿，饥饿从一开始就伴随着革命，缺医少药，受伤便等于死亡。毛泽东在1928年10月所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这样写到：井冈山根据地的困难，“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得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

那时，红军的主要食物就是南瓜，米饭很少能够吃到，而他们的口号竟然是：“打倒资本家，吃南瓜！”

从1927年10月到1929年2月，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就是在井冈山这个地方，红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境，战胜了数倍于己的敌人，而当红军撤离井冈山时，由原来的1000人，发展到了1万余人。

毫无疑问，这是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造成这一奇迹的，就是毛泽东“人民子弟兵”的建军思想，它最终凝结为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宣布，“工农革命军”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第四军，从此被称为“红四军”。这一年的年底，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部队来到井冈山，加入了红四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大元帅中，有五位出自红四军，他们是：朱德、林彪、彭德怀、陈毅和罗荣桓。

更多的人在极其残酷的斗争中牺牲了，绝大多数是倒在了战场上，但也有人是被自己人所清洗。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形成了以工人为主体的领导层，而其中不少人认为，井冈山就是个土匪窝子，红四军不是由布尔什维克组成，而是由流氓无产者掌权。而在被当作土匪而清洗的人中，就包括王佐和袁文才。

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提出了《农民问题决议案》和《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而其中有一个内容就是：对所有在暴动期间帮助过共产党的土匪头子，必须清洗掉。

1929年1月1日，蒋介石发兵3万“会剿”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3600名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希冀以此“调虎离山”。刚上山的彭德怀负责留守，而王佐和袁文才则负责协助他，但朱、毛刚刚离开，留守的部队便发生内讧，王佐和袁文才在被追杀的路上，一个被击毙，一个跳到河里被活活淹死。

1965年5月29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接见了井冈山群众代表。毛泽东拉着王佐和袁文才遗孀的手，久久不放，

他深情地说：王嫂子、袁嫂子，你们可好？我是毛泽东啊！

袁文才的遗孀谢梅香端详了良久，方才说：毛委员，是您！您回来了，您胖多了——

王佐的遗孀罗夏英则说：毛委员，您记得吗——那天晚上在茅坪开会，我给你炖了鸡，你那时好瘦啊——

言罢罗夏英泪如雨下。

毛泽东连连叹息，他当时郑重地说：“王佐和袁文才两位同志，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有贡献的！”

王佐和袁文才，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贤人”，这两个大侠，就是井冈山客家子弟眼中的“父老”，而丧失了“父老”的支持，红军也就无法在井冈山立足了。

王佐、袁文才被害后的一个月，即1929年2月，红军不得不彻底放弃井冈山根据地。

在下山的途中，毛泽东亲历了他一生中最危险的战斗，那次，毛泽东亲自持枪参战——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这一年的2月9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一，在距江西瑞金县城约60里一个叫做大柏地的地方，红军与追剿他们的湘军主力展开殊死激战，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毛泽东提枪亲率警卫排向敌军发起冲锋。

鏖战持续了三天三夜，直到十一日下午，才全歼敌军。

离开了井冈山，红军能够去哪里呢？毛泽东为红军选择的第二个落脚点是闽西，而像井冈山一样，那里同样是客家人的聚居地。

“客”就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客家”的说法，可以追溯到北宋，宋代把人口划分为“客户”与“主户”，所谓“主户”就是有土地的地主，而“客户”则是无土地的佃户。北宋灭亡后，大量北方人口迁徙南方，由于平地早被当地人占据，这些迁徙的人口只能聚居于山区，他们被称为“客家人”，客家人由中原万里迁徙而来，他们是最能吃苦、最能战斗的汉族人。

1929年3月，毛泽东指挥红军进入闽西长汀，在占领长汀之后，红军夺取了一个拥有新式缝纫机的军服厂，从那时起，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中国工农红军，终于第一次穿上了统一的军装——而且是一人两套，红军也第一次有了军饷——每人五块钱，官兵完全一致。

同年5月，毛泽东指挥红军再占龙岩、永定，开辟了闽西红色根据地。

红军进入龙岩时，当地客家百姓涌上街头，想看看传说中的“朱毛”是什么样子，结果，他们看到的是一支衣

衫褴褛但斗志昂扬的军队，这支队伍当时只有一匹马，那匹马上驮着的却是个正在打摆子的小兵，而牵马的马夫则是军长朱德。

从1929年3月到1934年10月，红旗一直在闽西的红土地上飘扬，闽西根据地存在了5年，它是除陕甘宁外，共产党经营时间最长的红区。

从井冈山下来的红军能够迅速地占领闽西，并站住脚跟，除了后来广为人知的闽西共产党人张鼎承、邓子恢的呼应外，与另一位当地“父老”的帮助最有关系，这个人叫做傅柏翠。他的传奇，与广东海陆丰澎湃的故事极为类似。

傅柏翠，1896年9月出生，小毛泽东三岁，是上杭蛟洋镇一个大财主的儿子，1914年傅柏翠赴日本留学，1917年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而那个时候的毛泽东，正在湖南一师苦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并撰写雄文《心之力》。

留日期间，傅柏翠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回国后，傅柏翠成为福建第一个开业律师，他劝说父亲把田地分给农民，并替穷苦人打官司，与官府衙门相对抗，在故乡上杭乃至整个闽西，傅柏翠一时颂声四起。

由于军阀混战，为保卫乡里，傅柏翠号召组织成立了一千多人的农民自卫团，军阀恨他、怕他，称他为“学生

皇帝”，而老百姓敬他、爱他，称他为“闽西百姓的王”。

年青的傅柏翠被闽西百姓视为“父老”，而他组织的农民自卫团，则是一支闽西子弟兵。

大革命期间，傅柏翠在上杭国民党党部工作，那个时候，他就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但因为是大财主出身，他的入党申请被拒绝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傅柏翠再次向福建特委书记罗明提出入党申请，这一次，他的申请被批准了。

像澎湃一样，傅柏翠背叛了自己所属的阶级，1927年7月，当共产党到处被屠杀的关头，傅柏翠毅然加入共产党，他参加革命，出于毫无功利的目的，出自纯粹的信仰。

1928年8月，傅柏翠发动上杭农民暴动，创立了红七军，1927年9月，傅柏翠率部迎接南昌起义的残部入闽，因此结识了周恩来和陈毅，1929年底，他再次张开怀抱，迎接井冈山下来的毛泽东和走投无路的红四军进入自己的闽西故乡。

傅柏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学都有极为精深的了解，而当时的毛泽东，被张国焘说成是混在土匪和草寇堆里，羽扇纶巾的“白衣秀才王伦”，能够在闽西这种地方遇到博古通今的傅柏翠，毛泽东自然大喜过望，他们立即互相引之为至交和知音，从此，擅长词赋的毛泽东与傅柏翠经

常在一起互相唱和，谈古论今。

虽然傅柏翠小毛泽东三岁，但毛泽东却一直尊称他为“闽西傅先生”，且终生没有改口。

傅柏翠极为钦佩毛泽东，初到闽西的红军连统一的军装也没有，而面目清瘦的毛泽东竟是穿着一身蓑衣来见傅柏翠的，于是，傅柏翠立即将自己的坐骑赠送给毛泽东，可惜那匹宝马认生，一下子就把毛泽东掀翻在水塘里，而当傅柏翠把水淋淋的毛泽东从水塘里拉出来时，两人的手紧紧地拉在了一起。

进入闽西，红军才第一次穿上了自己的军装，而遇到了傅柏翠，毛泽东则找到了无所不谈的知音。

正像刘邦当年入咸阳与当地“父老”约法三章一样，入闽之初，毛、傅二人，互相酬唱，毛泽东诗兴大发，他写下了如下意气风发的诗句：

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在闽西，井冈山下来的红四军改编为纵队，第一纵队司令林彪，第三纵队司令伍中豪，而第四纵队司令则是傅柏翠。

1930年2月，毛泽东率红军离开闽西进军赣南，而张

鼎成、邓子恢、傅柏翠则留守闽西，毛泽东带走的是闽西子弟兵，在行军途中，毛泽东想起了傅柏翠，他写下的《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原词起首二句原本是：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无柏翠。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毛泽东后来说，这首词是“在马背上哼成的”，而毛泽东当时的坐骑，正是傅柏翠赠送的那匹宝马。

1957年，在人们的反复建议下，毛泽东才将“雪里行军无柏翠”一句，改为了“雪里行军情更迫”。

毛与傅的友谊，由此可见一斑。

闽西上杭这个地方，出了两位姓傅的“父老”，他们对红军的成长与发展举足轻重，一位是傅柏翠，而一位，则是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基督医生”的红军医院院长傅连。

那个时候，毛泽东结交的是绿林、侠客和父老，而在这些人背后，站起来的则是成千上万的子弟兵。

一条浩瀚的汀江，环绕着客家人美丽的家园。闽西曾经接纳了万里逃难的客家人，而1929年，闽西再次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福建成为了成为红军的“福地”和故乡，而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就诞生在闽西这块英雄的红土地上。

第八章

古田与“星星之火”

155

在创立红军时，毛泽东运用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而随后，他更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塑造这支军队。

毛泽东希望红军成为一支有思想、会思考的军队，这就是所谓“思想上建军”。

所谓“有思想、会思考”，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善于总结战争的规律。毛泽东认为，红军应该通过具体的战役，以总结战争的规律性。能够把战役、战术这种“看得见”的东西，通过思考上升为“战略”这种“看不见”的东西。第二，红军应该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第三，红军应该了解世界发展的规律。第四，红军应该善于运用上述这三种规律，来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

毛泽东后来说，党在军队里的工作，就是研究和思考战争的规律、中国发展的规律和世界发展的规律。因此，所谓“思想上建军”，这表现在组织上，也就体现为党对

军队的领导。

毛泽东说，党就是红军的“首脑部”。

但是，当时的红四军，却对毛泽东所极端重视的这些“规律性”的东西很少思考，红四军是从失败中走出来的，部队四处转战，连停留整训的时间都没有，自然无暇思考毛泽东提出的那些“大问题”，而毛泽东说，这就不免使红军陷入了“游击主义”和“流寇主义”。

在当时的红军领袖们看来，红军的任务就是埋头打仗，是以打仗扩大红军的影响力，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以打仗来彰显红军的“存在感”，对于红军斗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则非常茫然——而这就是毛泽东所谓的“纯粹军事思想”的统治。

毛泽东的特殊性在于，他是军人中的思想家，是思想家中的战略家，把战争升华为哲学，这是毛泽东的创造。

在毛泽东看来，由于不掌握战争的规律、社会发展的规律，红军的领袖们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只是一些“经验主义者”。

让当时的红军理解毛泽东，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地位并非从一开始就是非常稳固的，毛泽东的战友们当然也不都是善于思考、能谈古论今的傅

柏翠，他们并不是与毛泽东在各方面都有着共同语言。

以至于上世纪80年代，当年红四军中林彪的下属江华还是这样说：

那时毛泽东对于干部要求高，要求严，批评人也是很严厉的。对一些营团级负责干部的缺点错误，他也毫不留情地当面批评、训斥，常常使人难以接受，下不来台，因而有些同志对他是很很有意见的。

这表明，毛泽东只是被人怕，而不是被人理解、被人懂。

伟大也要有人懂，毛泽东是孤独的——而这正是他一生的悲剧。

毛泽东的旧部中，像江华这样曾被毛泽东严厉批评过的，并不在少数，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谭震林。

谭震林是红四军第一届前敌委员会委员，当时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是毛泽东，而淮海战役时，谭震林又担任了前敌委员会委员，那个时候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是邓小平。

“谭老板”的“老资格”，可见一斑。

1967年，谭震林因为对中央文革的动乱破坏行为不满，在中南海怀仁堂拍案而起，他当时这样激动地说了不甚符合组织原则的话：我一生有“三不该”，第一，我不该活这么长，看到国家乱，我心里闹得慌。第二，我不该跟着

毛泽东上井冈山。第三，我不该加入共产党。

江青当场便打电话把谭震林的话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让谭震林接电话。他问谭震林：这话是你说的？

谭震林正在气头上，便回道：我说了又怎样！

毛泽东说：好吗，不过我倒要问问你，你上井冈山，是我毛泽东抬你去的还是绑你去的？你既然后悔加入共产党，你可以随时退党吗！你说自己不该活这么长，你可以死吗！

“霸得蛮”是湖南人的秉性，毛泽东更不是好惹的。

谭震林资格不可谓不老，但毛泽东对他的训斥，可谓声色俱厉、毫不留情。

在闽西，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之间的分歧，围绕着前敌委员会这个组织，终于爆发了。

毛泽东非常重视红军“总前委”的建设，因为前敌委员会这个机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机构，它是一个统摄政治、军事、社会和经济为一体的领导机构，只有在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方才能够凸显红军的工作不仅仅是纯粹军事性的，而是政治性的。

在毛泽东看来，“总前委”应该体现的，正是党对红军的领导，而“总前委”的任务，就是思考和战略性的问题，

就是为红军制订正确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对于红四军中存在问题的批评，也主要体现在对于总前委的批评。

“前敌委员会”这个机构，原本是党中央指定设置的。1928年6月4日，上海中央在给红四军的信中指定：由毛泽东、朱德，再加一工人、一农民的代表以及前委所在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五人组成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统辖红四军和湘赣地方党政工作。

但6月下旬，中央再来指示，任命杨开明为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毛泽东回到红四军担任政治部主任，只负责军队的工作，根据地的党政工作就不必再管了。

1929年5月，中央再次指示，红四军成立临时军委，刘安恭为军委书记，这样，就出现了在军队中“前委”与“军委”、“特委”互相掣肘的问题。“前敌委员会”其实在党、军队和根据地都已经成为了摆设。

于是，1929年6月8日，在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撂了挑子。

他在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总前委不“议政”，不研究思想路线、不思考“大问题”，以至于党在军队里成了纯粹的摆设，成了部队的附庸和鸡肋，自己不能担负

这种不死不活的责任，毛泽东要求马上更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

当天夜里，林彪派江华给毛泽东送来一封急信，心机很重的林彪，坚决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林彪认为，现在有人巴不得毛泽东离开前委，如果毛泽东自己撂了挑子，这就等于授人以柄。

江华后来回忆说：毛泽东看了这封信之后，没有表态，只是说：信放这里，没有别的事了，你休息去吧。

江华说：那一夜自己一直不能入睡，而他后来才知道，收信人毛泽东和写信的林彪也都是辗转反侧，彻夜未眠。

6月14日，毛泽东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复信，毛泽东告诉林彪：不要把个人的得失放在头里，而要把思想和政治的问题放在心上。自己要争的是思想上的是非，而不是个人的权力。

他还告诫林彪说，要学会多思考些“大事”，不要纠缠于个人得失这种“小事”。

林彪是毛泽东的爱将，但林彪自己却总喜欢说——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而毛泽东毕生对这个“好学生”的最大不满，就在于林彪关键时刻总是“想法”太多，把个人权位的得失，置于了思想路线的思考之上。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毛泽东毕生对自己的这个“好学生”，爱甚而痛甚。

当然，林彪的担忧也从来就不是不是多余的。

当时的红四军将领，对于毛泽东所强调的战争的规律、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世界历史的规律这种大问题，既缺乏理解，也不感兴趣。于是，在他们看来，毛泽东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无非就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家长制”权威，而毛泽东强调“思想建军”，实际不过是贪恋“总前委书记”这个职务。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在龙岩公民小学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由陈毅主持，会议逐条批驳了毛泽东对于红四军中存在问题的批评，并认为毛泽东存在着严重的“家长制”作风，毛泽东想把自己的意志凌驾在红四军之上。

大会最终选举陈毅、朱德、毛泽东、林彪、傅柏翠、伍中豪等13人为新的前敌委员会委员，选举陈毅为前敌委员会书记，会议决定：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毛泽东第一次被从红军的领导岗位上赶下来，这件事就发生在闽西的龙岩。

正是陈毅主持召开的红四军七大，撤销了毛泽东总前

委书记的职务。

林彪的预见变成了事实。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病倒了，他发了疟疾。

这一年的8月，毛泽东来到永定的金丰大山，住在一个小竹寮里，不过，病中的毛泽东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消极落魄，他写了一块匾额，挂在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门上，命之曰：饶丰书房。

病中的毛泽东四处找书读，而且还找到了一本《模范英语读本》，于是，毛泽东经常在自己的“书房”里念英语，跟随毛泽东一起来到永定的湖南老乡曾志，曾经读过教会学校，她总是被毛泽东充满湖南口音的英语发音逗得忍俊不止，而毛泽东则毫不以为意，继续他大声的朗读，旁若无人。

蒋介石骂毛泽东是“土匪”，但在中国历史上，恐怕还找不到这样一个读洋文的“土匪”。

这个时候，对毛泽东照顾最多的人还是傅柏翠，当得知毛泽东下乡时身边只有5块钱时，傅柏翠立即送来了500大洋，而毛泽东却说，现在部队正是用钱的时候，我现在只是休养，不需要钱，于是把钱退了回去。

毛泽东一生嗜书如命，对他而言，有书足矣。

1929年9月，红军攻克上杭，在朱德主持下，红四军在上杭县城太忠庙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当时的毛泽东正发疟疾，全身浮肿，写信向大会请假，而红四军八大代表却以为他是在闹情绪，他的假条没有得到批准，于是，重病的毛泽东被担架抬到了会场。

当时的毛泽东，境遇甚是可怜。

此时的红四军正值大胜之后，但是，对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红军究竟该往何处去、如何发展，则莫衷一是，会场里的“骄兵悍将”们吵成一团，前敌委员会也拿不出一个行动方案，甚至连朱德也控制不了局面。

毛泽东关于红军即将陷入经验主义和纯军事主义的预言，终于成为了现实。

在会场外一棵大树下，朱德与躺在担架上的毛泽东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面对队伍中的乱象，朱德终于开始理解毛泽东关于在军队中进行党的建设的主张。

由于龙岩缺医少药，毛泽东的疟疾一直没有治好，于是，傅柏翠将毛泽东安排到了上杭的临江楼居住，并找来了一位西医给毛泽东看病，临江楼面对汀江，眼底风光如画，这是上杭城里最好的房子，在西医的调治下，毛泽东的疟疾在十多天后终于被治好了。

1929年10月11日，农历重阳节，临江楼庭院里黄菊盛开，楼下的汀江霜花一片，大病初愈的毛泽东登高望远，触景生情，写下了著名的《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而当时的共产国际却以为，毛泽东已经病死了。

1930年初，共产国际的机关报《国际新闻通讯》发表了长达千字的讣告，其中说：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完成的他的历史使命”。

这个讣告是有价值的，它肯定了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贡献，毛泽东后来历经挫折，但终究

没有被彻底打倒，就与共产国际这次对他的“盖棺论定”，有着一定的关系。

毛泽东大难不死，当时，他这样对志说：我这个人命大呢，鬼门关都让我给闯过来了。

这一年的九月，以李立三和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听取了专程来上海汇报工作的陈毅的报告，陈毅如实地汇报了红四军内部的争论，特别是队伍难带的苦恼。而中央则给红四军前委写了一封指示信，而这就是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信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领导的思想，指示红四军按照中央的要求，正确对待毛泽东，正确理解毛泽东对红军存在问题的批评。

陈毅回到闽西后，立即召开了红四军前委会议，会议决定，由陈毅亲自前往毛泽东的住地，请他回到红四军复职。

在文化大革命中，陈毅曾经对围攻他红卫兵们坦然地说：你们说我反对毛主席，这当然是事实，我确实反对过毛主席，但是，当我知道反对错了的时候，就立即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而毛泽东晚年则感叹说：陈毅是个好同志，他是一贯支持我的。

毛泽东还说过：要正确对待那些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

一朝天子一朝臣，那个不好。

11月26日，毛泽东在陈毅的陪同下，回到红四军。11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针对部队所存在的松散情况，大家一致认为，红四军此时如果不加以整顿和训练，如果不通过整训统一思想，那么这个队伍就没有办法带下去了。

于是，会议决定，红四军在12月进行学习和整训，并准备召开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回到红军队伍中的毛泽东，当天夜里立即给中央回信，信中说：现在大家已经实现了团结，我身体已好，请中央放心。目前唯一的问题是党员的理论水平太低，连政治常识都不具备。

而毛泽东给中央提出的要求是：请迅速把党的机关刊物寄来，并请代买一批理论书籍，当务之急，是必须加强对于党员的教育。红军必须一边打仗，一边学习、读书和思考。

闽西上杭有两个大的镇子，一个是傅柏翠的故乡蛟洋，一个则是古田。

1929年12月18日，经毛泽东提议，在上杭古田镇的和声小学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而这就是著

名的古田会议。

和声小学原为廖家祠堂，祠堂的门口有一幅大气磅礴的对联，上联是：“学术仿西欧开弟子新知识”，下联为：“文章宗北郭振先生旧家风”。

毛泽东选择这里作为开会的地点也是有深刻用意的，而毛泽东的用意就是：要把红军办成一所“大学校”。

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次学术会议、思想会议，会议第一次在红军中广泛地讨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研究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规律问题、党和军队的思想路线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古田会议的会址和声小学，在会后更名为“曙光小学”。

正是从古田的曙光中出发，红军成为了一支有文化、有思想的军队，成为一支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

“胜利从古田走来”，这就是因为思想从古田走来，“枪杆子”与“笔杆子”的结合，就是从古田走来。

120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开了十多天。

在红军内部，第一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会议上历数了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这包括：缺乏战略思考，陷入了单纯的游击主义，没有建设

根据地的思想，而把自己等同于流寇，不了解社会和历史，仅凭单纯的军事观点办事。而这些错误思想的实质就是经验主义，在红四军中，就充满了这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简而言之，在毛泽东看来，当时的红军是一支不讲政治、没有思想的军队。

这样的队伍，是走不远的。

而毛泽东提出，战争的规律、社会的规律、世界发展的历史规律——这些问题，在红军队伍里必须经常讨论，不仅军队的高级干部要讨论，连、排、班一级也要讨论。

正是为了经常性的讨论这样的问题，就必须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把党的小组，建立在排和班上。

古田会议重新选举了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书记，朱德、伍中豪、林彪和罗荣桓都当选了前敌委员会委员，但这一次，傅柏翠却因为家中有事不能与会，在选举意外的落选了，而这次落选前委委员，对傅柏翠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此后坎坷的命运。

一向反对毛泽东的红四军宣传科长杨岳彬，也当选了候补前委委员，1934年，杨岳彬叛变投敌，做了叛徒。

古田会议结束后，元旦就要到了，心细的林彪给毛泽

东送来了一张贺年片，敏锐好学的他身体力行，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立即就开始思考“大问题”了。

林彪给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的“大问题”，例如：怎样从世界形势出发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形势？什么是红军应该采取的战略？中国革命和红军的前途如何？

后来的林彪以在军中一贯“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而著名，而林彪第一次思考“大问题”、政治问题，就是在古田会议结束之后。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林彪回了一封长信。对林彪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回答。

1948年12月，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刻，林彪向党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发这封闽西时代的通信。只是，心事细密的林彪当时还提出，公开刊行这封旧信的时候，不要提他的名字，而毛泽东心领神会，同意了林彪的意见。

毛泽东为这封信重新拟了一个标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首先分析了中国与世界的形势。

毛泽东说，世界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为苏联这个红色政权的存在提供了

可能性。

那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呢？毛泽东说，这也是由于中国与世界发展的不平衡，这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有不同的代理人，于是，“全世界只有中国存在着统治阶级内部长期互相混战这种怪事”。

正是这种不平衡性，决定了中国的红色政权可能存在。这就是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灭了南方有北方。”

而只有建立红色根据地，“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其次，关于红军的战略。

毛泽东说，正是“不平衡”的特点决定了，红军不可能立即取得全国的胜利，但是，红军却能够取得局部性的、“区域性”的胜利，能够取得武装割据和根据地的胜利。

也正是“不平衡”的特点决定了，红军不可能理解消灭强大的敌人，但却可以集中力量，消灭强大敌人的一部分，即尽可能地消灭“大一点的”的敌人。

于是，在这封党内通信中，毛泽东简明地概括了他的军事思想，并与“游击主义”划开了鲜明的距离。

毛泽东认为，当前红军的战略应该是“防御中的进攻”，红军的战斗，既不是克大敌，也不是求小胜，而是在保存自己的前提下，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而红军应该采取的方法是：“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人”。

尽管人们往往把毛泽东说成是“游击战的大师，”但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明确地表示：他的军事思想绝不是“分兵”和“游击”：

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

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就是因为贯彻了毛泽东的这种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思想。而1948年，毛泽东之所以坚持率先进行辽沈战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当时的全国范围内，只有在东北地区，我军的兵力超过了

国民党军的兵力，而集中优势兵力拿下东北，其政治影响，还要大于军事影响。

而这就是在辽沈战役结束后，林彪要求公开发表毛泽东这封旧信的原因。

第三，关于革命和红军的前途。

正是这种“不平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既不是“速胜论”，也不是“失败论”所能概括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早晚要到来的，但是，却不会在一天到来，而争取革命的胜利，必须既满怀理想，又有进行持久战的准备。

像毛泽东的其他雄文一样，这篇高度理论化的文章，却以一种诗情澎湃的语言作为结尾，可见他当时的感慨万千：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婴儿。

新中国、新世界乃是“母腹中快要成熟了一个婴儿”——这种诗情澎湃的说法，其实就来自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伦理学笔记》批注中的一段话。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饱含深情，文采飞扬，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出发，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进行了高屋建瓴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红军斗争的正确战术。

这篇文章，是《古田会议决议》的浓缩版，但是，对当时毛泽东的战友们来说，能够理解他深邃的视野和理论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红四军内部的争论告一段落了，而在当时的整个党和红军中，很长时期却依然缺乏对毛泽东提出的那些问题的理解和认识，而这些问题就是：对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革命战争的规律的认识，历史证明，要认识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随后在中央苏区进行的斗争与争论，就是古田争论的深入和放大版。

而那场争论，则是通过遵义会议才得以解决。从这个

意义上说，古田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基础，它为遵义会议准备了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红军内部思想路线和战略战术分歧的方才能够得以正确处理。

古田会议结束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红四军立即开赴闽北，矛头指向赣南，以打破赣军对闽西根据地的围剿。

当时，贺子珍面临生产，像当年把杨开慧托付给了李振翩一样，毛泽东这次把贺子珍托付给了傅柏翠，于是，贺子珍留在了上杭蛟洋傅柏翠家，而毛泽东则率部去了江西。

在告别古田和闽西这块热土的时候，毛泽东留下了两句话，一句是给自己的：“离开闽西”，而一句则赠给留在闽西的傅柏翠和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巩固闽西”。

行军途中，恰逢元旦，毛泽东在马背上吟成《如梦令·元旦》一首：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卷红旗如画。

177

第九章

“战友乱发的流弹”

古田会议，标志着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思想的形成。

但是，整整7年之后，即1936年的12月，毛泽东才有可能把这一思想比较全面地讲述出来，而那时他讲课的地点已经是陕北的红军大学，而毛泽东讲课的题目，就叫《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色是什么呢？

毛泽东回答说：

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

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即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们的十年战争史证明了这个规律的正确性。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

“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这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决定了革命不可能迅速地取得胜利。“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则决定了革命可以在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取得突破和胜利，而在敌人力量集中的中心城市则不可能取得这样的突破和胜利。“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在物质上、兵源上的支持，则是红军发展壮大，由弱变强的根本。

根据上述特点，毛泽东为红军制订了克敌制胜的战术，它又分为六条：

- （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 （二）有利作战的阵地；
- （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 （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敌人疲劳沮丧;

(六)使敌人发生过失。

而在战机的选择与捕捉上,必须以这六条为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在这六个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才可以迅速地向着敌人发起进攻。

1929年-1933年,也就是根据上述的“四点六条”,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使红军的战略,建立在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基础上,他指挥这支有思想、有战略的军队,战胜了数十倍于己的敌军,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在这四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开辟了“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领导创立了赣南、闽西两个红色根据地——即中央苏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他由“毛委员”,第一次成为了“毛主席”。

这四年,也是他一生中写诗最多、最好的时期。

这四年,铸就了毛泽东此后的形象:一位导师、一位统帅、一位诗人。

但是,对毛泽东而言,这四年也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鲁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

而这四年中,毛泽东有数次就几乎死于“战友乱发的流弹”。

那些向他乱发流弹的战友,则是斯大林送给中国革命的礼物。

1928年3月下旬,苏联冒着巨大的风险,花费大量的金钱,把110名中共代表偷渡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召开了中共六大。

斯大林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的根源,就是由于中共的领导层是由软弱的知识分子组成,而作为文人的瞿秋白,就是这样一个软弱的典型。因此,中共中央必须彻底改组。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中共六大选举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党的总书记,李立三、项英、张国焘等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绝大部分成员都是领导城市暴动的工人出身,以至于周恩来后来说:“那简直是暴徒一大帮”。

那些在国共合作期间被苏联“雪藏”起来的工人领袖，这一次终于被全部解冻了。

身在红军队伍中的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共六大，只是被选举为中央委员。

而两年之后，共产国际竟然宣布毛泽东已经病死了。

1928年，斯大林竟然给中共发来了一个“党中央”，这在中共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几乎都算是一件奇闻。

莫斯科派来的党中央负有领导中国革命的使命，但在此之前，中央的大多数成员却都没有去过中国的红色根据地，甚至也从来没有见过中国工农红军。

而这一奇闻最奇特的地方更在于：在随后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共早期工人领袖们，也遭到了排斥，而时年27岁的王明和26岁博古，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干部，竟然领导了中共中央，而此前他们几乎没有在中国工作过。26岁的顾作霖则当上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而此前的他，竟从来经历过打仗是怎么回事。在巴伐利亚搞工人暴动的奥托·布劳恩则负责指挥红军，可他连中国话都不会说，而直到中央苏区丧失，布劳恩都是通过看地图认识这块红色根据地的。

毛泽东后来把中共六大后形成的错误路线概括为“冒

险主义”和“逃跑主义”。因为那些人大概只会两件事：形势好一点就冒险，形势一坏就逃跑。

希望这些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1936年，毛泽东这样总结说：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了下述的两个错误：其一，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争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了。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不过，一旦考虑到纠正这些错误的代价，是毛泽东所

说的“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一旦考虑到毛泽东的妻子、弟弟和妹妹就在这些牺牲者的行列里，那么，讲这番的毛泽东的心情是难以想象的。

他必定是坚强者中的坚强者。

以向忠发为首的新的中央回国后，立即推行他们攻打大城市的盲动政策，向忠发的主要助手，便是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李立三。

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李立三，从来没有去过苏区，甚至也没有见过真的红军是什么样子，他明显地夸大了红军的力量，李立三坐在办公桌前颁发的那些“军”的番号，往往连一个师的兵力都没有。

1930年7月，李立三命令全国红军向大城市发起总攻：毛泽东、朱德的红一军团进攻南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进攻武汉，邓小平、张云逸指挥广西红军进攻广州和长沙。以此形成“全国革命的高潮”。

根据中央的指示，红四军、红六军和红十二军整编为第一路军，这就是后来的红一军团，毛泽东任红一军团政委和前委书记，朱德为总司令。

1930年6月，红一军团各部向广昌集中，准备一举夺取九江和南昌。

毛泽东那首著名的《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就是在这个时候——即各路红军在向广昌集结的道路上写下的。

然而，在进入江西之后，毛泽东却立即发现南昌、九江之敌皆强，这两处四面环水的大城市很难攻下，他的脑子迅速冷静下来，在分析了敌情之后，毛泽东修改了红军的战略。

在前敌委员会上，毛泽东提出：攻击大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红军应该放弃攻打南昌、九江，转而攻击敌人薄弱的环节。

因湘军正驰援南昌，湖南空虚，于是，在南昌城下虚晃一枪之后，毛泽东遂突出奇兵，率军进入湖南，连克浏阳、醴陵。

随后毛泽东更把“一省首先胜利”的观点，修改为在一省的“一部分”取得胜利的设想，而这就是占领吉安、瑞金这样的小城市及其周边的广大区域，并以瑞金为核心，建立红色根据地。

毛泽东的战略卓有成效，到1930年底，赣南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红色根据地，而这块根据地，就是后来的中央苏区。

但是，当得知毛泽东没有进攻南昌，而是率军走向了

湖南之后，李立三即以中央的名义致信红一军团前委，尖锐地批评毛泽东：“忽视城市，重视农村，完全反映了农民意识，犯了政治上机会主义的错误”。

1930年7月27日，原本奉命攻击武汉的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以突袭的方式占领长沙，这一侥幸的胜利，给了李立三巨大的鼓舞，于是，他一面发出全国暴动的命令，一面要求苏联出兵东北和内蒙，里应外合，配合中共夺取全国政权——这个计划所代表的，就是完整的“立三路线”。

红三军团仅占长沙一个星期，就被迫撤出了，而被中央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毛泽东，则不得不率领红一军团与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汇合，再攻长沙。

红一、三军团对长沙的合围进行了一个月，损兵折将，伤亡惨重，到9月13日被迫撤围。

而毛泽东本人则立即成为了“立三路线”所造成的恶果的最大受害者。

红军撤出长沙之围后，恼羞成怒的湖南省主席何健马上就派一连兵去韶山挖了毛泽东的祖坟，而这一年的10月，何健又派兵去板仓，抓捕了杨开慧和毛泽东的三个儿子。

李立三的盲动政策更令苏联和共产国际大惊失色，因为苏联的策略，其实是在中国东北和内蒙采取绥靖政策，

全力保持与日本的关系，不触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这样，苏联就可以全力以赴以对付来自西方的压力。而李立三的“盲动”，却等于把苏联陷入到东西两面作战的窘境之中。

在共产国际看来，李立三要求苏联出兵中共东北和蒙古，必然给日本进攻苏联以借口，李立三的计划不仅是“盲动”，而简直就是发疯。

然而，李立三和向忠发却不像瞿秋白那样软弱，当共产国际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之后，愤怒的李立三和向忠发大骂苏联自私自利，一点“国际主义”色彩都没有。而这种公然的“犯上”之举，是共产国际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共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当时，苏联正在斯大林的指挥下大行肃反，凡是被怀疑为对斯大林的领导三心二意者，都成为了肃反的对象。而当时的中共竟然敢于不听话，自然令斯大林大为光火，他决定，对中国共产党也必须进行严厉的整肃，于是，共产国际决定立即把李立三叫到苏联去训斥，并派在苏联肃反中有功的米夫，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上海，再次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

苏联的肃反，就是这样扩大到了中共党内和中国的苏区。

在米夫到来之前，1930年，中共中央在瞿秋白和周恩来的主持下，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六届三中全会撤了李立三的职，同时决定由中央直接派人、派机构去苏区，取代毛泽东领导苏区和红军。

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两个中央派驻苏区和红军的机构：一个是苏区中央局，一个是苏区中革军委。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苏区中央局为中央派驻苏区的最高领导机构，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9人组成苏区中央局，任命刚刚从苏联回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项英为书记，在项英未到职期间，可暂由毛泽东代理书记。

同时，共产国际派刚从苏联回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王稼祥进入苏区中革军委，接替毛泽东，担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

1931年4月，项英、王稼祥和顾作霖到达苏区，参与中革军委的领导工作。

但是，王稼祥一到苏区，就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所折服，转而成为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

毛泽东后来多次说过：苏联回来的人并不都糊涂，王稼祥和张闻天，就是两个难得的明白人。

王稼祥与张闻天一样，都毕业于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这两位红色教授是中国共产党中职称最高的，他们是一对书呆子，也是党内著名的老实人，这两位读书人是较真的楷模，也是实事求是的楷模。他们在最关键的时刻支持了毛泽东，实际上，没有王稼祥和张闻天，就没有遵义会议，就没有后来的毛泽东。

而项英从莫斯科回来后，却没有立即赴苏区到任，而到任后，领导“二七罢工”起家的项英，也觉得自己确实不熟悉红军和苏区的情况，不能掌握局势。

于是，1931年10月11日，苏区中央局联名致电临时中央，指出“项英的工作能力不够领导”，“决定毛泽东代理中央局书记，请中央批准”，电报还建议：苏区中央局应该随红一军团行动，同时建议扩大中央局人数，以彭德怀、林彪、周以粟、曾山、陈毅等原在苏区的同志，为中央局委员。

中央没有批准这个电报，而是指示说：中央局的办公地点必须设在瑞金，负责苏区工作全局，不能随军行动，中央局的人数不必增加。中央还认为，既然项英能力不够，那就派周恩来到苏区来。

而那时的中央已经换人，王明和博古成为了党中央实

际上的领导者。

1931年的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原本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陈绍禹（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直接进入中央政治局，几天之后，米夫同样是没有经过任何程序，就直接指定王明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让王明与向忠发和周恩来一起主持中央工作。而与王明同样一天也没有在中国工作过的博古，则被任命为中央委员，少共中央书记。

米夫是在肃反中崛起的，他因为肃反有功，遂取代拉迪克担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这位校长在中山大学厉行肃反，打击了大批中国留学生，而他所依靠的，便是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王明、博古就是米夫的当时翻译，是“二十八个半”的首脑。

到达上海后，米夫立即指定他在莫斯科教过的学生一起出席中共四中全会，而在当时，这些年轻人中没有一个是中央委员，但他们却占了与会人数的三分之一。

六届四中全会造成了中共中央的分裂，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党内骨干强烈反对米夫破坏组织程序的做法，更反对王明、博古未经选举就进入党中央领导层，他们在上海三马路的东方饭店召开秘密会议商议对策，当会议召开时，

国民党特务冲进来，与会者被一网打尽。中共城市骨干24人悉数被捕。

何孟雄是中共的老干部，大革命时代，他就与毛泽东一起领导过湖南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林育南则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的领导人，时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他是林彪的哥哥。李求实时任团中央宣传部长，是中共南方局书记和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主编。

李求实也就是李伟森，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作家柔石、冯铿、胡也频和殷夫。

柔石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而诗人胡也频则是作家丁玲的丈夫。得到胡也频被捕的消息后，丁玲这个弱女子在上海的凄风苦雨中四处无望的奔走，而几天后，她等到的却是胡也频等人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杀的消息。

1931年2月，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24人，被国民党杀害于上海龙华。

其中柔石身中十弹，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家就这样被虐杀了。

令人悲愤的是：当他们被捕的消息传来，王明却说这是“咎由自取”，而拒绝对他们进行营救。而当这24人被

国民党杀害后，王明则指示说，人虽然死了，但还要对他们的问题继续追究。

这 24 人是被叛徒出卖的。而与李立三一起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的罗章龙坚持认为，这是米夫、王明等借刀杀人，向国民党特务机关走漏了开会的地点的缘故，而这完全是贩卖行为，于是，罗章龙宣布退出共产党，另立组织。

拒绝营救，并在党的伤口上撒盐的是王明，拍案而起的却是党外人士鲁迅。

在巨大的愤怒中，鲁迅冒着杀头的危险，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与先驱者的血》、《为了忘却的纪念》，并着手搜集柔石和殷夫的遗稿，亲自编订，并作序出版：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

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但末二句，后来不确了，我终于将这写给了一个日本的歌人。

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的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KaHthe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纪念。

同时被难的四个青年文学家之中，李伟森我没有会见过，胡也频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

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

“生命诚宝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又在第二叶上，写着“徐培根”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纪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

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这是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的最后一部分。

鲁迅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33年4月1日的《现代》杂志，而那个时候的毛泽东，也正在江西苏区遭受王明路线的打击和整肃。

正如鲁迅所说的，“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

而随着“肃反校长”米夫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则失掉了很好的干部。

中共公开承认这一点，则是14年之后的六届七中做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这样说：

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

勇敢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而这“永远的纪念”，比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整整迟到了14年。

实际上，毛泽东也是在延安才读到鲁迅的这篇文章的，难以想象毛泽东读到这篇文章时是怎样的心情。他只是这样说：我在陕北，晚上睡不着，我就读鲁迅的书。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他还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代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毛泽东不仅失掉了最好的朋友，而且也失去了亲爱的小弟弟毛泽覃。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讲话中，面对面地批判了王明，同时毛泽东则表扬了王稼祥：

王明对党内“左”、“中”、“右”一齐打，，打了“左”派（反立三路线）打“中”派（反周恩来、瞿秋白的“调和路线”），打了“中”派打“右”派，把老人打得差不多了。许多人讲篡党、篡军、篡政，是确有其事的，是从四中全会开始的，不是从五中全会开始的，一直到王明在共产国际，到他从苏联回国，到六中全会。六中

全会，一滴酒精使微生物缩小了。两个钦差大臣，一个是王明，1937年11月回来传达所谓“国际路线”；一个是王稼祥，1938年夏天回来也传达了国际路线，但他传达的和王明的“国际路线”不同。王稼祥带回来国际文件，成了一滴酒精，滴下去，微生物缩小了。

经五中全会一劫，中共元气大伤。原本就大权旁落的总书记向忠发，从此更加意志消沉、心灰意冷。

此时的中央做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决定：中央虽根据王明、博古的要求，坚决不同意毛泽东继续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但同时又决定，由毛泽东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

而这个决定，是由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做出的，本该担任这个职务的是向忠发，而向忠发推辞了，他提议由毛泽东担任苏维埃主席。

向忠发的考虑固然是：此时的毛泽东已经率领红军战胜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根据地，毛泽东的声望日隆，但更为重要的是，向忠发认为毛泽东像自己一样，是久经考验的中共老干部，何梦雄等人牺牲后，他再也不能听任王明放手打击中共的老干部了。

当时意志消沉的向忠发还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策：他反对把刚从苏联回国的张国焘派往江西苏区，向忠发认为，张国焘一向目中无人，何况张国焘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则只是个中央委员。把张国焘和毛泽东放在一起，不利于开展工作。于是，在向忠发的坚持下，张国焘被派往了鄂豫皖苏区，而周恩来则被派往江西苏区。

向忠发的决策是英明的，张国焘到达鄂豫皖苏区后，立即力行肃反，大开杀戒，如果当时被派往中央苏区的是张国焘而不是周恩来，那么，中央苏区的命运、毛泽东的命运，就将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1931年11月，毛泽东在瑞金当选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

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周恩来就是这样与毛泽东走到了一起，当时，他是毛泽东的上级。

周恩来是肩负重要使命到达苏区的，而这就是纠正毛泽东“消极怠工”、独断专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立即执行中央攻打大城市的指示。

中央指示攻打的那个大城市是赣州。

赣州位于湘鄂赣三省之间，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自古易守难攻，于是，到达苏区后，周恩来命令红军立即落实中央打赣州的指示。而此时，毛泽东的红军总政委职务已被周恩来代替，他留在了后方，没有随军行动。

进攻赣州20天之后，红军未能取得胜利，却陷入了援敌的包围之中，情况危急。项英冒雨来到瑞金毛泽东的住处，连夜传达苏区中央局决定：毛泽东紧急由后方瑞金赶赴前线，指挥红军继续攻打赣州。

但是，在紧急赶到林彪和聂荣臻的红一军团后，毛泽东却劝说林彪放弃打赣州，而回师闽西，打回红军的老家去。

就这样，红一军团就又跟着刚刚被撤职的“老政委”走了，红军从赣州敌人的包围中悄然撤退，再次由赣入闽，红旗又一次越过了汀江。

中央局接到一军团放弃攻打赣州的电报时，毛泽东已经率领红一军团兵临龙岩城下了。

而周恩来得知毛泽东和红一军团自行改变了作战计划后，非但没有反对和制止，反而立即亲自赶往汀州，与毛泽东汇合，并且留驻在那里，负责筹备给养。

周恩来这个中央局书记，就这样心甘情愿地当了毛泽东的“后勤部长”。

像王稼祥一样，周恩来一到苏区，就又被毛泽东带跑了。

而这一次，毛泽东准备攻打大城市。他要还临时中央以颜色，同时也给刚上任的周恩来一个交待。

而毛泽东选择的这个大城市，就是漳州。

漳州极为富庶，漳州工商业发达，更是南中国重要的贸易交通枢纽，一旦占领漳州，便等于遏制了海路，红军不但跳出了蒋介石的围剿，而且还遏制了南中国联系世界的出海口——泉州与厦门。

毛泽东的这一选择，极具战略视野。

“谋事在毛，成事在周”。漳州战役，是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和朱德首次一起指挥作战，后来在遵义会议后形成的负责军事工作的“新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首次聚首，其实就是在漳州城下。

而后来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那个黄金组合——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组合，也就是在指挥漳州战役时首次形成的。

1932年4月20日，红军攻克闽南重镇漳州，无论是瑞金还是后来的延安，与漳州相比，还都不能称为是城市。

实际上，15年之后的1947年11月，晋察冀解放军才攻克了石家庄，而历史上，一般把石家庄看作中共占领的

第一个工商业城市和交通枢纽，但漳州的现代化程度，并不比石家庄更低，更是当时的赣州所不能比拟的。

一举占领漳州，是红军斗争史上一次巨大的胜利。

红军上下扬眉吐气，欢声雷动，而兴高采烈的毛泽东，则头戴凉盔帽，骑着一匹白马，大摇大摆地进入了漳州城。

漳州战役的一大成果，是缴获了两架飞机，年青气盛的林彪虽然不会开飞机，却一定坚持要开开试试，经众人苦劝，方才罢休。

林彪一生周密谨慎，但对飞机可能失事这件事，竟毫无戒备。

漳州战役的又一成果是缴获了大量物资和银元，这些物资和银元，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央苏区的财政困境。

一批机器被拆卸下来运到苏区，这使得苏区有了自己的工业基础。

而毛泽东个人在漳州战役中的最大收获，则是看到了久违的全国的报纸，获得了大量的图书。志回忆说：一打下漳州，毛泽东就让她帮着去漳州龙溪中学图书馆找书，最后，这些书装满了一卡车，运回了中央苏区。

当红军撤出漳州时，嗜书如命的毛泽东的马上驮满了书，而他自己则兴高采烈地跟在马后，随军步行。

但是，用兵如神的毛泽东也许并没有想到，在中央眼里，“漳州大捷”并不是一场巨大胜利，而是违抗中央命令的渎职行为，毛泽东违反了党纪和军纪。他不仅是犯了严重错误，而简直是犯了罪。

1932年10月，根据中央指示，在江西宁都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后方的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和从前方回来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

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批判毛泽东。

当时顾作霖只有24岁，他先后担任过共青团中央书记，与曾经担任少共中央书记的博古一样，属于党内的“儿童团”。而这两个初生牛犊加一个曾经领导“二七罢工”的项英，以为自己真理在握，以为越左越革命。

会议认为，毛泽东一贯不执行攻打大城市的中央指示，犯了“消极怠工”的错误，放弃攻打赣州，更发展到擅自更改红军的作战计划的境地。毛泽东错误的根源在于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只要毛泽东还在指挥红军，那么，大城市就打不下来，革命就不能胜利。

会议决定，必须开展“前所未有的反毛泽东倾向的斗争”。

会议提出，毛泽东必须完全离开红军，回到后方去做政府的工作，由周恩来负责领导红军作战。

周恩来在会议上替毛泽东百般辩解，他提出了两个折衷的方案：“一种是由我负责，泽东助理，一种是泽东负责，我来监督”，而朱德和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完全离开红军。

但来自的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则认为，毛泽东认错态度不好，因此，周恩来提出的这两个方案都不能接受。

最终毛泽东自己表态说，既然你们不信任我，我也不能负责，那我就到后方去好了。

到此，毛泽东的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委、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都被陆续撤销了，他只剩下来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这两个名誉职务——而在当时的党中央看来，那不过是十足的“虚职”。

就这样，毛泽东第二次被从红军的领导岗位上赶下来。这一次，他是在打了大胜仗之后，反而遭到了撤职处分。毛泽东再次病倒了。

他又发了疟疾。

宁都会议结束后，1932年10月，毛泽东到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并探望在此住院分娩的贺子珍，在这里，毛泽东

再次见到了福建省委书记罗明。与罗明在一起，毛泽东才开始倾诉他心中的郁闷和委屈，他们在一起畅谈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毛泽东告诉罗明说，现在闽西的工作，比任何时期都重要，只要闽西红旗不倒，还能够坚持正确的路线，党和红军就有希望，江西苏区即使保不住了，闽西能保得住，天就塌不下来。

事实证明：毛泽东预见到了红军和苏区的命运。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正是因为有闽西红军顽强地坚守住了苏区的南大门，红军才得以顺利撤离苏区，开始长征。

在那次住院期间，毛泽东还动员傅连 跟红军走，正是毛泽东把傅医生由基督徒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而长汀福音医院，则成为了红军的第一所医院。

胜利来之不易，但一旦路线错误，失败就将是非常迅速的。

正如毛泽东在大革命时代所说的那样，“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毛泽东就是这样无奈地离开了他亲手创立的红军。毛泽东也就是这样被解除了武装，好在，当时的他，还可以读书、写书，以书为伴。

1933年5月，被剥夺了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在狂风

暴雨中途经瑞金城外的大柏地，雨过天晴后，他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提枪参战，在此地率领红军殊死战斗的情景，吟成了《菩萨蛮·大柏地》：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当时，在博古等人的指挥下，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已经陷入了全面的军事失利，而这首词，表达了毛泽东对于红军的深刻眷恋，更表达了他对于战况的焦虑和急于上阵杀敌的迫切心情。

207

第十章

毛主席与“毛派”

被从红军的领导岗位上赶下来之后，毛泽东开始专心致志地当起了“毛主席”，即苏区临时政府的主席。

1932年底，毛泽东把自己的工作重心，由军事转向了经济与社会，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

一种流俗的成见以为：毛泽东擅长政治，尤其是军事，而于经济工作则不在行，其证据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在毛泽东领导下，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得不够快、不够好。

但是，这恰恰是一种从根本完全不懂经济的俗见。因为那些经济学的“外行”们不懂得：世界经济发展是有周期的，这就是所谓“景气周期”。

上世纪20年代，经济学家康德拉耶夫提出，现代经济运行中存在着波动，这种波动以45-60年为周期，这就是所谓的“康德拉耶夫波动”。面对世界经济波动的周期性，任何经济理论、一国之经济政策的作用都是第二位的。

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也必须放到世界经济

景气的周期中去看，这特别是指1970年代初开始的美元的国际化 and 世界贸易的全球化进程，而这乃是造成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的条件，这是我们得以迅速发展经济的外部环境。

邓小平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高屋建瓴，正确地分析、把握了世界大势，不失时机地为中国的发展抓住了国际机遇。

经济学的外行们似乎不知道：按照康德拉耶夫波动的描述，1920-1970年之间，整个世界经济都处于下行的周期，而且，中国处在被孤立和封锁的条件下，在这样的周期里，毛泽东能够成功地建立起中国的国民经济框架，为中国成功赶上世界经济景气的周期奠定基础，这已经是人间奇迹了。

正是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大环境不好，整个经济处于下行期的前提下，如何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这才是衡量一种经济理论、经济政策成败的关键。

而从这个角度上说，毛泽东恰恰极为懂经济，他在江西苏区开创的经济理论与实践，奠定了一种崭新的经济学，而毛泽东的经济学与他的战争理论相比，毫不逊色。

毛泽东的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最大创造性就在于：他融合了中国传统的治理经验和现代金融理论，用于推动苏区的生产与贸易的发展。

毛泽东这位“主席”上任伊始，苏区所面临的经济状况是怎样的呢？

1933年，毛泽东在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一部分，题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其中这样说到：

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同志们，这些意见是不对的。抱着这些意见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你们看，敌人在进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我们如果不把这些困难克服，革命战争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吗？盐很贵，有时买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厉害。这些情形，立即影响到工农的生活，使工农生活不能改良。这不是要影响到工农联盟这一个基本路线吗？工农群众如果对于他们的生活发生不满意，这不是要影响到我们的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工

作吗？所以，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

苏区所面临的头等问题，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盐很贵，而有时还买不到，而同时谷价的波动则十分剧烈。

于是，毛泽东认为，苏区面临的最根本的经济工作，就是发展金融与商业。

苏区为什么必须发展商业呢？这就是因为苏区被敌人所封锁，而最根本的两项生活资料、或者两大商品——粮食和食盐都垄断在奸商的手里，奸商和敌人利用了这种封锁，而从经济上剥削我们。

毛泽东这样分析说：

从进出口贸易的数量来看，我们第一个大宗出口是粮食。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三百万群众中每人平均输出一担谷交换必需品进来，不会是更少的吧。这笔生意是什么人做的？全是商人在做，商人在这中间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去年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五角钱一担谷卖给商人，而商人运到赣州卖四块钱一担，赚去了七倍。又看三百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万块钱的盐，要穿差不多六百万块钱的布。这一千五百万盐、布的进口，过去不消说都是商人在那里做的，我们没有去管过。商人在这中间的剥

削真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县买盐，一块钱七斤，运到我区，一块钱卖十二两。这不是吓死人的剥削吗？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再不能不管了，以后是一定要管起来。我们的对外贸易局在这方面要尽很大的努力。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毛泽东擅长算账，他是个好的当家人。

食盐与粮食的问题，究竟该如何管呢？毛泽东认为，苏区政府必须参与到粮食和食盐的经营中去，以打破私商的垄断。

正是在毛泽东的倡议下，苏区成立了粮食调剂局和对外贸易局这两个重要机构，同时，毛泽东主张发展合作社，普遍建立谷仓和备荒仓。而毛泽东上述的经济建设方略，均来自中国历史上的均输法、市易法和社仓法，这些经济改革与建设的方略，其实是桑弘羊、王安石、王阳明都曾采用过的。

而“毛泽东经济学”的创新之处在于，他采用了现代金融的手段推动这些经济建设的方略。

早在安源罢工期间，毛泽东就在易礼容的协助下，发行了中国第一张由工人持股的“红色股票”，而在苏区，毛泽东则发行了300万元的经济建设公债。

关于公债的用途，毛泽东对于公债的发行，做了这样的说明：

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怎样使用呢？我们打算这样使用：一百万供给红军作战费，两百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做本钱。其中又以小部分用去发展生产，大部分用去发展进出口贸易。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总起来说，苏区的经济工作，应该如何布局呢？毛泽东这位政府的“当家人”这样说：

要大家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每个县要设立一个粮食调剂分局，重要的区，重要的圩场，要设粮食调剂支局。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粮食，在红色区域内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买不到，有的地方价格过低，有的地方价格又过高；一方面要把我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地

（不是无限制地）运输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购买必需品进来。大家要努力去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多造农具，多产石灰，使明年的收获增多，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

苏区“毛主席”的“政府工作报告”非常简短，但却言简意赅地说到了振兴苏区经济的要害，他当年的报告，对我们今天的经济工作，依旧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

而这充分表明：在中国和当时的苏区那样落后的条件下，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却是极为超前的，特别是，毛泽东比我们更早地认识到，现代经济不是简单的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而是信用经济，商品经济与货币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因此，发行公债，掌握资本，这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前提。

这也表明，毛泽东比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更为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所反对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资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使资本为人民服务、为劳动服务，是摆脱少数人垄断资本那样一种情况。

资本是信用，信用的基础是人民的信任，人民的信任，是战胜敌人的铜墙铁壁，也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基础。

因此，除了经济工作、特别是金融与商业工作之外，毛泽东在苏区极其重视的，便是社会工作。

什么是社会工作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民生”的工作，而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指社会再生产领域里的工作，用毛泽东的话，则是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

马克思认为，人民的衣食住行构成了社会再生产领域，这是物质生产健康发展的条件。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深刻弊端，就是把涉及老百姓基本生存的社会再生产领域作为了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从而瓦解了物质生产发展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认为：苏区制度的优越性，就表现在它把满足普通劳动者的基本需求放在第一位，这就是他所谓：“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而这就是民生与社会工作的重要意义所在。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之结论部分，题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其中这样说：

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

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不是实实在在地被我们粉碎了吗？

而毛泽东的这些话，自然是有感而发的，因为当时红军正在博古和李德的指挥下，以错误的“堡垒战”，对抗蒋介石在五次围剿中采用的“堡垒战”，而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军事上十足的愚蠢，正是由博古等人政治上的错误决定的。博古等人，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的堡垒和铜墙铁壁是

什么。

也正是在这里，毛泽东说了如下的名言：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

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在苏区“毛主席”看来，那些善于抓经济工作的干部，那些善于做群众工作、关心民生的干部，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于是，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毛泽东特别表扬了闽西的才溪乡和江西的兴国县，称他们是抓经济的典型、改善民生的典型和社会工作的典范。

一大批好干部正是这样团结在了毛泽东的周围，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工作，苏区的经济迅速发展，老百姓的

民生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些好干部包括：福建省委书记罗明，闽西苏维埃的财政部长傅柏翠，当然，也包括当时还十分年青的瑞金书记邓小平等。

但也就是这些人，随后却作为“毛派”，成为了王明、博古打击整肃的对象。

1931年9月，由于王明要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周恩来将赴苏区，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任命，由秦邦宪（博古）担任中国临时中央的总负责。

1933年3月，博古率中共临时中央到达闽西龙岩。

随着博古的到来，毛泽东、红军和苏区干部的厄运，方才真正降临了。

当见到赶来迎接他的福建省委书记罗明时，博古劈头盖脸地质问说：你是省委书记，不在省委机关上班，跑到龙岩来干什么？

罗明回答：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省委必须经常下基层，最好是住在基层。

博古闻之大怒：原来如此！怪不得中央的路线总是推行不下去呢。

博古虽然年青，但却是在斯大林发起的肃反运动中锻炼出来的，他不懂军事，不懂中国，但却很懂肃反。

除攻打大城市之外，六届四中全会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决策是：在根据地大兴肃反。

肃反，才是博古从莫斯科取来的“真经”。

博古热衷于在苏区肃反，是因为当时只有26岁的博古认为，只有通过肃反，才能够迅速提高自己在党和红军中的威望。

肃反依据的是极其荒谬的逻辑——谁反对领导，谁就是反党，谁就是反革命。而被毛泽东称为“闽西傅先生”的傅柏翠，就是因为脑袋上长着反骨，“一贯犯上”和不尊重、看不起“领导”，而被搞掉了。

古田会议意外落选后，傅柏翠离开红军，到地方工作，但是，他与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意见分歧，傅柏翠反对当时中央的土地分配政策，而主张把分配给个人的土地集中起来，搞农业合作社——即他所谓的“共家团”。

毛泽东也支持发展农村合作社，在苏区，他认为只有发展农民合作社，才有利于发行和推销公债，才有利于扩大手工业产品的出口，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说：

第一，从组织上动员群众。首先是各级政府的主席团、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的同志，要把发行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发展生产，发展贸易这些工作，经常地放

在议事日程上面去讨论，去督促，去检查。其次，要推动群众团体，主要的是工会和贫农团。要使工会动员它的会员群众都加入经济战线上来。贫农团是动员群众发展合作社、购买公债的一个有力的基础，区政府和乡政府要用大力去领导它。其次，要经过以村子、屋子为单位的群众大会去做经济建设的宣传，在宣传中要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讲得十分明白，要把改良群众的生活，增加斗争的力量，讲得十分实际。号召群众购买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巩固金融，发展贸易，号召他们为着这些口号而斗争，把群众的热情提高起来。假如不这样地从组织上去动员群众和宣传群众，即是说，各级政府的主席团、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不着力抓着经济建设的工作去讨论、检查，不注意推动群众团体，不注意开群众大会做宣传，那末，要达到目的是不可能的。

第二，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

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命令主义地推销公债，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买不买得这样多，只是蛮横地要照自己的数目字去派，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公债不能好好地推销。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债，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

傅柏翠主张发展“共家团”即合作社，正是为了发行公债，广建粮仓这些“非常具体”的工作，同时，他对于当时闽西特委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作风感到不满。

据说，毛泽东所说的“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这句话，本来就是傅柏翠的发明。

实际上，20多年后，毛泽东批评邓子恢的“包产到户”时，他的立场与当年的傅柏翠是一致的。如果说有区别，那么区别只在于，在20多年前的苏区，因为主张“农村集体化”被批判的人是傅柏翠，而20多年后，因为反对集体化被批判的人，则变成了邓子恢。

书生习气不改，由于对命令主义极端不满，傅柏翠逐渐对党的工作不再积极了。

而1931年初红十二军召开的一次大会，则荒唐地改变了傅柏翠的命运。

那次会议的主题是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对当时的红军战士来说，这两个德国人实在是太陌生了，当时的红军战士已经习惯了喊“打倒资本家，吃南瓜”这样的口号，以至于当会议主持人介绍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曾经是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时，有几个战士突然振臂高呼“社会民主党万岁”。

那时苏区正按照中央的要求，跟着苏联搞肃反、大抓“社会民主党”分子，闽西“肃反委员会”立即将几个喊口号的战士逮捕，大搞“逼供信”，几个战士被诱逼，竟然“供认”傅柏翠是“闽西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

于是，闽西“肃反委员会”立即把傅柏翠领导的古蛟地区视为“社会民主党巢穴”，不承认那里是苏维埃根据地的组成部分，且命令红军部队捉拿傅柏翠。1931年3月，闽西苏维埃政府调集红军和赤卫队开始向古蛟地区挺进。傅柏翠逃避不及，蛟洋的农民自卫军与苏维埃政府的军队发生冲突，傅柏翠率领自卫军躲进了山里，从此，他在上

杭拥兵自治，脱离了党和红军。

“雪里行军无柏翠”。毛泽东一语成谶，而红军队里从此“无柏翠”。

第一个被当作“社会民主党”错误整肃的“毛派分子”是傅柏翠，而第二个被整肃的“毛派分子”，则是罗明。

博古率临时中央到达苏区后，立即展开了反对“罗明路线”的运动。

罗明是广东大浦人，闽西根据地形成后，罗明长期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他是彼时最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建立红色的根据地路线的党内高级干部。

整罗明，实际上就是整毛泽东，因为所谓“罗明路线”原本子虚乌有，“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毛泽东路线。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当时谁重视和注意经济工作，谁就会被说成是是右倾，甚至是“社会民主党”。

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罗明路线”正式平反。

在随后不久举行的中共七大上，博古终于这样总结说：“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

苏区。更沉痛的是由于‘左’倾错误、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

1933年，作为“罗明路线”的头子，罗明被从省委书记的岗位拿下，调任苏区党校的教员。而他只是被整肃的“许多同志”中的一个。

与罗明一起遭受处理的党和红军骨干，还有毛泽覃、邓小平、谢唯俊和古柏。

谢唯俊是毛泽东井冈山时代的旧部，在苏区，他也是重视经济工作和民生工作的典型。1933年，他被从中共吉安县委书记任上撤职，遭受审查和关押。1934年，谢唯俊参加了长征，在红军即将到达延安时，谢唯俊在三边地区中土匪埋伏牺牲，当时他只有27岁。

古柏是江西寻乌人，正是在古柏的陪伴下，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寻乌调查”，正是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提出了要重视民生工作，重视社会调查。由于受毛泽东的牵连，古柏被从红一军团前委秘书长任上撤职，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古柏被留在了当地，1935年3月6日，古柏率领的游击队在广东龙川上坪鸳鸯坑被国民党军包围，他牺牲时

年仅29岁。

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是接应朱德、陈毅等南昌起义部队井冈山的人，他被从中央秘书长任上撤职，红军长征后也被留在了江西苏区。1935年4月26日，毛泽覃在瑞金红林山区被国民党军包围，牺牲时也只有29岁。

博古到达苏区一年之后，除了负责苏区银行工作的毛泽民之外，毛泽东身边的人几乎都被撤职查办，毛泽东成了不折不扣的“光杆主席”。

今天看来，罗明和傅柏翠比谢唯俊、古柏、毛泽覃还是幸运一些，因为他们俩毕竟都活了下来，只是命运坎坷而已。

罗明直到遵义会议后方才被毛泽东重新启用，但随即在红军娄山关战役中身负重伤，不能继续行军，不得不留在了当地。随后，罗明被国民党抓获，并立即被指认出这就是“罗明路线”的总头子罗明。在被关押了五年之后，罗明获释，他辗转新加坡回到了故乡广东，从此与党脱离了联系。

全国解放后，罗明夫妇一直在广东工作，默默无闻，鲜为人知。直到1950年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杨尚昆遇见了罗明，觉得这位高个子的中年人很面熟，但却一时想不

起他是谁，罗明见状上前与杨尚昆握手说：“我就是‘罗明路线’中的罗明啊！”

杨尚昆听了，感慨万千道：“哎呀，罗明同志，我记起了，那时，你头上戴着顶大帽子，谁也不敢和你的名字连在一起呀。”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一直惦记着傅柏翠，他问福建省委书记张鼎丞：“闽西傅先生在哪里，如果身体还好，叫他出来工作嘛。”

傅柏翠遂被任命为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长和省政府委员。

1983年，古稀之年的傅柏翠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又一次递交入党申请书。

1985年5月，中共福建省委为傅柏翠的“社会民主党”问题彻底平反。1986年1月，中共福建省委批准傅柏翠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一年，傅柏翠90岁。他终于再次回到了“红军队里”。

1993年1月30日，傅柏翠在福州逝世，享年98岁。

历史证明，“听毛主席的话”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那些跟随毛泽东的人，似乎注定了他们坎坷和牺牲的命运，在江西的“毛派分子”中，建国后“三起三落”的邓小平

算是最幸运的了，他最终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

而直到晚年，邓小平还是语重心长地警告说：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啊！一个好好的一个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

六届四中全会形成的中共领导层，致力于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改造中国共产党，它不仅导致了中共白区组织的瓦解，也导致了苏区的丧失。

在1931年中共四中上形成的王明路线，是中国革命危害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路线。

这种错误路线在组织上的根源，是斯大林为了确立自己的个人权威而进行的“肃反”。而斯大林肃反扩大化造成的后果，在几年后的卫国战争中暴露无遗，希特勒之所以能够势如破竹攻入苏联境内，一个原因就是大批的红军优秀将领在肃反中被杀害了。

布哈林屈死时说过这样的话：同志们，请记住，在你们举着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血。

而王明、博古和张国焘的肃反，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仅在张国焘主持的鄂豫皖苏区，就有十分之六以上的红军团以上干部，被当作反革命而杀掉。

所谓“影响深远”，从如下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到。

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后，赶来向毛泽东汇报的红25军军长徐海东请示说：部队里还有300个AB团嫌疑分子，是在鄂豫皖苏区出发前划的，这些人究竟该如何处置。

毛泽东愤怒地回答说：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下来了，还怀疑人家是反革命？统统改正！立即改正！赔礼道歉！全都搞错了！

当徐海东向那300名干部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时，300人一起抱头痛哭，而徐海东也不禁留下了热泪。

实际上，在当时苏区所有的“毛派分子”中，毛泽东本人的处境还算是最好的，他虽然已经彻底“赋闲”，但毕竟没有被完全打倒，他还是苏维埃临时政府的主席，还是中革军委的委员——虽然那时军委开会，已经基本上不再通知他了。

正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好干部忍辱负重的工作，苏区的经济和民生才得到了发展，老百姓才发自肺腑地拥护共产党，并把自己的子弟送到了红军的队伍里。

在普通老百姓眼里，毛主席就代表着共产党，就代表着那个“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

众的一切问题”的共产党的形象。

老百姓是很务实的，老百姓又是很无私的。

1952年，中央慰问团代表毛主席重回江西看望苏区人民，一位86岁的老汉，步行80里山路赶来，非要见见慰问团团长。得知老人的两个儿子都在红军队里牺牲了，团长便问老人说：老人家，您需要我们帮助些什么？老人说：不需要帮助，我就是想要一张毛主席像。

这位瘦骨嶙峋的老人，临走前留下一句话说：替我捎信给毛主席，多多保重，毛主席一走，我们穷人就没指望了。

以心换心，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铜墙铁壁，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共产党人的活菩萨。

多年之后，毛泽东在延安又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共产党人，要像念佛一样，时时刻刻地念着我们的人民群众啊！

如果说有“毛派”，那么，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便是毛派。

“毛派”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毛派是为人民服务派，是实事求是派。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这样总结说：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

邓小平的心，与毛泽东是想通的。

而邓小平本人，就是苏区时代最大的“毛派分子”之一。

第十一章

长征：意志的赞歌

231

1934年1月15-18日，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博古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可见，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已经十分边缘。

十天后，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全面失败，共产党随之丧失了最大的红色根据地——中央苏区。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

最早从中央苏区突围的部队，是寻淮洲率领的红七军团的6千余人。1937年7月7日，这支部队在闽西连城突破了敌人的重围，但此番突围的目的却并不是长征和转移，而是调虎离山，转移蒋介石的视线。

由于兵力过于单薄，他们的行动并没有达到调动敌人部分主力离开苏区的目的。

正像1927年春，在大革命高潮时预见到大革命

一样，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中央苏区丧失在即，中国革命再次遇到了像大革命失败那样的重大挫折。

1934年7月23日，在通宵开会后，毛泽东于黎明时分登上了会昌城外的岚山岭，写下了《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诗人后来自注云：“踏遍青山人未老：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郁的。这首清平乐，如前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同一心情。”

一个多月后，心情焦虑的毛泽东发了疟疾，一度病势危重，连续几日不省人事。

毛泽东差一点病死，但他却又一次奇迹般地复活了。

在长征开始前，由于离开了军队，毛泽东做的与军事有关的工作，就是在群众基础最好的闽西地方“扩红”，在苏维埃临时政府毛主席的动员下，有4万闽西子弟在长征开始前参加了红军。但他们却并没有全部参加长征。

有两万人留了下来，当红军撤离苏区时，他们负责了阻击敌人的任务，最残酷的阻击战就发生在龙岩地区的连城，

这就是著名的“松毛岭战役”。在这里，两万红军固守了整整十天十夜，牢牢地守卫着苏区的南大门。今天，松毛岭上，当年鏖战的工事犹在，山中掩埋了无数红军的白骨。

1934年12月，一支两千人的闽西游击队在武平大山中被敌人包围，激战两日之后，游击队全军覆没。

80年后的2014年，福建省武平县大余乡一位农民，用进城打工的钱翻造了新屋，但是，自从他搬进两层楼的新居之后，就一天也没有睡过好觉。

因为每到夜里，他都会梦见一队队的红军，在屋前列队，向遥远的地方敬礼。

当地政府得知了消息，在屋后开掘，掘出了白骨累累。

这位农民，把他的新屋造在了红军游击队最后战斗的战场上。

据说当天大雨倾盆，发掘烈士遗骨的工作，不得不停了下来。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这是当年留守苏区的陈毅写下的诗。

经过了难以想象的苦斗，幸存的红军游击队在抗日战争期间改编为新四军，而在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则壮大

为华东野战军，即著名的陈毅、粟裕大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的主力就是这样离开了苏区，当时的情景，据说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千军万马江边站，十万百姓泪汪汪”。

歌词中更为悲凉、也更为令人肝肠寸断的是它开头：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上野鹿声声哀号，树树梧桐叶落完……

30年后的1964年，当有人提议把这首《十送红军》编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周恩来却伤心地说：不好吧，当年红军离开苏区，哪有这么有秩序的送行啊，那是撤退和突围啊！

实际上，长征是在秘密和极端仓促的情况下进行的，事先没有进行政治动员，别说苏区百姓，就是广大官兵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在最后一刻，博古还在等待苏联寄来苏区转移的经费，依然对红军撤离苏区的突围地点犹豫不决。是刚刚从疟疾中恢复过来的毛泽东在紧急时刻献出了打漳州时获得的银元，从而解决了转移的经费问题。同时，毛泽东还协助当时的军事三人团（博古、李德和周恩来）做出了红军主力从于都河撤退的决定，而博古只是在最后一刻才勉强同意

毛泽东跟随红军长征——事实证明，这是他所做的所有错误决定中，唯一正确的一个。

大病初愈的毛泽东，就是这样拖着虚弱的身子踏上了长征路。而当毛泽东赶去通知贺子珍也被批准随中央纵队行动时，长征的队伍已经出发了。

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长征被描述为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但实际上，长征是在根据地和红军斗争严重失败的情况下被迫举行的，而由于当时的中央做出决定时的仓促和草率，使长征一开始便导致了更大的失败。

长征的目的是不明确的，目的地的选择甚至是错误的。在当时的军事“三人团”看来，红军的目的地可能有两个，一个是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做一次大的战略迂回，最终再回到江西根据地。而另一个则是到湘鄂西去，与红二、六军团汇合。

实际上，再回到中央苏区是不可能的，而去湘鄂西，则与蒋介石对红军动向的判断完全一致，于是，蒋介石在沿途精心布防，为红军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而在毛泽东看来，走那条路，等于跳蒋介石挖好的陷阱，这无疑就是让红军去送死，这是葬送革命。

博古把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苏区的丧失，归于敌

人的强大和蒋介石所采取的层层推进的堡垒战术。

而在广昌保卫战开始之前，林彪就曾上书批评博古错误的军事路线，林彪指出：敌人的堡垒之间有巨大的空隙，红军完全可以利用这些空隙跳到敌人背后的外线去作战，只要运用毛泽东的运动战战略，五次围剿完全是可以被打破的。

林彪认为：敌人的强大和蒋介石的堡垒战术，根本不是反围剿失败的原因。

而毛泽东则进一步认为，战术上的错误，是基于战略上的盲目，而战略的失误，则是由于博古对政治局势的判断是错误的。

在反五次围剿期间，发生了驻守在福建的蔡廷锴部19路军的抗日反蒋事件。毛泽东认为，在日本大举侵华的条件下，无论国内还是国际的政治形势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个时候，红军完全可以联合抗日反蒋的力量，与蔡廷锴建立统一战线，从而保证苏区的南大门无虞，并借机使根据地向着浙江方向发展。如果采用这种正确的战略，五次围剿不仅可以被打破，而且，根据地还会进一步扩大。

而战术方面的错误，则更直接地导致了五次反围剿的失利。

毛泽东认为，任何战役，首战是关键，首战决定全局，首战必须是有把握之战，选择首战，必须完全主动，而不能被敌人牵着鼻子走。

但是，五次反围剿之首战，却是被动地选择了最强大的敌人，从而使得首战成为在各种因素皆不利于我的情形下之浪战，终于铸成了大错。

毛泽东指出：

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却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

上述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我军作战的经验，证明处在防御地位的红军，欲打破强大的“进剿”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

只有第五次反“围剿”时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从挽救的企图出发，北上就敌，于洵口

不预期遭遇战胜利（消灭敌一个师）之后，却不把此战看作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而贸然进攻不可必胜的硝石。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做法。

但是，当时的毛泽东连政治局常委都不是，军事指挥权完全操在“三人团”的手里，毛泽东的意见不可能被采纳，红军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

由于王稼祥在反四次围剿时被敌机丢下的炸弹炸断了肠子，26岁的顾作霖接替了王稼祥的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五次反围剿中指挥作战的，其实是博古、李德和顾作霖，而周恩来主要是分管后勤保障。

1934年4月10日，广昌战役爆发，顾作霖与博古一起亲临前线指挥，在战局最危急的时候，顾作霖突然口吐鲜血，倒在了地上。激战了18天之后，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守。又10天后，顾作霖因抢救无效牺牲。

在红军长征前，顾作霖被仓促地掩埋在苏区的土地上，而他的坟墓至今也没有找到。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一贯主张不能与强敌打阵地战，而一旦遭遇阵地战，则必须速战速决，绝不能拖延。但是，广昌保卫战却违背了这一宗旨，它是一场久拖不决

的阵地战，顾作霖的牺牲是英勇的、壮烈的，但事实证明，打仗不能仅凭一腔热血，如果是那样，付出的代价也只能是热血。

年青的总书记博古上任伊始，便跃跃欲试地要打一场大仗、硬仗，打一场正规战，以此显示自己的领导魄力和指挥能力，而其结果却是葬送了中央苏区。

而当时的毛泽东没有权力，他不是政治局常委，不能参加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只是中革军委委员，但是，当时的军委只是一个形式，军事领导权操在“三人团”手里。于是，毛泽东只能眼睁睁看着红军走向绝境。

广昌会战失利，苏区北大门洞开，红军只能选择长征。

而长征一开始，红军所陷入的，正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天上敌机轰炸，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下，但又不知向何处去的最不利的局面。在突破了三道封锁线之后，红军终于倒在了第四道封锁线上——这便是湘江战役。

当时指挥红军的李德，即奥托·布劳恩，是一个在巴伐利亚领导城市暴动的德国人，他后来在《中国纪事》中这样回忆说：当红军刚刚到达广西北部的全州，准备从这里渡过湘江时，通过情报得知，蒋介石的三个师也刚刚到

达这里，准备堵截红军。于是，李德决定，红军应该放弃立即渡江，而从全州南部绕过去，然后再渡过湘江。

在独自观察了全州的地形之后，毛泽东强烈反对李德的建议，他主张趁敌人兵力不足，立足未稳，拿下全州，立即在此渡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毛泽东的主张被“三人团”拒绝之后，毛泽东抱着一线希望，他要求中革军委集体投票表决红军这次最关键的行动。

然而，李德回忆说：

洛甫和王稼祥支持他（毛泽东）的意见，最后在军事委员会进行表决，表决结果票数相等。朱德、周恩来和博古同意我的意见，朱德作为会议主席，他的一票起了决定作用。

就这样，毛泽东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而犹豫不决、拖延时间，这对红军的命运是灭顶性的。正是因为红军部队绕道用了两天多的时间，战机完全丧失了，而等红军到达湘江边时，后面的追兵已经赶上，桂军则从侧翼向红军发起进攻，而对岸的湘军以密集的火力朝向红军，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的湘江，湘江变成了一条红河。

“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

湘江一战，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6千人，减员到了两

万余人。

闽西子弟兵在湘江战役中担任了打先锋的角色，两万将士大部牺牲。

在毛泽东的动员下，闽西有四万人参加了红军，他们在长征开始时负责断后，而在湘江战役中又充当了先锋，故牺牲极为惨烈。解放后授衔，闽西却只出了两位将军，而这两位将军终生没有回乡。他们说：所有的人都牺牲了，自己活着回去，无颜面见闽西父老。

湘江失利，红军和中国革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央红军的主力已经在湘江战役中被消灭得差不多了。

而这时，博古、李德提出的主张却是拉着这支疲惫不堪的破败队伍冲向湘西，继续跳蒋介石挖好的陷阱。

在《中国纪事》中，李德这样写道：当自己阐述这个主张的时候，毛泽东粗暴且怒不可遏地打断了他。毛泽东愤怒地而坚定地说，“从今天起，红军绝不能再跟你们走，红军必须跟我走！”

所谓跟毛泽东走，也就是向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冲去，而不是向北，向敌人强大的核心区去。

李德说，拍案而起的毛泽东震慑了大家，除了洛甫和

王稼祥之外，周恩来完全倒向了毛泽东一边，“本来连政治局常委也不是的毛泽东左右了政治局，他的意见就是这样被接受了”。

多年之后，李德还说：毛泽东把他的意见凌驾于党和红军之上，这是对党和红军的组织系统的公然破坏，是对共产国际的不敬。

李德忘记了，如果不是毛泽东拍案而起，把自己凌驾于党和共产国际之上，党和红军可能在那个时候就不存在了。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红军随后调头向西，进入了贵州，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自长征以来，红军第一次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迅速地占领了遵义城。

遵义是古代夜郎国的首都，唐代著名的诗人刘禹锡曾经被流放到这里，唐代的时候，遵义叫做朗州，取夜郎国旧都之意。

遵义是红军长征以来所占领的最大的一座城市。

对于属蛇的毛泽东来说，春节总是具有象征性的转折意义。

1928年春节前，他亲自持枪参战，在瑞金附近的大柏地击溃追敌，为井冈山下来的红军开辟了闽西红色根据地；1929年春节前，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古田会议，古田会议

决议形成了红军的建军思想；古田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系统地阐发了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理论。

1935年1月，又是春节期间，大难不死的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遵义——中国古代的夜郎国首都——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古田会议之后，这次会议做出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决议》。

这次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委托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

早在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周恩来就提议由毛泽东协助自己负责军事工作，但是，周恩来的建议被当时的苏区中央局否定了，从那时起，毛泽东被从红军中赶了出来。

而今3年过去了，周恩来当年的建议终于在遵义会议上被接受，毛泽东再次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上，而这期间用了漫长的3年。这期间付出的代价就是：红军丧失了90%，而苏区几乎丧失了百分之百。

遵义会议不是党的代表大会，也不是中央委员会会议，而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故在组织上变动不大，博古依然还是中央总负责，他和李德只是交出了军事指挥权，改由周恩来和朱德担任军事指挥，毛泽东

只有军事建议权。而遵义会议最为“破格”的地方，就是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从此，他就没有被从政治局常委中选出去。

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会议决定红军继续西行，伺机摆脱敌人，在四川北部渡过长江，以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但是，在巨大的失败面前，博古本人却难以承受精神和心理的压力了。2月5日，长征队伍到达川、滇、黔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村”，洛甫代替焦虑不安的博古，担任了中央总负责。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遵义会议结束后一个月，红军血战娄山关。就是在这次战役中，罗明身负重伤，这位毛泽东早期的挚友，从此脱离了党、红军和毛泽东。

而自井冈山时期便一直追随毛泽东的警卫班长胡昌宝，为了掩护毛泽东，牺牲在他的怀里，卫士的鲜血洒满了毛泽东的衣襟。

在呜咽如诉的号角声里，毛泽东昂然上马，率领红军继续奔向川滇交界波涛汹涌的金沙江。

在颠簸的马背上，长发飘飘毛泽东脱口吟出那首壮怀

激烈的词《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这首词，是中华诗词中的千古绝唱，是中国文学和诗歌的珍宝。

这首词，历经百年风雨沧桑，被证明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乃至中华民族命运的形象写照。

红军在五天之內连克桐梓、娄山关，于2月28日再占遵义，击溃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

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全面复出——担任前敌政委。

3月12日，三渡赤水河途中，中央政治局决定组成由

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三人指挥小组，从那时起，毛泽东终于能再次亲自指挥红军了。

随后的长征，方才由无目的的逃跑，变成了一部史诗，真正变成了一部传奇，而其中最具有传奇性的，便是强渡金沙江和夺取大渡河上的泸定桥。

金沙江位于川滇藏交界处，自古就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分界线。

而当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一路西行，接近人烟稀少的藏区时，部队中的动摇再次发生了，一部分红军将领认为，毛泽东将把红军带入绝境，他们再次提出要更换军事领导人。

当红军到达云南与四川交界的金沙江畔时，恐惧的声音占了主流，连洛甫也担忧地提出：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就是在这里被湘军消灭的，红军看起来正在步石达开的后尘，毛泽东不能再指挥下去了，洛甫甚至提出了以彭德怀、林彪和刘伯承代替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的领导。

事实证明，金沙江并没有那么令人恐惧，“金沙水拍云崖暖”，刘伯承只是换上了国民党高级军官的服装，乘红军所掌握的唯一一条小船渡过了金沙江，就从对岸的川军那里换来了几条大船，而红军没费一枪一弹，就安然渡过了金沙江。

“大渡桥横铁索寒”。红军的绝境虽然没有出现在金沙江，但却出现在了大渡河。

大渡河水深流急，当地一个著名的说法是：云南人希望把木材运到对岸的四川，但却由于水流和乱石的撞击，木材在江心变成了碎片。

无论是从云南入川，还是从四川入滇，大渡河都是古来的绝境，深入到了这样的绝境——红军能够置于死地而后生吗？

当红军赶到大渡河的时候，发现川军和滇军以密集的火力的封锁了河的东岸，而蒋介石的追兵离此则只有一夜的路程。红军有一条渡船，一天最多只能渡过一营兵力，而此时，蒋介石的飞机已经赶来轰炸渡口，这条唯一的小船也不起作用了。

大渡河成为了第二个湘江，这一次红军似乎是在劫难逃了。

毛泽东这位衣衫褴褛、长发飘飘的戎马书生此时说：就在离红军渡河处一百华里的地方，有一座铁索桥，叫做泸定桥，此桥是康熙时代所建，而很少题字的康熙，还特意为这座桥题了“泸定桥”三个字。

泸定桥横跨大渡河，是连接藏区和四川的要道。如果

红军能够夺取泸定桥，就会不费吹灰之力渡过大渡河。

当时，红军队伍中没有人知道有这样一座桥的存在，即使历史上有过这样一座桥，红军能否赶到那里，这更是一个问题，但是，当林彪的部队经过彻夜行军到达泸定桥畔时，他们惊喜地发现，不但这座铁索桥依然坚固地存在在那里，而且，桥上的木板也没有完全撤出。

随后赶来的刘伯承不禁感叹说：天不亡红军啊！

“大渡桥横铁索寒”。泸定桥挽救了红军，而在最后一刻，是毛泽东丰富的历史地理学识挽救了中国革命。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1970年12月，毛泽东与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谈话。

毛泽东问李德生说：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的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

《读史方輿纪要》，这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代最热爱的著作，罗章龙回忆说，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几乎把这本书翻烂了，在一师时代，毛泽东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滔滔不绝地与人讨论《读史方輿纪要》。

《读史方輿纪要·四川》一部中，详细地介绍了金沙江上铁桥的来历，指出：大渡河上的铁索桥，其实是清代在吐蕃“铁桥镇”的基础上修造的，并且还说：先有泸定桥，后有泸定县，泸定县在，铁索桥便在。

渡过大渡河之后，中央红军随即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岷山，于1935年5月，在四川懋攻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汇合。到此，红军终于真正冲出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到此，红军方才战胜了蒋介石的围剿。

但是，共产党和红军的劫难还并没有结束，因为他们随即就面临着与张国焘路线的斗争。

如果在中共历史上选一个最目无组织、目中无人的人，这个人毫无疑问就是张国焘。

张国焘，1897年出生，小毛泽东四岁，他的故乡萍乡，离毛泽东领导罢工的安源煤矿只有16公里。

张国焘是有骄傲的资本的。在中共党内，张国焘算是一个大知识分子，他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是五四北大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据说，五四游行那天，北大校长蔡元培出面劝阻说：现在政府已经对北大很不满，你们如果再上街，我这个校长就真的当不成了。由于蔡元培挡在门口，学生便一时不能集结。

此时张国焘站出来大喊一声：学生上街是学生自己的事，与校长有什么关系！于是，张国焘就将蔡元培架到了一边，北大学生蜂拥而出。

张国焘的目空一切是出了名的。他笑话一起领导学潮的北大国学门的邓中夏具有“秀才”和“牧师”两重风格，是徒作大言、一本正经的学究。而在湘鄂西苏区，邓中夏差一点在肃反中被杀掉。

张国焘是中共一大的代表，但是，在他眼里，其他代表却都是漫画性的。张国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惟妙惟肖地写道：王尽美长着一对蒲扇般的大耳朵，但却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董必武活像个老财东，陈谭秋总是一本正经，教师味十足，何叔衡则像个账房先生，“常常张开大嘴，说话表情都很吃力”，而毛泽东浑身充满了湖南的土气，好辩而言不及义。

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周佛海是日本留学生，总算是浑身洋气，而张国焘的一个小故事就把这个人彻底打倒了。张国焘说：一大期间，周佛海根本不是来开会的，而是带着一个叫杨淑慧的富家女私奔来上海，而一大结束之后，周佛海这个陈独秀委任的代理总书记，就被女方的父母打上了门。

总之，在张国焘的回忆录里，一大代表中，除了张国焘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外，其余的都是些滥竽充数的。

因此，每一任中共中央领导人都不在张国焘眼里。在中共三大上，张国焘因为反对自己的老师陈独秀，就嚷嚷着要退党，而在他眼里，中共五大的总书记瞿秋白，不但毫无能力，而且独断专横。至于六大的总书记向忠发，则是个没头脑的粗人，六大结束后，张国焘留在莫斯科作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不但与王明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打得天翻地覆，而且还认为另一位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是两面派。

张国焘在莫斯科期间，曾经遭受过米夫派的王明、博古的整肃，对此他记忆犹新、耿耿于怀。因此，1935年于懋攻汇合在一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两位是最为张国焘所蔑视的，那就是博古和洛甫，而当博古批评张国焘称朱德“玉阶兄”、毛泽东“润之兄”，而不是称他们“同志”时，张国焘不屑一顾地对博古说：年轻人，你懂什么？我们革命的时候，还没有你呢！

张国焘憎恶王明、博古这些人，与他们有个人恩怨。但在肃反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张国焘被从苏联派到

鄂豫皖苏区后，仅凭一堆假材料，就判定红四方面军政委曾钟圣和十一师师长许继圣是国民党改组派特务，张国焘在鄂豫皖主持的肃反，比博古在中央苏区主持的肃反，强度更大。

懋攻会师的时候，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的部队实力悬殊，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有四万五千人，两万多支枪，而一方面军则只有一万人，平均每支枪里只有五发子弹，比起衣衫褴褛的中央红军，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可谓兵强马壮。

两军汇合后，老实厚道的朱德坦率地向张国焘介绍了一方面军的情况，他叹息着说：“现在一方面军是不能打仗了，它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光了，只剩下了一副骨头。这次真是走到绝路了。”

在懋攻，处于强势的张国焘把个人英雄主义发展到了顶峰，两军汇合后，张国焘立即提出要改组红军的领导层，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一贯忍让的周恩来让出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

心力交瘁的周恩来随后就病倒了，他得了肠脓肿，差一点没有能活着走出草地。

中央决定成立新的红军总司令部，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随后，张国焘又提出要改组中革军委和中央政治局，而当

这一要求没有被立即满足之后，张国焘便反对红军的北上路线。

多年之后，当张国焘自己回忆这一幕时，依然没有摆脱那种发号施令的腔调：

我说我们在西北的活动，可能三个计划：一是以现在我们所占领的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可以名之为“川甘康计划”；二是移到陕甘北部行动，夺取宁夏为后方，以外蒙古为靠背。这就是毛泽东所提出来的“北进计划”；三是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方，可以名为“西进计划”。我提出资料，阐释这三个计划的优点和缺点，我说着的时候，大家都一边听一边在翻阅地图。

毛泽东反对张国焘的计划，他指出，西康地区气候高寒，物产贫瘠，根本不可能成为依靠的后方，而所谓向河西走廊进攻的计划，即使能够施行，也只能在到达陕甘宁之后才能考虑，因此，唯一可行的计划就是北上建立陕甘宁根据地。

张国焘本来并不完全反对北上陕甘宁的计划，他还提供了徐海东领导的红 25 军可能已经先期到达了陕北的信息，但是，他恼火的是有人敢于反对他提出的方案。张国焘原

本要打击的对象是博古、洛甫、周恩来这些“共产国际派”，但是，当他看到这些人此时都赞成毛泽东的主张时，张国焘转而集中力量打击毛泽东。

但恰恰是张国焘的嚣张帮助了毛泽东，正是出于对张国焘的强烈反感乃至恐惧，中央政治局这一次空前团结起来，一致反对张国焘。

因为周恩来病倒了，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毛泽东而不是张国焘代表中央政治局，负责党的军事工作。

毛泽东第一次代表党中央负责军事工作，这件大事就发生在懋攻，发生在长征路上。

1929 年，毛泽东被从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任上赶下来。

1932 年的宁都会议，毛泽东被从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任上赶下来。

1935 年的遵义会议使毛泽东在红军中复出，但他当时还只是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

半年后的懋攻会议上，毛泽东取代了周恩来，成为中央军事工作的负责人。这为毛泽东在一年半后当选中革军委主席，铺平了道路。

与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相比，中革军委主席才算是个

真正的主席。

博古不能领导下去了，洛甫能力不够，周恩来病倒了，而张国焘虎视眈眈到了这样的境地，党和红军也只能靠毛泽东了。

毛泽东能够不屈不挠地从宁都会议走到懋功会议，而不是被彻底打倒，如今想来，这也是有必然性的。

其一，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地分析了当时世界的局势，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历史规律，从而为党和红军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毛泽东之所以打不倒，首先是因为他代表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

其二，毛泽东立足于世界形势和中国发展规律的认识，正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略决定战术，正确的军事战略，是红军以弱胜强，不断打胜仗的根本保障。而毛泽东没有被彻底打倒的第二个原因，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他会打仗，就是因为他能够率领红军打胜仗。

还有一个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虽然一度失去了中央的信任，但是，他却最终得到了党内大多数同志们的呵护和拥护，在当时的党和军队的高层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王稼祥、张闻天以及周恩来和朱德，他们在关键

时刻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甚至放弃自己的地位也在所不惜。是他们成就了毛泽东。

如果遇到的都是王明、张国焘之流，那么，毛泽东的命运、党的命运和红军的命运，必将是另外一种结局。

而除了路线正确、会打仗、获得了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之外，毛泽东能够在长征甫一结束，便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毛主席”，还是由于关键性的历史契机：周恩来的病倒和张国焘的嚣张。

正是这两件事凑在一起，才使得当时的中央政治局一致选择了毛泽东。

然而，既然党的历届总书记都不能制约张国焘，毛泽东对于张国焘也只能选择躲的办法。当得知张国焘有以武力胁迫中央的图谋后，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的一部分率先北上，而张国焘则率大部红军南下，并宣告另立中央。

张国焘的南下计划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南下的红军陷入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而西康地广人稀，非但不能成为战略屏障，更使红军完全暴露在敌人飞机的空袭之下。在损兵折将之后，张国焘被迫北上，随后，他提出的向河西走廊进军的西进计划也实施了，但结局却更为悲惨，西

征的红军陷入到马步芳、盛世才和蒋介石的三重打击之中，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几乎全军覆没。

1931年，中国共产党拥有近30万红军，掌握着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边苏区、洪湖苏区、闽西苏区的大量人口，而到了1935年，中共却只剩下陕北一个根据地，其余的根据地全部丧失了。

陕甘苏区是共产党经营得最长的根据地。

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五届中央派刘志丹、谢子长赴陕北创立根据地，这一年底，他们在陕北创建了红26军。1933年，刘志丹在陕北照金与习仲勋会师。1934年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习仲勋任主席，刘志丹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国民党的眼里，陕北的“习、刘”，就等于中央苏区的“朱、毛”。

阎锡山说：“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不赤化”。而国民党84师师长高桂滋则说得更加一言中的：“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20年之江西情形仿佛。”

阎锡山和高桂滋的话，分别登在1935年7月23日和8月1日的《大公报》上，红军进入哈达铺的时候，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搜集到了大量的《大公报》，随后，红

一军团一师参谋长耿飏也从墙上揭下了一张8月1日的《大公报》，并把报纸送到了毛泽东手上。

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才知道陕北原来有一块与中央苏区面积一样大的根据地，知道陕北也有“朱毛”，而陕北的“朱毛”，就是“习刘”。毛泽东当时感叹说：梁兴初有大功啊，你这个侦查连长，一下子就抓回了两个军（指红25军和红26军），还给我抓回来了这么大一块根据地吗！

与中央红军一样，陕北红军也经历了会师、反围剿、肃反。

1935年9月15日，从鄂豫皖苏区出发的红25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率先完成长征，但是，红25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却立即开始进行肃反，时任红25军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的戴季英，下令逮捕了刘志丹、高岗和习仲勋，并严刑拷打。

当毛泽东得知从湘鄂边苏区先期到达陕北的红25军大兴肃反，把陕北根据地的领导人高岗、刘志丹和习仲勋当作反革命逮捕的消息后，他下令立即放人，毛泽东当时愤慨地说：你们这些人做了敌人想做而不能的事情。

而周恩来更当面斥责戴季英说：刘志丹这样的“假革

命”越多越好，而你这样的“真革命”越少越好！

直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此事依然不能释怀，当时，他点了党的历史上犯了不能原谅的错误的的人的名，而王明、张国焘之外，就有戴季英。

习仲勋后来这样回忆说：

千里雷声万里闪。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党中央派的先遣联络员带来了令人无比高兴的喜讯：毛主席来了！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宁边的吴起。他立即向群众和地方干部进行调查。当陕甘边特委龚逢春同志去迎接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了陕北苏区和红军发展的情况，又汇报了当时乱搞“肃反”，把刘志丹等红26军的干部抓起来的问题，毛主席马上下达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干部全部交给中央处理，并指示王首道同志等去瓦窑堡办理此事。我们这100个幸存者被释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北的革命，出现了团结战斗的局面。

“千里雷声万里闪”，“毛主席来了晴了天”，这不是歌词，因为这是事实，也是心声。

1935年10月18日，红军到达陕北吴起，这标志着为时一年的长征结束了。

当1935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北的时候，队伍的人数只有六千人，而这还不及他从井冈山带到江西苏区的人数。

1936年7月3日，中共中央从瓦窑堡到达保安。

1936年12月7日，中革军委改组，毛泽东当选为中革军委主席。

毛泽东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是“毛主席”，那一年，他43岁。

一个多月后，即1937年1月13日，共产党中央机关再由保安移驻延安。

毛泽东当时幽默地说：我们要去住大城市喽！

西北是中国的龙兴之地，陕北是红军长征的终点，也是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起点。日出西天，如果没有陕北根据地的存在，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是不可想象的。

194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演说，他这样感慨万千地说到了陕甘宁边区：

同志们，请你们要认识这个边区。不要总是“不好”，“不好”，“还是不好”！你叫它作“地广人稀，经济落后”，那也该承认。但是，你那个地狭人稠到哪里去了呢？上海在你手里，哪儿去了？你那个中央苏区哪儿去了？给

了蒋介石了。只有这个根据地保留下来了。所有的根据地都丢了，只剩下一个陕北，就是这个陕甘宁边区。

这个地方作用非常大，怎样大？我说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我们经南方一转，好不容易转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才能由这个地方再走出去。好像这样的门啊（毛泽东把手指向党校窑洞的门），所以我说——这就是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好像门的枢纽，能够一开一关。陕北这个地方，上面顶天下面立地，起承转合，所谓起，是从这个地方起，转，就是从这个地方转。万里长征，脚搞痛了，跑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这个地方是我们的落脚点。说是落脚点，就是说我们不是永远在这里住一生，生下儿子，儿子再讨老婆，再生儿子，不，不是的。同志们，我们要走出去，走到全中国去。同志们，这个地方既是我们的落脚点，也是出发点。

西方人把长征理解为“出埃及”的故事。但《圣经》故事只是传说，而长征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这样讲到了长征：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

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然而，长征并不是一次主动的行动，长征是被迫的，是错误路线造成的结果。

因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又说：

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

弱了红军的结果。

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如果说长征是一次伟大的胜利，那么长征便是意志的胜利，是人类意志的赞歌。

所谓意志，也就是毛泽东青年时代所说的抵抗力。长征中无数动人的故事，说明了红军的生命力是如何的顽强。而其中一个是关于著名的断臂将军余秋里的。

余秋里在长征途中左臂负伤，他就是晃荡着一支断胳膊走出草地的。为了止痛，他不断地往断臂上淋水，结果伤口腐烂生蛆，在拖着断臂行军 200 天后，他接受的治疗则是用锯条把断臂连骨带肉的锯下。

女战士周起义参加红军之前是裹了脚的，而她就是凭着一双小脚走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战友们看她实在走不动了，动员她留在当地，说待革命胜利再来接她时，一路没有流过一滴眼泪的她，却嚎啕大哭。

廖承志则亲眼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红军母亲分娩后，为了不拖累部队，把孩子抛入了水中，而就在抛孩子的一瞬间，那个母亲也举身扑入水中，母亲和孩子一起消失在

水中。

这就是长征。

毛泽东青年时代还说过，意志，就是人类追求自由的主动性，而长征就深刻地表现了这种主动性。

如果我们看一下红军长征的示意图，就会一目了然地认识到：什么是意志的主动性。

在遵义会议之前，那象征红军的红色行动路线，是缓慢的、僵直的、机械的，而遵义会议之所以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就是因为这次会议之后，那条红线突然间灵活地翻腾起来，如同巨龙般地在高山与大河之间奋飞。

长征就是这样写在了亚洲的原野上，写在了人类的历史上。

枯瘦的面容、先知的目光、革命家的腿。毛泽东长征时代的形象，就是这样写在了中国人民的心里。

毛泽东青年时代曾经说：“我即宇宙也”，他还说过，天下事皆己事也。

而正是长征证明，毛泽东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红军和革命的命运，竟然是如此的完全一致。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曾经如此感慨地指出：

于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成为毛摆脱在野地位，摆脱

在党内的政见孤立和在延安黄土山沟的流放斗争史。毛泽东扮演了一个先知的角色，但人们对他的预言重视得太晚，以至未能早日取得胜利。这样，毛泽东似乎独自开创了革命，以至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成了他个人的胜利，20世纪的中国历史也就成了他的传奇。革命的命运就是他的命运，革命的实现就是他的自我实现。当我们进入自己设计的角色时，我们都成了自己虚构的东西，而毛泽东与大多数人不同的地方是，他的形象、经历与历史本身一致。

他的这些话，毫无任何夸张成分，因为这是被中国革命血的历史证明了的事实。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如果中国共产党也有自己的《圣经》故事，那么，长征无疑就是最为慷慨悲壮的一章。



267

第十二章

血的哲学

1937年4月-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大当起了教员，他教的课目叫“新哲学”。

刚刚结束了2万5千里的长跑，便在黄土高坡低矮的窑洞里，在陕北炽热而明亮的太阳下大谈哲学，这是何等的境界。

毛泽东说，他讲的“新哲学”，其实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实际上，毛泽东当时的讲授和思考，已经大大突破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因此，今天看来，他的确是在创造一种“新哲学”。

毛泽东为此撰写了长达六万一千字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他每星期二、四上午授课，每次讲四小时，下午还参加学员讨论，前后一共授课一百一十多小时，3个多月从未间断。

毛泽东一生最喜欢的职业是教员，而这三个多月以来，他终于如愿以偿。

毛泽东的课上人潮涌动，欢声笑语不断，而他哲学课上的听众，则是连纸和笔都没有的红军指战员，能够把枯燥的哲学讲到这个份上，充分说明毛泽东是怎样的一个好老师。

因为听众踊跃，课程安排又太紧，所以，毛泽东的备课任务非常繁重。毛泽东居住的窑洞炕上有一个白铁皮的箱子，那是他平时放文件用的，而每到晚上，毛泽东就趴在这个铁皮箱子上，在煤油灯下写他的讲稿，往往通宵达旦。

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加上烟熏火燎，毛泽东看上去成了一个黑脸的包公。

红军将领郭化若从庆阳回延安，听说毛泽东的课非常轰动，便遗憾地对毛泽东说：可惜我不在延安，没听上您的课啊。毛泽东闻言却连连叹息：你哪里知道，我折本啦，折了大本哩！

见郭化若诧异，毛泽东便解释说：我准备了一宿的讲稿，结果上去半个钟头就讲没了。讲矛盾统一法则，我花了4天3夜，才准备好了讲课提纲，哪知半天都讲完了。岂不折本了吗？

毛泽东备课之认真，可见一斑。

看到毛泽东备课写作十分辛苦，他的警卫员贺清华便

跑了60里山路，买了一只鸡和一串辣椒，毛泽东吃饭时发现有了鸡，便问是哪来的。贺清华说，看您晚上写文章不睡觉，脸都黑了，所以就去搞了这个菜。毛泽东道：讲课、写文章是十分高兴的事，我并不觉得苦，再说现在大家都很苦吗，以后不许这样搞了。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贺清华跟随毛泽东散步，在一片荒地上，毛泽东停住了脚，指着一种支杆很高，长着圆叶，开着蓝花的野草说，这个叫冬苋菜，可以吃，以后买不到菜，就吃这个吧。

从那以后，贺清华和其他警卫战士就常去采冬苋菜，毛泽东看到碗里有这菜，便高兴地说：这是很好的菜吗！

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咬得菜根，做得万事。

毛泽东三个多月的授课成果，凝聚为两篇划时代的文献——《实践论》与《矛盾论》，这两篇文献，标志着毛泽东以20世纪人类伟大思想家的形象，屹立于世界舞台。

那一年，毛泽东44岁。

而人们并不知道，这两篇改变了人类思想史的巨著，是毛泽东吃着野菜写成的。

1936年7月，埃德加·斯诺在保安见到了毛泽东，十几天之前，中共中央刚刚从瓦窑堡搬到了这里。他对毛泽

东的第一印象是：“毛是个面容消瘦、看上去很想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

他还说，几乎算得上是衣衫褴褛的毛泽东，看起来却像是个有着深刻洞察力的哲学王。

斯诺是极其明锐的，而那个时候，毛泽东既没有写《实践论》和《矛盾论》，他也还不是中革军委的主席。

后来，斯诺又说，毛泽东的革命改变了中国，而毛泽东的著作，则革了美国的“中国学”的命。

此前，西方的“中国学”一向认为中国没有历史，中国的历史几千年都是在原地循环，几乎没有变化。中国的思想停滞不前，中国不但不能为世界提供原创性的思想，而且，在学习西方思想方面，中国也并不是日本那样的“好学生”。

拿破仑的名言是，“中国是一头睡狮”——实际上，这也不算什么好话，因为这不过意味着：中国只会沉睡，而不会思想。

是毛泽东使中共成为一个有思想的党，他使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站立起来，一如毛泽东使中国人站起来，使中华民族成为了会思想、有思想的民族。

毛泽东的革命惊醒了沉睡的、无声的中国，毛泽东的革命改变了西方主导的世界。毛泽东的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变革，更是一场思想和文化运动，而毛泽东始终把政治看作是一种思想文化实践。

正是毛泽东的革命，启发保罗·科文这样的西方学者写下了他的杰作——《在中国发现历史》，正是毛泽东的思想，激发魏斐德在中国发现了思想，并促使他写下了这样的巨著——《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

也正是毛泽东的革命，启发费正清写下了经典著作——《伟大的中国革命》。

由于有了伟大的中国革命，现代中国从而成为世界上变化最快、变化最为剧烈的国家。由于有了毛泽东思想，中华民族成为了世界上最敢于直面沧桑巨变的民族。

毛泽东改变了现代中国在思想文化上积贫积弱的形象。

1975年，费正清在领取美国历史研究最高奖时这样说：我最大的光荣，是能与毛泽东一起分享这个奖项。

而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则说，毛泽东的两篇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把马克思主义和人类思想推向了全新的高度。

1976年，在访华途中，在美国空军一号上，尼克松总

统一一直都在阅读《实践论》和《矛盾论》，而他后来对毛泽东这样说：主席的思想改变了中国，推动了世界。

而毛泽东则说：我的那两本小书啊，没那么神呢，我只是改变了北京周边的几个地方而已。

西方人崇敬思想，这是因为西方的现代化，西方的崛起，就肇始于启蒙运动。

西方思想肯定变化，因为变化就是现代性的实质。

尽管斯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毛还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但斯诺却凭借着与毛泽东的彻夜深谈，就断定这个人便是中国的林肯与华盛顿。

美国人尊敬毛泽东，是因为他们尊敬一位学者、一位思想家，至于他是不是一位主席，一位政治领袖，则是另一个问题。

这就是美国人的性格，而毛泽东晚年则说：我喜欢美国人民。

埃德加·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中，记叙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与毛泽东谈话时的情景，当谈到《矛盾论》和《实践论》在西方世界产生的巨大反响时，斯诺对毛泽东这样说：

当你在中国进行一场革命的同时，你也革了外国的“中

国学”的命，现在出现了毛派和北京学派的各种派别。不久前我曾经出席过一个会议，教授们在争论着你对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首创性的贡献。会后我问一位教授，如果能够表明毛从未自己宣称有过任何创造性的贡献，那么这对他们的争论有没有影响？那位教授不耐烦地回答说，“没有，的确没有影响。那完全是题外的问题。”

毛笑了起来。他说，2000多年前，庄周写了一篇关于老子的不朽著作（《庄子》），于是出现了一百家学派，争论《庄子》的意义。

毛泽东毫不在意自己是否对人类思想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他也不太清楚围绕着他而进行的思想 and 学术争鸣究竟都在争些什么，毛泽东一生嗜书如命，可他既明白世界上的书是读不完的，更知道在一个知识泛滥和充斥着文字垃圾的世界上，死读书的害处。

王阳明说，这个世界的问题在于“文盛实衰”，如果缺乏独立的精神，批判的思想，那么，世界上那些最朴素的道理，反而会被书本和文字所遮蔽。如果是那样，则会读书越多越愚蠢。

实际上，在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时，蜗居在黄土高坡的窑洞里的毛泽东几乎是没有什么书可读的，《实

践论》和《矛盾论》这两本著作，像毛泽东的其他著作一样，既没有什么旁征博引，也没有采用什么晦涩难解的词汇。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世界上最朴素的书，但也是最深刻的书。因为那是鲜血铸就的中国革命史的思想升华。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经说过：“惊奇者，人类之生涯也。”

而人类历史上最为震惊的大事变，也就是所谓“李约瑟之谜”，即“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何以在近代陷入积贫积弱”，而积贫积弱的中国，何以通过现代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而走向伟大复兴。

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革命，就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莫里斯·麦斯纳说：毛泽东所领导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无论是法国革命、美国革命还是俄国革命，就其深度与广度，就其动员的人口而言，都远不能与毛泽东的革命相比。

毛泽东自豪地说：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从三皇五帝到于今，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

而震动世界的长征，不过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缩影。

《实践论》和《矛盾论》所面对的，正是这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

中国革命是一部史诗和传奇，而毛泽东则把史诗和传奇上升为哲学。

《实践论》言简意赅，它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验论，第二个问题是唯理论，毛泽东通过讲述这两个问题，对旧的认识论做了一个总结。

而《实践论》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实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核心，是毛泽东所谓的“新哲学”、新认识论。

第四个问题，方才是毛泽东的独创，是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人类思想做出的“原创性的贡献”。

在这里，毛泽东提出：认识不仅是“解释世界”，也不仅是马克思所说的“改造世界”，认识是发现和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

如果用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话来说，这就是——实践所面对的，乃是人类从未经验过之“奇境”。

中国所面对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当写作这两部作品时，人类正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华民族则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毛泽东的《实践论》就是为因应这样的“奇境”、就是因应人类此前从未经验过的世界而生的，用毛泽东的话

来说就是：实践不是为了“实现预想的目的”，而是在“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

今天看来，对毛泽东的《实践论》的最好概括，其实就来自历史学家黄仁宇，因为他用了这样一句概括：毛泽东是这样一个人物，“在异常的时代以极端的手段去对抗反常的局势”。

而毛泽东的《实践论》的要旨，正在于它是黄仁宇所概括的这样一种学说：“在异常的时代以极端的手段去对抗反常的局势”。

《实践论》既继往开来，又标新立异，篇幅极短，但容量极大。

它讨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经验论：人类的知识来自经验，这就是感性认识。

在西方哲学史上，大卫·休谟的经验论，代表了人类认识论上的一次革命，大卫·休谟认为，认识来自感觉，由于每个人所处的角度、环境和地位均不相同，因此，他们对于事物和世界的感受是不同的，所谓“认识”无非是“意见”，而“意见”是从特定立场出发对自己经验的总结，它不可能是绝对的，人们围绕着不同“意见”进行的争执，因而也是不可能停止的。

世界充满差异，“一千个人里有一千个莎士比亚”，感性认识无高下之分，也无对错之辩。

康德说，正是休谟立足于感性经验的“怀疑论”，打破了“独断论”的迷雾。

《实践论》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唯理论。而在西方哲学史上，唯理论是以康德的思想为代表的。

康德认为，人类先天有认识能力，这就是指逻辑推理、综合分析和判断能力，当然，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论理”能力，康德说：所谓“启蒙”、所谓人类思想的“觉醒”，也就在于发现这种能力，而人类思想的进步，也就在不断锻造和发扬这种能力，并运用这种能力，对纯粹的经验进行批判。

康德说，如果仅仅依赖感性经验，人类永远不会发现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而“日心说”的发现，恰恰是哥白尼大胆地运用理性、计算和推理的结果，因此，康德把“理性的发现”，称为一次“哥白尼革命”。

于是，康德说：启蒙，就是大胆运用你的理性，就是运用你的理性去批判纯粹的经验。

毛泽东则批评党内和红军中的“经验主义者”们——只能认识那些“看得见的东西”，而不能“用脑子去想一

想”，即通过理性思考，去认识那些“看不见的东西”，从而不会思考“战略问题”，而当着毛泽东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与康德批判那些纯粹的“经验主义者”是一样的。

那么，认识究竟是来自“感觉”还是来自“理性”呢？

在西方哲学史上，围绕着“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各执一端，长期不能化解。

而《实践论》则认为：认识来自感觉，但是，人类认识的发展和进步，则取决于理性，取决于理性对于经验的批判。

令人惊叹的是，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只是用一个故事，就清楚地阐述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之间的关系，这个故事讲的是“外面来的人”是怎样认识延安的：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两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

生们的感官，引起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里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里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资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话，那末他们就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

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毛泽东讲哲学，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说起的，他这样做，就是希望刚刚结束了2万5千里长跑的红军，立即开始一次思想的长跑，毛泽东讲哲学，是为了让在长征中“开动了两只脚”的红军，要进一步学会“开动脑筋”，要学会大胆地发现和运用他们的理性。因此，他把这种思想上的锻炼和长跑，称为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

那么，在人类思想史上，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矛盾，究竟是怎样得到解决的呢？毛泽东说，这个矛盾就是由马克思来解决的。

因为马克思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才是

一种全新的认识论，马克思的哲学，方才是“新哲学”。

《实践论》的第三个方面，就是从这个角度，说明了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马克思指出，认识活动不仅是从感性到理性的活动，认识是实践活动。

马克思认为，人类的认识活动，不仅是解释世界的活动，更是改造世界的活动，这就好比用木头加工椅子一样，椅子来自木头，但制作椅子的过程却是对木头的改造和否定那样，这种生产活动被称为“实践”。

而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就是把人类的认识活动等同于实践，也就是人类的生产活动，这也就是毛泽东所概括的：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

毛泽东又说，生产活动绝不限于思想活动，思想活动只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活动，它所依据的生产资料，无非是人类的知识经验，即它与工人做工、农民种地的区别，仅在于所采用的工具和依赖的生产资料的不同。

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也正是通过“改造世界”的实践论，超越了休谟和康德那种单纯的“解释世界”的认识论，从而也超越了此前的西方哲学：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

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定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指导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新的认识论，就是因为这种新认

识论既不是经验论，也不是唯理论，而是实践论。实践论的实质，是把人类活动理解为生产活动，认识，即意识形态的生产，是人类生产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最简洁而深刻的概括，在此前，的确还没有谁对马克思主义做过这样的概括。这种概括是惊人的，但也是准确的，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发现正是如此——把人类的一切活动描述为生产活动，而那篇文章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第四，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或原创性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此前哲学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它们对待世界的态度之不同，这也就是所谓“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不同。

但是，毛泽东与马克思的不同则在于，毛泽东所面对和理解的“世界”本身与马克思不同。

在毛泽东看来，我们面对的不是既成的世界，恰恰相反，我们面对的是全新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上，“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化为乌有了”。

实践论，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处理变局、危机、革命的学说。实践所面对的对象，不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世界，

而是世界发展的“出乎意料的结果”，所以，毛泽东指出：实践这种认识活动的基本特点，主要的不是“实现预想的目的”，而是“在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

实践论所要面对的是变局、危机，特别指是改造世界的革命运动所必然遇到的危机、挫折与变局，与马克思和列宁不同，毛泽东的实践论的要义，不仅在于鼓舞和指导人们去改造世界，去勇敢地进行革命，而更在于指出：革命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必然会遭受挫折、失败和危机，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把危机转化为契机，从失败寻找转危为安的战机。

实践的学说不仅是为了指出真理，而更是为了明锐地揭示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实践论的意义不仅在指出前进的方向，而更在仔细地标注出认识道路上的陷阱。

而《实践论》最为开创性和原创性的思想，也就体现在这里：

然而一般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到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

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

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正是从毛泽东的《实践论》的角度来说,共产主义并不是一种大同理想,共产主义也只是人类所面对的前所未有的“奇境”,共产主义,首先意味着一种人类从来没有经验过的革命性巨变。

毛泽东青年时代在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说过:

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往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往平安。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又生出波澜来。然大同亦岂人生所堪乎?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相处于大同之境矣。

而只有理解了毛泽东的实践论,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如下的话: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只有理解了马克思上述这些话,我们才能理解《矛盾论》中这样的叙述: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的专政,正是准备着取消这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高级阶段去的条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正是为了消灭共产党,正是准备着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进行革命战争,正是准备着永远消灭战争的条件。

中国革命是从失败中走出来的，毛泽东的实践论之所以不是一般的关于革命和改造世界的学说，这就是因为，毛泽东的实践论是直面革命的危机、变局乃至“可能失败”的学说。

革命者的意志和勇气，就在于勇于正视自己的失败，勇于正视“变局”。“变局”和失败是出乎意料的，但正是大革命的失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方才教育了党，从而使大家把这样的话放在心上：“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

失败是人生之“奇境”，失败是成功之母，不经历失败的胜利，谈不上是什么胜利。与其去设计一个理想的未来，不如脚踏实地地总结失败的经验。正是从“可能失败”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从各种最坏的可能性角度去思考问题，正是这种思考方式，使毛泽东对于革命的思索，与历史上的一切革命者划开了距离，从而成就了他自己的“实践论”。

《实践论》是大智大勇、开天辟地的学说，因为它把中国革命这一伟大的传奇上升为哲学，而毛泽东之所以能

够写出《实践论》这样的著作，就是因为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传奇。

黄仁宇这样说：

（对于毛泽东，）传统中国史家的“褒贬”手法完全无法适用，因为他有非凡的生涯。历史学家尤其还必须记住：他的妹妹、两个弟弟、一个妻子和一个儿子都因为他而坦然赴死，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毛泽东是一个伟人，他有超强的行动能力和无比远大的视野，这就好像我们看历史上那些伟人一样，例如拿破仑和凯撒，我们可以崇拜他，也可能为他而悲伤，但却绝不可能去模仿他。因为他是这样非凡的人物，在异常的时代以极端的手段去反抗反常的局势。

毛泽东本人极为重视《实践论》，但对于《矛盾论》，他的想法则比较复杂，1951年在编辑毛选时，毛泽东曾经非常踌躇，一度甚至不打算将《矛盾论》收入其中。

不过，在路易·阿尔都塞看来，毛泽东最伟大的著作便是《矛盾论》，他甚至认为，《矛盾论》推翻和颠覆了整个西方思想史和哲学史。

矛盾是辩证法的基石，矛盾学说的集大成者便是黑格尔，马克思认为，他自己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就是矛盾和辩

证法的思想。

但是，阿尔都塞却认为，毛泽东全盘颠覆了西方的矛盾论和辩证法，因为毛泽东所说的“矛盾”，与古希腊哲学、黑格尔哲学乃至马克思哲学中所的“矛盾”，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阿尔都塞这样说：

毛泽东于1937年撰写的《矛盾论》一文对于矛盾问题作了一系列分析，在那里，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似乎与黑格尔的观点毫无关系。这部小册子的基本概念，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矛盾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等，在黑格尔著作中都是无从找到的。毛泽东的文章是根据中共党内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写出来的，总的说来是一篇叙事文，在某些地方也采用抽象的方法。在叙事部分，他的概念与具体经验相适应。在抽象部分，这些含义丰富的新概念主要是对一般辩证法的具体说明，而不是马克思的社会观的历史观的必然蕴涵。

阿尔都塞是十分敏锐的。黑格尔所说的矛盾，是人们思想和意识中的矛盾，而马克思所说的矛盾则是指人类社会的矛盾，但是，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讨论的“矛盾”，确

实都不是毛泽东所说的矛盾。

极而言之，毛泽东的矛盾，与黑格尔所说的矛盾毫无关系，同时，它也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矛盾所能蕴涵的。

毛泽东所说的矛盾，首先就是指事物本身的差异性。

因此，在毛泽东那里，所谓矛盾的普遍性，也就是指矛盾的特殊性，而所谓事物的差异性，就是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事物，毛泽东所说的“矛盾的普遍性”，其实也就是尼采所说的“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构成了区别，而区别和差异，才是世界的本质：

首先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

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

在毛泽东看来，离开了对具体的事物的分析，离开了“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质的方式来解决”的态度，空谈矛盾，空谈世界是由矛盾构成的，这不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那就是“教条主义”的根源。

在毛泽东看来，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并不是不承认矛盾，而是他们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矛盾，教条主义者们当然也承认世界是由矛盾构成的，但是，他们不承认“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式才能解决”。

他们知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实践决定理论这样的大道理，但是，他们不知道，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矛盾，不懂得这些矛盾之间是如何互相依存、互相对立、互相转化的。

毛泽东不但拒绝了西方的“矛盾论”，他还认为：那种“矛盾论”不过是一种机械的教条，它也构成了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根源。

毛泽东的《矛盾论》，是从教条主义的“矛盾论”的终点上开始思考的。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提出了决定革命战争胜败的六个矛盾，他指出：这六个矛盾构成了

彼此制约的网络，忽视其中哪一个，都会造成全局的失败。

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无法解释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正由于我们处在多重矛盾互相决定的局面中，所以，没有哪个矛盾是唯一决定作用的，具体哪一种矛盾的地位更加重要，要依据当时的具体环境做出选择与判断。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真理，但是，自从有了人类组织以来，政治形式和国家政权在历史发展中便有决定性作用，因为政权形式可以影响并决定所有权形式、所有制形式、管理方式。例如，俄国的1917年和中国的1945-1949年之间，就是政治领域里的矛盾，而非经济领域里的矛盾，是决定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

而意识形态之所以是重要的，这是因为意识形态生产着特定的社会价值观和特定的人，并为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提供目标和方向。

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印证了毛泽东的判断，自20世纪中期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生产领域越来越不占优势，而与此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方面的优势，已经转化为文化资本垄断和金融扩展——而这都属于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生产”的范畴。

毛泽东说：

有些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

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教条主义者既不懂得：“实践”面对的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结果，他们也不懂得：研究矛盾，也就是面对“差异”和差别。这样的人便不能真正理解何谓革命，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地领导革命。

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固然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每一次的结果又总归不同。

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 1871 年的巴黎公社运动和 1917 年的俄国十月革命。

这两次革命所处的历史情境是完全类似的，两次事变的起因，都是列强之间的战争，都是战争导致了帝国的垮台，法国和俄国都成立了临时政府，而两个临时政府也都控制不了局面，因而都产生了“双重权力”，在法国，就是“巴黎国民自卫军”，在俄国就是“工农兵苏维埃”。

但是，除了这些相同之处外，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在三个方面所面对的矛盾又是根本不同的：第一，相对于俄国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来说，梯也尔的第三共和国政府

力量比较强。第二，相对于领导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巴黎公社的领导集体十分弱小。第三，相对于马克思的隔岸指挥，列宁则是亲临斗争的第一线。

因此，如果只是看到矛盾的普遍性而不是特殊性，就不能解释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巴黎公社的失败。

世界是充满可能性的，其中，人的因素是极为重要的。马克思说：

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如果世界是由几个干瘪的“矛盾”教条支配，而这些教条又掌握在几个先知的手里，那么，这些矛盾的干瘪教条，便与“上帝的律令”没有什么不同，世界从而就会堕入神秘，而不再是充满可能的了。

马克思正是这样祛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的外壳”，而毛泽东则说：空谈矛盾毫无意义，问题在于，当我们说到矛盾的普遍性时，这就是说差异是事物的本质，当我们

强调矛盾的斗争性时，要注意区别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要注意不同斗争形式的区别，当我们说矛盾就是斗争的时候，不要忘记多元的矛盾可以共居、可以转化。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和对抗性，但是，在毛泽东看来，对抗性只是矛盾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不是矛盾的一切形式：

在矛盾的斗争性的问题中，包含着对抗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回答说：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

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

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在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里面，这种对



299

抗的矛盾就变为非对抗的矛盾，而当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会消灭。

毛泽东的《矛盾论》与其说是发展了黑格尔的矛盾学说，还不如说是批判和摧毁了这种学说。

在《漫长的革命》中，斯诺写到，他曾经问毛泽东说：“从1927年起，你就为学习战争的艺术而非常忙碌，在1937年之前，你是否有时间读过黑格尔的著作？”

毛泽东说，他读过黑格尔的著作，在这以前还读过恩格斯的著作，但是，如果没有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他是完全不可能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种著作的，毛泽东后来说过，我的书哪里是我写的，那是从革命者的流血牺牲中得来的，那是血写的。

毛泽东的著作，包括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正是从流血牺牲的经验和教训中得来的，那是鲜血铸成的经典和丰碑。

第十三章

安得倚天抽宝剑

1937年8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这一年，除了在抗大上课和写哲学讲稿之外，还有一件令毛泽东高兴的事，这就是9月25日，林彪指挥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歼灭了日军一千多人，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

1938年4月，国民党军则在台儿庄与日军会战中取得胜利，此役歼敌1万余人。

但噩耗却随即源源不断地传来：徐州会战失利，南京沦陷，日寇在南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随后就是武汉保卫战失败。

1938年5月，毛泽东再次把自己关在了窑洞里，他七天七夜没有下炕，除了一天两顿稀饭和咸菜外，就是不停地抽着劣质的纸烟，埋头写作，以至于连棉鞋被火盆烤着了，他也浑然不觉，警卫员贺清华后来说：七天七夜不睡觉，

就是铁人也要熬倒了啊，主席当时真是拼了命了。

第八天，当窑洞门打开的时候，毛泽东整个人已经僵得不能动弹了，他连呼手疼，贺清华打来一盆热水，让毛泽东泡手，好久才缓过劲来。

毛泽东就是在这七天七夜里写成了《论持久战》。

冯玉祥得到这本书后，立即自费印了3千册，分送国民党要人。而白崇禧读后，更是大为叹服，他还从中归结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两句话，并以军委会的名义通电所有抗战部队。如获至宝的白崇禧把《论持久战》送给了蒋介石，而这一次，连蒋介石也不能不赞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了。

抗战八年，国共两党携手共御外侮，而指导抗日战争的战略，则是由共产党人毛泽东提供的。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超越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圣武纪》，《论持久战》是批判的武器，它随即转化为了对日本帝国主义无情的武器的批判。

1956年，前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前日本海军航空兵司令官远藤三郎，在北京见到了他毕生最崇敬的对手毛泽东。

远藤三郎，1893年1月2日出生于日本山形县，15岁入日本士官学校，随后留学于法国陆军大学，远藤三郎与

石原莞尔，并称“日本军界最有思想的人”。

山形，以出宝刀而闻名，就在那一次会见中，远藤三郎把祖传的宝刀献给了毛泽东。

这是出乎意料的举动，是日本军人所行的前所未有的大礼。

露丝·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说：象征天皇制度的菊花，象征武士道精神的宝刀，这是日本文明的根本，是必须用生命来守护的圣物。

即使在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时，日本军人也只是被迫放下了武器，但却没有献出自己的佩刀。

远藤三郎正是如此。当时的他认为：日本是先败于美国，再败于不讲信用的苏联，日本根本不是败于中国。

在远藤三郎看来，日本的战败，是纯粹军事战略上的失败，而不是道义上的失败。

所谓军事战略上的失败，其关键在于日本在“大陆政策”与“海洋政策”之间没有做出清晰的判断与选择。

按照远藤三郎和石原莞尔的设想，如果日本在占领中国东三省之后全力进攻苏联，那么，在德国和日本东西夹攻之下，苏联很难不被打败。而如果以朝鲜、伪满洲国和日本本土为基地，假以20年的长期准备，再全力与美国争

夺太平洋，那么，日本占领太平洋的东部，与美国“划洋而治”也绝非是不可能的。

石原莞尔和远藤三郎起初的设想就是如此：以“日、鲜、满一体化”为前提，实现“第二次产业革命”，这包括在远东建立一个年产2千万吨钢铁的大熔炉，计划年生产飞机1万架，将人造石油作为研发重点，大量生产飞机、汽车、船舶、工业机械，其中还包括打通朝鲜海峡海底隧道，建设一条从日本出发，经中亚到达欧洲的新干线计划。

而要实现这个计划，需要20年的时间。他们原本设想完成第二次产业革命之后，日本再举兵指向西伯利亚和太平洋。

但是，在远藤看来，由于“没有头脑”的东条英机代替了他们，这个宏大的计划搁浅了，而且，直到战败，日本战略依旧还是在“大陆”与“海洋”之间徘徊，而在整个战争中，日本的最高统帅部都没有形成自己清晰的战略。

这就是他所理解的日本战败的真正原因。

在他看来，日本之战败，就是由于东条英机这种毫无头脑的人的瞎指挥。

1947年2月，远藤作为战犯被关进了东京的巢鸭监狱，由于长期反对东条英机，他的罪责被减轻了。一年后，他

被释放。从此，远藤三郎在埼玉县耕田为生，除了种地之外，远藤三郎平日闭门不出，苦苦思考着日本战败的原因，直到他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读到了《论持久战》，远藤三郎的思路从此轰毁，他说：自己“觉悟在一夜之间”。

那么，在这“一夜之间”，远藤三郎究竟觉悟到什么呢？

远藤三郎后来在《日中十五年战争与我》一书中这样说：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我这个日本将军，方才第一次真正明白了“日本战略”实际上是什么。

如果说，直到战败，日本的决策层还在争论日本战略究竟是什么的话，那么，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已经准确地概括了日本战略，而这个战略就是：“中间突破、两翼齐飞”。

毛泽东指出：日本战略，便是以整个中国为基地，向“大陆”和“海洋”两个方面展开，而他用十几个字，就一举概括了日本战略实质：“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毛泽东看来，日本战略并非不清晰，恰恰相反，日本战略一开始是深谋远虑，非

常清晰的：柿子捡软的捏，首战找弱敌打，从中路突破，进攻最弱势的中国，然后以中国为基地，逐步向两翼展开——这本是极为精明的战略。

在毛泽东看来，这一战略成败之关键，不在远藤之流所谓的“两翼”，而在日本能否突破“中间”。

然而，百密一疏，在这个精心的战略布局中，日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长时间、如此持久、如此顽强的抵抗。

正是中国的长期抵抗，使日本陷入了首战不利的兵家大忌，正是中国的抵抗，使日本陷入到久拖不决的战争泥潭中。而从此之后，日本只能是步步被动，再也不能采取主动的战略。

日本战略困境，并不是由于起初战略规划上的模糊，而是由于陷入到中国之持久战这个“大泥潭”之中的结果。

日本看起来是输在了“两翼”，但实际上却是输在了“中间”。

因此，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日本为什么竟然没有想到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顽强持久的抵抗。

远藤三郎去世前一年，日本战后最杰出的思想家丸山升，出版了他的名著《近代的超克》。在这部著作中，丸山升

深刻地思考并回答了究竟什么是“抵抗”这个问题。

丸山升说：日本没有想到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顽强持久的抵抗，这就是因为：日本自己从来不懂得“抵抗”究竟是什么，日本不但不知道什么是抵抗，而且，日本还把中国对西方强权的抵抗，视为亚洲式的保守、落后和“不开化”。

“日本精神”中所缺乏的，正是对强者的抵抗。

丸山升说，日本之所以自夸自己比中国优秀，无非是因为自以为是“西方的好学生”，但是，这样的所谓“好学生”，却是为鲁迅所不齿的“弱者”和奴才。

而这就是日本甫一战败，那些俯首帖耳的良民们，就涌上街头，热烈欢迎美国占领军的原因。

丸山升引用了鲁迅的话，来说明什么是“抵抗”和“亚洲的抵抗”。

鲁迅这样说：

“强者受到欺凌，抽刀向更强者。而弱者受到欺凌，则抽刀向更弱者”。

在丸山升看来，日本恰恰就是这样的真正的弱者，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是西方列强的奴才，日本自己不但在西方面前不抵抗，而且，吉田松荫等“明治志士”们，

反而提出了所谓“得失互偿论”：即“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这当然就是“受到强者的欺凌，而抽刀向更弱者”，而福泽渝吉的《脱亚论》，不过是把这种最可悲的弱者，粉饰为强者的遮羞布而已。

那么，中国与日本的最大不同是什么呢？丸山升简短地概括说：这就是“中国抵抗”。

《近代的超克》出版于1983年，回顾20世纪前半页的历史，丸山升感慨说：中国不但顽强地抵抗着西洋，不但最终打败了西方的走狗日本，而且，共产党人在打败了美国的走狗蒋介石之后，1950年的中国更抽刀向日本和蒋介石的主子美国。

毛泽东的中国“抽刀向更强者”——毛泽东的道德，这才是真正的“强者的道德”。

而与毛泽东的中国比起来，日本根本就不是什么强者，而就是西方强权的奴才，是可耻的弱者。

“中国抵抗”——这就是一个日本思想家，对以毛泽东和鲁迅所代表的中国精神的最精准概括，它一举说到了《论持久战》的核心。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益增其怒号。”“世界一切

之事业及文明，姑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

这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名言。

面对强权，拔刀而起，奋而抵抗，这就是毛泽东的性格、鲁迅的性格，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品格。

让我们跟随着日本思想家的求索，再次回到《论持久战》那震撼了远藤三郎的最关键的一部分吧。

在这里，屹立在黄土高坡上的毛泽东，一举回答了日本战略是什么，以及什么叫“中国抵抗”。

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最危险的时候，毛泽东这样告诫我们说：

中国不抵抗，日本就不费一弹安然占领中国，东四省的丧失，就是前例。中国若抵抗，日本就向着这种抵抗力压迫，直至它的压力无法超过中国的抵抗力才停止，这是必然的规律。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的野心是很大的，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那些认为日本将在占领华北、江浙一带以后适可而止的人，完全没有看到发展到了新阶段迫近了死亡界线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和历史上的日本不相同了。

我们说，日本的出兵数和进攻点有一定的限制，是说：在日本一方面，在其力量基础上，为了还要举行别方

面的进攻并防御另一方面的敌人，只能拿出一定程度的力量打中国打到它力所能及的限度为止；在中国一方面，又表现了自己的进步和顽强的抵抗力，不能设想只有日本猛攻，中国没有必要的抵抗力。日本不能占领全中国，然而在它一切力所能及的地区，它将不遗余力地镇压中国的反抗，直至日本的内外条件使日本帝国主义发生了进入坟墓的直接危机之前，它是不会停止这种镇压的。

日本国内的政治只有两个出路：或者整个当权阶级迅速崩溃，政权交给人民，战争因而结束，但暂时无此可能；或者地主资产阶级日益法西斯化，把战争支持到自己崩溃的一天，日本走的正是这条路。除此没有第三条路。

那些希望日本资产阶级中和派出来停止战争的，仅仅是一种幻想而已。日本的资产阶级中和派，已经作了地主和金融寡头的俘虏，这是多年来日本政治的实际。日本打了中国之后，如果中国的抗战还没有给日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还有足够力量的话，它一定还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亚，甚或两处都打。欧洲战争一起来，它就会干这一手；日本统治者的如意算盘是打得非常之大的。

当然存在这种可能：由于苏联的强大，由于日本在中国战争中的大大削弱，它不得不停止进攻西伯利亚的原来

计划，而对之采取根本的守势。然而在出现了这种情形之时，不是日本进攻中国的放松，反而是它进攻中国的加紧，因为那时它只剩下了向弱者吞剥的一条路。那时中国的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的任务，就更加显得严重，更加不能丝毫懈气。

而《论持久战》这一部分的小标题，叫做《兵民是胜利之本》。

在远藤三郎看来，毛泽东这醍醐灌顶的论述说明了：正是中国的持久抵抗救了苏联，如果不是日本陆军被中国牵制并被极大地削弱，那么，日本原本早就可以挥师北上，而那个时候，在西线穷于应付希特勒的斯大林，还能够阻止日本的进攻吗？

他的结论是：根本不可能。

也正是中国的持续抵抗救了美国，如果日本能够顺利占领中国本土，那么，日本就有足够的力量进行20年的准备，并依据广阔的大陆、新型的产业政策与美国争夺海洋霸权。那时美国还能从海上对日本进行封锁吗？

显然也不可能。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持续抵抗，实际上也救了日本，如果日本顺利地占领中国，那么，日本就将进行“两翼齐

飞”的战略，即同时进攻苏联和美国，如果是那样，那么战争的规模将无限地扩大，全人类将为战争付出更大的代价，而日本最终将会失败得更惨。

日本之所以一直不承认道义上的失败，这就是在远藤三郎乃至石原莞尔等“有思想的军人”看来，日本发动战争的根本目的，就是力图以“东方的价值”，批判“西方的价值”。

但是，读了《论持久战》之后，远藤三郎方才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东方价值”。

远藤三郎后来这样说：真正的“东方价值”，就是抵抗强权，而人类的普世价值就是和平，武的意义是“止戈”，“止戈”才是军人的道德，即“武德”。

而这正是《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为永久和平而战”。

当毛泽东写《论持久战》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全面爆发，而毛泽东却预言说：这次大战与此前一切战争都不同，因为它将会产生一个极为重要的成果，这就是它将使全人类认识到：和平是全人类最普世的价值。

“和为贵”，和平超越了“东方价值”和“西方价值”。而战争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消灭战争。

正是受到毛泽东所谓“为人类永久和平而战”论断的启发，二战结束后，远藤三郎最早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建立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

远藤三郎差不多长毛泽东一年，但是，他却这样说：在他（毛泽东）面前，我好像是一个后辈见到前辈一样，心中充满了惶恐与感激。

这种话，田中角荣首相也说过，但是在差不多10年之后。

在那次会见中，远藤三郎对毛泽东这样说：我为谢罪而来，很抱歉，我这么晚才读到您的著作，觉悟得太晚了！您是我的先生。

他还说：我们日本军人，再也不与中国打仗了。

毛泽东则说了如下著名的话：不需要道歉，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远藤三郎当即把祖传的宝刀举过头顶，以九十度鞠躬的大礼，呈给了自己的偶像——“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的毛泽东。

“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不战而屈敌百万雄兵。

在中南海四壁皆书的朴素书斋里，毛泽东接受了远藤三郎的诚意，并回赠了一幅齐白石的画作，上面更有毛泽东的亲笔题词：“承远藤三郎先生惠赠珍物，无以为答，谨以齐白石画一幅为赠”。

陆地与海洋。这个问题岂止困扰着日本，而且也困扰着全人类那些最发达的头脑，最强悍的心灵。

猛士决战，岂止在疆场。毛泽东与远藤三郎当年的对话，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1919年，英国战略家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提出了“陆权论”。

他指出：欧亚大陆是世界的核心，是“世界岛”，而一切海洋国家，都处于边缘。“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能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世界。”

正是基于这样的陆权理论，英国、德国和苏联，先后展开了对欧亚大陆——特别是其核心地带的争夺。

与麦金德不同，“二战”期间，美国战略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则依据他的“三海战略”，提出了“海权论”。

斯皮克曼指出：地中海是控制欧亚大陆和非洲的要塞，

加勒比海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要冲，而中国南海则是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咽喉，谁控制了这三个“海”，谁就控制世界。

麦金德把欧亚大陆视为中心，把海洋视为边缘，但斯皮克曼则反其道而行之，他指出：只要以边缘包围中心，便可以瓦解中心。

冷战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正是根据这样的战略，包围并瓦解了苏联。

但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却转而追随麦金德的陆权战略，再次兴兵西亚和中亚，最终，今天的美国则困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中。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当年，陷入了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徘徊而顾此失彼的是日本，而今，同样陷入了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徘徊和顾此失彼的，则是美国。

如果远藤三郎活着，他也许会说：这就是历史的循环，这就是宿命和报应。

陆地与海洋，海权论与陆权论，难道是命定地对立着的一对矛盾吗？

比麦金德和斯皮克曼更早、也更深入地思考了“陆地”与“海洋”的，其实是中国人魏源。

《南京条约》签订后，魏源发愤写下了伟大的战略著作《圣武纪》。

面对英军从东南海上来的危局，魏源提出了这样天才的构想，他指出：一味地固守东南沿海，与敌决胜于海上，这是错误的战略，而正确的战略，应是打到敌人后方去——即打到英属印度去。

英国人的战略是从海洋攻向大陆，而我则应反其道而行之——从陆地攻向海洋。

正是根据这样的战略，魏源把视野转向了欧亚大陆，转向了新疆、西藏和云南。

因为新疆、西藏与云南，这是通向英属印度和印度洋的走廊。也正是根据这样的战略，魏源更把视野转向了与广西、云南、西藏接壤的缅甸、泰国和越南，因为缅甸和泰国，这是从孟加拉湾到南海的咽喉，只要锁住这个咽喉，英军便有去无回，而越南则是南海的支柱，只要从广西、云南一线稳住越南，则南海自然就有了屏障。

正是魏源这一天才的构想，把欧亚大陆与海洋——印度洋和太平洋融合为一体，从而一举超越了陆地与海洋的对立。

因此魏源指出：大陆就是海洋，陆权就是海权，而如

果用今天的说法，这便是：“一带”即是“一路”。

故魏源说：志在大陆，即所谓志在海洋也。

而继承了魏源这一伟大战略思想的人，当然就是毛泽东。

1935年10月，在写罢《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后，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念奴娇·昆仑》。

这首词，以包纳四字的气魄，阐述、发挥并总结了魏源所开创的战略思想，它把陆地与海洋融合为一体：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何谓海洋？海洋就是夏日消融的大陆；何谓大陆？大陆就是江河横流的海洋。

海洋与大陆不是对立的。

“海权”与“陆权”，本是一体。

“横空出世莽昆仑”，魏源和毛泽东，就是这样超越了单纯的“陆权论”和“海权论”。

当年曾经穷凶极恶的远藤三郎，之所以心悦诚服地献出了他祖传的宝刀，那不过是因为他见识了毛泽东的“倚天抽宝剑”。

正是在“倚天抽宝剑”的毛泽东面前，洪水一样蜂拥而上的强敌，无望地退却了。

今天，“倚天抽宝剑”的毛泽东如果依然健在，他会怎样教诲我们呢？

毛泽东没有离去。因为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还在指导着他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

毛泽东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包纳四字的《念奴娇·昆仑》。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骄傲，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骄傲。”

第十四章

朴素的政治，朴素的文明

319

1942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苏德战争相持不下，而中国的抗战，也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世界历史的大转折，就此开始。

在以《论持久战》回答了日本为什么必然要失败之后，毛泽东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即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和中国文明，为什么会在近代陷入积贫积弱、落后挨打。

中国的历史何以兴衰更迭，而绵延的中华文明，何以会陷入周期性的腐败？

那时的蒋介石，其实也在思考着同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就是震动世界历史的“李约瑟之谜”。

“多少人在思索这解不开的问题。多少人在黑夜里无奈的叹息。多少人的眼泪在无望中抹去。”

这一谜团，深深地困扰着中华民族无数志士仁人。

蒋介石本究竟是沉不住气的人，对这个问题，自然是他率先给出了答案。

1943年，蒋介石出版了由陶希圣捉刀代笔的著作《中国之命运》。抗战期间的蒋委员长在重庆正襟危坐，一本正经地做起了学问——他从明代的崩溃开始反思中国历史。

今天看来，蒋介石的理论也有一定的独创性。

学术界有一种说法，即“崖山之后无中华”，也就是说，南宋被蒙古所灭后，中华文明就衰落了。不过蒋介石则认为，蒙古鞑虏，毕竟为明所驱逐，元不足道。实际上，是明被女真所亡之后，中华文明方才真正走向了衰落。

在蒋介石看来，今日之中华民国决不能重蹈明亡之覆辙，故当务之急，就是找到明亡的原因。

那么，明亡的原因究竟何在呢？蒋介石认为：明朝灭亡的原因，是因为它“一败于外寇，二败于流寇”，即一败于满清，再败于李自成。

而蒋介石指出，当今之中国同样也是如此。当今之“外寇”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而所谓“流寇”究竟是谁，则不言自明。

那么，中国如何才能避免衰落的命运，而明朝怎样才能不亡呢？

1940年，钱穆在《国学大纲》中这样说：“若先和满，一意剿寇，尚可救”。而傅斯年也认为，明朝要避免灭亡，

那就必须采取“先和满，再剿寇”的政策。

而这就是中国当时“大儒”们的意见，说白了，它与汪精卫的政策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在当时的语境下，这无疑就是说：国民党应该先与日本妥协和谈，然后一意消灭共产党。

而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所阐释的，其实也是同样的一种主张。

蒋介石的观点从来就不是孤立的，而《中国之命运》中提出的观点之所以具有代表性，就是因为在人类陷入二战的炮火、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关头，蒋介石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中国精英阶层的主张乃至“共识”，代表了中国上层精英人士对于人类命运的反思。

1944年，是明亡三百周年，而自1942年以来，通过反思明朝灭亡的教训，来思考中国衰亡的原因，以寻求人类的出路，这便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重要的话题。

而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敢于与蒋介石以及诸位“大儒”们公开唱反调的，只有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认为，明既非亡于“外寇”，也非亡于“流寇”，而是亡于自身的腐败。

郭沫若的文章说到了国民党的痛处。

抗战期间的国民党究竟有多腐败呢？仅从其货币政策上，便可以清楚地看到。

抗战期间，齐白石请了一桌客，结果花了4千万法币——这个数字可谓骇人听闻。

1942年，鉴于中国的法币发行量已经达到了1937年的32828倍，国民政府已毫无信用可言，于是，美国决定给予中国3亿美元援助贷款，以拯救即将破产的法币。随后基于形势严峻，美国遂不得不于1942年2月2日，宣布将对华贷款提高到5亿美元。而国民党政府先是决定将这笔美元存在美国，随时用于结汇，以稳定汇市，随后，却又决定将此贷款用于购买美国货物，来华生利。

于是，国民政府就是这样自己做起了战时投机生意，而这笔贷款的相当部分，便沦为当局经办者自行购物、特别是在美国投资不动产，此即所谓“发国难财”一说的由来。

经济学家马寅初提出要对这笔“国难财”征税。不料此论一出，马寅初反被政府囚禁于重庆歌乐山。马寅初的《通货新论》一书，即为囚禁时所做，当时，他这样感慨说：国民政府口头上奉的是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宗旨，实际执行的是“地上为私”四个大字。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里的名言是：面对天下饥荒，

人民陷入水火，“聚敛”的是官家，而“救灾”的却是“寇家”，于是，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百姓却是“望寇剿兵”，人心所向，明朝必亡。

郭沫若的文章发表之后，国民党当局立即组织叶青、陶希圣等在《中央日报》撰文，予以高调挞伐。

蒋介石一生，起码被郭沫若“坑了”两次，而且都是“坑”在了节骨眼上。蒋介石有充分的理由恨郭沫若。

第一次是1927年4月9日，原国民革命军司令部行营主任——时任蒋介石“大秘书”的郭沫若，奋笔疾书《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公然以一只笔对抗蒋介石的屠刀，一举揭了蒋总司令的老底这篇檄文是这样开头的：

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

他的总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营，就是惨杀民众的大屠场。他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狴的刽子手了。他的罪恶书不胜书。

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发表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前夜。

1928年2月24日，为逃避蒋介石的追杀，郭沫若化名“吴诚”，只身一人亡命日本。

第二次就是1944年10月，时年52岁的郭沫若写下了《甲申三百年祭》，他再次以一支笔，给蒋家王朝唱了挽歌。这一次蒋委员长忍无可忍，1946年2月，蒋介石手下的特务，终于在较场口把郭沫若痛打了一顿。

1936年10月，鲁迅病逝于上海，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写下了这样的挽联：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最早骂郭沫若“文人无行”的就是蒋介石，而这正说明郭沫若是鲁迅之后，最有骨气的中国知识分子。

欢迎郭沫若文章的是延安，毛泽东后来给郭沫若写信这样说：您的文章，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郭沫若仅长毛泽东一岁，而毛泽东却一直尊称之为“郭老”。

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国，只有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是唯一的一块净土，陈嘉庚先生造访延安后，对比国民党统治区，他感慨地说，延安有十没有：“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

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这“十没有”，原本是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的讲演中颇为自豪地讲话里面说的，而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1940年5月到延安，他亲眼看到了延安的情况，不禁发自肺腑地说：我一向以为，能救中国的人还没有出生，现在我才知道，这个人已经出生了，而且已经50多岁了，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

而当时的延安实在是太穷了。在日本和国民党军队的双重封锁之下，延安穷得连毛泽东也是一日两餐，两餐又常是一稀一干，基本没有菜，甚至吃盐也很困难。抗日名将续范亭在延安与毛泽东吃了一顿饭，难过得流下泪来。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大家连饭也吃不饱的延安，却被当时中国和世界上的仁人志士视为“圣地”，这究竟是什么呢？

朱德当时写过这样一首诗：历年征战未下鞍，赢得边区老少安。耕者有田风俗厚，仁人施政法刑宽。实现民主真宪政，只见公仆不见官。

延安没有物质生活的腐败，延安“只见公仆不见官”，而这就是延安作风吗？这就是使延安成为“圣地”的原因

吗？

在毛泽东看来，仅有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这还远远不是“延安作风”的实质。

延安的朴素不仅是物质上的朴素，而是精神上的朴素。延安代表了朴素的文明，朴素的政治，延安代表了中华文明最宝贵的东西。

这才是延安作风的实质。

在毛泽东看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实在是太曲折了，中国近代的遭逢实在是太沉痛了，要避免中国和中国文明陷入了周期性腐败，那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中国历史上，上层与下层完全脱节的问题。第二，是中国社会领导力量在精神和思想作风上的贫乏、无能、懈怠和麻痹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物质生活上的腐败，那只是“看得见的”腐败与堕落，而更加危险的腐败，却是思想方式的腐败、行为作风的腐败、乃至说话方式——文风的腐败。

中华民族若要真正地在灭顶之灾中警醒，那就必须从根本上破除这样的腐败。

“往事越千年”。毛泽东就是这样在陕北的黄土高坡上，总结了天下兴亡的周期律，而他把中国的历史，概括

为朴素战胜腐败的历史，实干战胜虚文的历史，艰苦奋斗战胜贪图享乐的历史。

实际上，在1940年代这历史大转变的关头，忙着以写书、出书来确立自己“道统”的人，不仅是蒋介石，另一个岌岌于此道者便是王明。

1940年5月，王明又一次再版了他写于1930年11月、初版于1931年2月，名为《两条路线》的小册子，而这本书1932年3月再版时，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当年的王明，正是凭着这个小册子，进入了中共最高领导层。

世界上有这样几种为统治确立合法性的方式：一种是血缘的承继的，一种是靠暴力征服的，一种则是靠金钱买卖的——马克思着重分析了后一种确立统治合法性的方式，并将此称为“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统治方式。

但古往今来还有一种最常见的统治方式，那就是通过装扮成某种学说、思想和“真理”的合法继承人，来确立自己的正统和统治地位，而这就是所谓通过垄断“意识形态霸权”以施行统治——毛泽东和安托尼·葛兰西，则重点分析和批判了这种统治方式。

而王明在党内所要确立的，就是这样一种统治。

年青的王明在中共党内本无资历，而他掌握的最大的资本，就是思想理论的资源，王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斯大林的“钦差大臣”，此人记忆力甚好，他用很短的时间就熟练地掌握了俄文，对马恩列斯的一些著作，能够倒背如流。

王明在其著作的三版序言中说：“每个忠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看作异地之非；或把异地之非，一概断定为此地之是。”

所谓“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这无非是说：今天，不能把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统治中共的王明路线，看作是错误的。“或把今日之非，一概看作异地之非；或把异地之非，一概断定为此地之是”——而这就是说：不能把中共的错误，看作是莫斯科瞎指挥的结果，即使莫斯科自己承认瞎指挥，中共自己也绝不能这样承认。

高举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大旗，王明做出的却是诛心之论。

戴震的名言是：今之儒者，“以理杀人”，而王明就是这样的“今之儒者”，王明的肃反，就是“以理杀人”。

对于王明的“厉害”，对于王明的肃反，中共党内是

记忆犹新的。

1937年11月20日，王明从苏联来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恭迎，陕北公学大操场万人欢呼。而毛泽东说，这是“喜从天降”。

但这未必代表了中共高层的一般态度。高岗后来则愤愤不平地这样说：“什么喜从天降，是祸从天降！”

“无事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王明的再次“自天而降”，的确不能不使人忆起1931年1月米夫等人给中共“空降”下来一个党中央。

但当时的高岗，却无论如何是不敢当面笑骂王明的。

而这一次，王明也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同机到达的还有康生、陈云、曾山、孟庆树（王明的夫人）。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康生、陈云立即被增选为书记处书记，与张闻天、毛泽东组成“五大书记”，王明虽然没有被推为“总书记”，但他却在会上表现得不可一世——王明那时的气势，甚至超过了初出茅庐时的六届四中全会。

“12月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成员合影，王明居中而坐，如众星捧月，而毛泽东则低调地站在了后排的最边上。

然而，王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忘记了今天的中共中央，已不是当年上海的那个地下组织，而如今的毛泽东也已不是红一军团的政委了。

“12月会议”决定筹备召开中共七大，整整一年前，即1936年12月7日，毛泽东当选了中革军委主席，所以，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七大筹委会主席。

实际上，连共产国际也看懂了这样的事实：如今再按照苏联的意志来改造、“整肃”中共，硬搞一套，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了，而如果王明坚持这样做，那只能是自取其辱。

“12月会议”召开后半年，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问题，会议通过了支持毛泽东领导的决定。正在苏联养病的王稼祥受命返回中国，传达会议决定。行前，季米特洛夫特别叮嘱他说：

“应该告诉全党，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领导人了。”

9月1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如实传达了上述指示，这次“九月会议”决定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而当时在武汉中共长江局的王明却拒绝回延安，而是要求在武汉或西安开会。

“钦差大臣满天飞”，面对王明的霸道，毛泽东也火了，他质问道：共产党的中央全会，为什么要在国民党的地盘上开会？他就是抬我去，我也不去！

最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任命王明为中央统战部长、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

然而，王明却继续采取攻势，1942年底刘少奇回到延安，王明请他主持公道，提出要让全党一起来评理，而王明的道理简而言之就是：六届四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没有错，错的倒是遵义会议以来的路线。

仿照《联共（布）党史》，王明立志要为中共编一部《春秋》，而他的书所采用的也是“春秋笔法”。

在三版序言中，王明说：“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 and 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

这就是要算历史帐。

而毛泽东的道理也很简单：王明要算历史帐，那就算历史帐。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了灭顶之灾，你王明竟连一句反省都没有，你倒是有了理了？

于是，毛泽东也开始编历史书——即他后来所说的“党

书”，他把六大以来反映党的政治路线的主要文件集中起来，编订成册，而这就是《六大以来》。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后来说：“在编辑过程中，毛主席愈来愈深入地从找出他要提出的问题——两条路线问题”。“毛主席对四中全会时国内领导人的批评，主要是讲为什么拱手把中央的领导权交给王明，王明走了，又把中央的领导权交给了博古。他最不满意的就在这里。”

毛泽东自己则这样说：

到了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6月后编了党书（指《六大以来》，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1941年9月会议，大家才承认10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1941年9月会议是一个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作整风报告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整风也整不成。

1941年9月10日至1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9月会议”。参加会议的28人先后发言，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李维汉作为当事人，批判了六届四中全会上形成的错误路线，鉴于惨痛的教训，他们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在那次会议上，王明陷入了彻底的孤立。

王明不可一世，他率先提议要算历史帐，而这笔帐最终却不可避免地算到了他自己头上。

10月7日，毛泽东偕王稼祥、任弼时找王明私下交谈，以求团结之意，但在第二天书记处会议上，王明却提出：政治局扩大会议偏离了主题，必须立即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的错误问题，以专门检查中央的路线。

中央书记处拒绝了王明的建议，而是坚持继续“算账”，10月22日，王明突然宣布自己有病，不能参加政治局会议了。

与王明不同，洛甫是明智的，洛甫明白：王明要算账，这完全是自取其辱，王明嚷嚷着要算老账，不可避免地要把自己也算进去。于是，这1942年1月26日，张闻天提出要下基层搞调查研究，率“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下乡去了。

1943年3月，张闻天调查归来，那个时候，“历史帐”已经算得差不多了。而王明却向洛甫继续宣传中央路线有错误的观点，他还对张闻天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惩我们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你和我。”

毛泽东听到此言，在会上直言不讳地说：

王明对洛甫说“整风是整你和我”，这话对又不对。

说是对的，首先是要揭破教条宗派，要“整”。王明、博古、洛甫，对这些同志要“将军”，要全党揭露。说是不对的，还要把一切宗派打坍，打破各个山头，包括其他老干部、新干部。

于是，经过这一轮“算账”，不仅王明自取其辱，连洛甫这个党中央的总负责也当不成了。

延安整风确实是从“算账”开始的。但“整风”不是算个人的小账，“整风”是算中国五千年历史和几十年中国革命史的大帐。

1940年以来，毛泽东带领共产党算了两本历史帐，一本是五千年中国历史的帐，一本是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的帐，而逼着毛泽东算账的，一个是蒋介石，另一个就是王明。

那时的毛泽东，在思索着鸦片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

而浮现在他眼前的，却更是大革命失败，杀人如草不闻声，是革命者内部的肃反，是斯大林的瞎指挥，是错误路线给党带来的灭顶之灾，是衣衫褴褛的红军，是红军鲜血染红的湘江，而在他们背后，则是水深火热中的无数的人民。

那时的毛泽东，更在思索着五千年中国历史。

中华民族如果不是在这场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灭亡，那就必须建立起朴素的政治，朴素的文明。

所谓“算账”，也就是要算一算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本钱”究竟是什么。

毛泽东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就是延安精神的两个根本点。

中国共产党自创党以来，就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领导主体的党，很长时期以来，党把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当作了圣旨，从大革命时代的依靠资产阶级，放弃革命的领导权，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种忽左忽右，使中共成为毛泽东所说的“秧歌政权”，更使党经历了极为惨痛的失败，而其根源就在于，党没有思想和理论的自信，党没有自己的思想理论自主性。

像近代中国丧失独立性，这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思想和精神上的。反映在党内，这就集中体现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对于党的统治。

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一个根源，就是迷信外国、迷信洋人，而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现实状况在党内精神生活

上的反映，它集中表现为党内的许多人不了解中国的历史，而把中国的历史说得一团漆黑。

毛泽东说：

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当然，中国历史也绝不像蒋介石所说的那样，是一片光明，而正如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说痛陈的那样：

中共这样一个以知识分子为领导主体的党，还保留着中国士大夫阶级的一切缺点。而在毛泽东看来，士大夫阶级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阶层，所谓理论脱离实际、生活脱离群众，八股文风，这些都是士大夫阶级的痼疾。

中华民族欲求自新，欲求真正之解放，就必须批判地总结自己的历史，批判地总结自己的文明。

批判地总结中国的历史，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是摆在毛泽东和共产党面前的艰巨任务。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反思，与蒋介石这样的“学术票友”完全不同，即绝非局限于明代一隅，更不是局限于儒家一门。而毛泽东对于中华文明的理解，也非一切“大儒”的学术所能涵盖。毛泽东的思索深入到中华文明内部，上下五千年，包纳华夏与四夷。

毛泽东说，我们的历史上有糟粕，但也有精华；有腐败，但也有朴素；有黑暗，但更有光明。历史虚无主义是站不住脚的，真正问题在于能够正确区分，究竟哪是糟粕、腐败和黑暗，哪是精华、朴素与光明。

在我们的历史上，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是中国的脊梁。正如鲁迅那样，在中国的百家学说中，毛泽东尤其推崇艰苦奋斗的墨家与埋头

苦干的法家。而在这个问题上，他与独尊儒术的郭沫若的观点，甚至也不相同。

1973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日，这天晚上，毛泽东与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报告的秀才班子，谈到了如何理解中国历史。毛泽东说，儒家思想，一言以蔽之，不过就是想当官，李白如此、国民党如此、林彪也如此——从根本上说，王明和“王明路线”的实质更是如此。但秦始皇和法家却是干实事的，“尽想当官”与“干点实事”，这就是本质的区别。同时，他还批评郭沫若没有看到历史的实质：

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是实质。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就说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

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毛泽东反感儒家，是他认为儒学是“官学”，孔夫子这个人说白了就是个“官迷”；毛泽东推崇墨法之道，简而言之，是因为他们是办实事的。

与其坐而论道，何如起而行之。

而中国西北，原本就是中国墨法思想兴起的地区。秦的兴起，就源于墨法思想的指导。

墨法两家，成于魏、归于秦，墨翟、孟胜、吴起、卫鞅这些人之所以艰辛辗转，四处碰壁，这主要就是由于当时“魏康楚富，齐淫吴巧”，即发达地区民风奢华，文明积习太深，听不进批评意见，更不愿展开自我批评，特别是墨子所倡导的“艰苦奋斗”（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这一条，在文明发达的地区，非但难行，而且难听（极不悦耳）；而这便是庄周对于墨子命运的感叹：“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墨子虽独任，奈天下何！”

能够接受墨法思想的，最终证明是被文明核心区视为“戎狄”的秦。正因为秦在七国之中开化最迟，尚不存在六国那样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贵族世家集团，因此，墨法“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为则上，无能则下”

的平等政治主张，方才能够在秦地得以实行。正因为贵族、世家的力量还没有形成，正因为“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乃是秦的民风，以至“王亦不爱其家”，故“上同而下不周比”、“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户籍—连坐制度，亦方才能够在秦地顺利推进；而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秦开化最迟，百姓极其不善言辞文饰，不存在一个靠巧言令色、舞文弄墨发达起来的智识阶级，故商鞅那一套以“农战”立国的思想，方唯独在秦地能够大受欢迎。

而与当时的中原相比，秦其实也不过就是个“边区”。

吴起自鲁赴魏，又去魏适楚，而商鞅亦自中原最发达的魏亡命入秦，他们来到“边区”，所献出的强国之策，首先就是对华而不实、只说不练的中原文明弊端的诊断和分析，在文明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方才转而倡导一种埋头苦干、只练不说的新文化品质——于是，开化最迟、民风纯朴的戎狄秦地，便这样成为他们培植新文明的试验田。

这便是秦人艰苦奋斗精神的起源，这更是秦走向富强的动力。

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中，曾这样比较“境外”的秦地，与“境内”的中原文明说：

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孔

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利；多利，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这就是说：由于中原地区文明发达，方才养成了盘根错节的贵族世家势力，方才铸成了导致阶级分化的富豪大贾集团，正因为文明发达，方才重用巧言令色、只说不练的智识阶层，而此三者具备，固可谓文明之成就，但却正是“求荣取辱”、“政怠宦成”的开端，是“人亡政息”——即国家危亡的征兆，是文明走向异化的开始。

作为“戎狄”的秦，之所以能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最终统摄四海，扫荡群雄，这就是秦人的生活朴素、务实使然，秦人正是以朴素的“又战斗来又生产”、以南泥湾开荒般的“农战”精神，最终战胜了中原文明之骄奢淫逸。

秦的改革蓝图，其实就来自中原精英对于自身文明弊端的自我批评，这种自我批评，最终演化成“西戎”之秦对于中原文明所进行的“武器的批判”。

荀子说，“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所谓“一

民”，就是用战斗和生产来统一人民的思想与意志。《荀子·疆国》亦曾赞美秦的朴素民风说：

应侯（范雎）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

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谷川秀，天才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术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不桀，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归其家，无有私事也；不周比，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而两千多年后，陈嘉庚先生所看到的“十没有”的延安，岂不与当年荀子入秦之所见略同吗？

而所谓“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延安，不也就是荀子文中所谓“古之吏”、“古之士大夫”、“古之朝”吗？

1973年9月，毛泽东与埃及副总统莎菲畅谈中国历史。当时他这样说：

我们过去叫CHIN（秦），加一个A，变成CHINA（中国）。秦始皇在中国是有名的，就是第一个皇帝。中国历来分两派，讲秦始皇好的是一派，讲秦始皇坏的是一派。

我是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个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而在毛泽东看来，汉亡的根源，恰就在于它背离了“秦政法”，而复辟了封建制。

汉废秦法，剖海内而立宗子，郡守之下，又实行自治。立宗国便是裂土封疆，而“地方自治”的实质，则是听任豪族兼并土地。故终其两汉，中央“贵族”与地方“豪族”这两大势力纷争不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土地分封制度，就在于“土地私有制”的恶性发展。

故柳宗元《封建论》抨击封建土地所有制说：“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非公之大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也。”

这就是说：封建制是土地私有制的极端，土地私有化乃是天下之大私；相反，秦的土地国有制，则是天下之大公。

汉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也便是土地问题。贵族、豪族圈占土地，造成农民流离失所，于是，谁掌握了失地流民，谁就能够实现霸业、掌握政权，而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便是汉末“非儒家的寒族”曹操。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毛泽东推崇曹操，当然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毛泽东说：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

汉武帝之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独尊儒术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连苏轼自己在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还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曹操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

在毛泽东看来，魏晋南北朝时代，天下分裂，这就是汉代复辟封建制的必然结果，不过，这也为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他独具慧眼地指出：

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这是他的高明处。

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后，战乱频仍，南北对峙，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的组合中稳定了，文

化也交流了、丰富了。

“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天子失政，道在四夷”这两句话，正好可以用在魏晋南北朝时代。

而西晋贵族，可谓将中原文明“只说不练”的积弊发展至登峰造极地步，此即所谓“清谈”。因此，将西晋的灭亡，归之于所谓“五胡乱华”，这其实便是古往今来最大的扯淡：自晋惠帝以来，司马氏王族，同胞兄弟凡二十五人，自相残杀的结果，仅剩下了三人，西晋二世而亡，不闻延祚，这就是因为文明日益发达，精英和统治者的欲望便日益膨胀，为了争夺“私有产权”，最终竟连自己的亲兄弟都要杀绝，这便是典型的“求荣取辱”、文明异化之惨剧；起身于今山西长治武乡县的后赵羯族统治者石勒，只不过是个胡人奴隶，但他却如此鄙视司马氏王朝说：“大丈夫行事，当光明磊落，如日月之皎然。不应如曹操、司马懿父子，欺孤儿寡母而取天下。”

毛泽东谈到这一时期时还说：

桓温是个搞分裂的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带兵北伐，不过是做样子，扩资本，到了长安，不肯进去。苻秦的王猛很厉害，一眼就看到了他意图。

与蒋介石不同，毛泽东欣赏作为夷狄的苻秦，他更

没有鄙视元、清。恰恰相反，正如写出了《元史新编》的魏源一样，毛泽东认为，元和清开创了中华民族的新时代，正是元和清，使中国成为“中华”，而使中华成为横跨欧亚的大帝国。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才是中华的气象。

乱中国者，非夷狄也，因为东汉的乱源，便是贵族和豪族，而构成门阀集团的贵族和豪族，便是一个“官产学一体化”的强大利益集团，而其中的“产”——即大土地庄园，又是其世代把持文化教育和官场资源的基础，因此，救天下苍生于水火、挽华夏文明于既倒的唯一途径，便是实行“土地改革”。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肩负起土地改革大业的皇帝，便是北魏的孝文帝拓跋宏，就是那个迁都洛阳，修建了龙门石窟的鲜卑族皇帝。魏孝文帝拓跋宏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均田法，此法的核心，便是中央直接统治土地，它一方面虽默认富民的土地所有权，但另一方面则按照土地国有的原则，不分贫富，皆课以相同的国税，正是这项法令，成为唐代均田制的依据。

隋立国之初，李谔这样抨击六朝文明说：

魏之三祖，崇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以拘无用以为用也。

毛泽东很欣赏这段话。他认为，“文风”的问题，就是作风的问题，更是统治阶级堕落的表现。因为将两汉和魏晋文明推向高峰的，固然是贵族和豪族，而毁灭了这个文明的，同样是贵族和豪族，他们尔虞我诈、骄奢淫逸，他们“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自己打败了自己，而这就叫做“文明异化”的道理。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这里的意思毋宁是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不是靠文采、靠风骚，靠舞文弄墨得天下的。他们靠的是艰苦奋斗，英勇杀敌，而不是文采和风骚。

1945年7月，傅斯年访问延安，五四时代，毛泽东办《湘江评论》于湖南，而傅斯年则办《新潮》杂志于北京，彼此南北呼应。7月5日凌晨，毛泽东邀其独谈。在谈话

中，傅斯年对曰：“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通宵长谈结束时，傅斯年向毛泽东索要墨宝，毛泽东随即书赠其唐五代诗人章碣诗《焚书坑》一首：

“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毛泽东并附信一封曰：“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

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确：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有贡献的，但是，它的缺点却是以“洋八股”代替了“旧八股”。而刘邦和项羽的好处，就在于他们不知何谓“八股”，身上更没有八股习气。

在毛泽东看来，唐的贡献，不在科举，而在府兵。唐太宗李世民的伟大之处，恰在于他一扫江左风气，而将均田制与府兵制结合起来，使唐代制度的基础，得以重新建立在“农战”——即朴素的农民士兵身上，隋唐两个王朝都脱胎于鲜卑西魏，相对于中原贵族制度而言，夷狄的日常生活无非游牧和战斗，即生产和斗争，以生产和斗争为底色的北国制度，比较起以精致的吹牛拍马为显学的中原

文明来说，显然更为实际化，比较中原等级森严的繁文缛节来说，夷狄的生活显然更为朴素，比较“未窥六甲，先制五言”（即孩子尚未学会数数，便先学会了作诗）的中原教育来说，在游牧骑射中形成的夷狄的人格显然更为自然、健全，汉以来日益贵族化的中国社会，正是因为夷狄的加入，方才获得了伟大复兴。

抗战期间，陈寅恪做《隋唐政治史略论稿》，其中大肆赞美关陇府兵之制，他所佐证的，不正是延安作风对于盛唐气象的继承吗？

中国开化最早，文明悠久，宋代以降，随着出版业的兴盛，读书人成堆。但是，头脑发达伴随着的却是动手能力的下降，知性的发展却伴随着情感与意志的退化，在意志力方面，中原的士大夫反而不如夷狄，而过度文明化，就是文明的异化。

而毛泽东青年时代《致黎锦熙信》中说过：中国士大夫一贯“以读书为上，办事为下”，以为“农、工、商业”，皆为小人之学，系为小人所设，而“大人”所不为也。殊不知小人是世界上的多数，“而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故中国的学问脱离国计民生，士大夫的知识，反而不如他们所鄙视的小人与夷狄。

毛泽东的这种看法，与王安石是一致的，因此，他推崇王安石为“法家”。

宋代建国，始终面临着辽、金、西夏的强大压力，而这就不能不迫使中原的士大夫精英们，对于自身文明的文弱、享乐、滥情痛加反省，在宋人所作的自我批评中，以王安石、叶适为最深刻。王安石曾指出：人皆以为夷狄愚昧迷信，不知中原士大夫文明的迷信，实则比夷狄尤甚，夷狄不过迷信鬼神，但并未脱离骑射，即经济与军事；而中原则迷信文词，正是这种对于文饰、文词的形式主义迷信，使得科举考试成为制造大量废物的荒谬仪式，士大夫是个完全脱离生产与战斗的阶层，而宋人竟以为凭借口诵经文，妙手文章，便可退辽金十万铁骑——这脱离生产和斗争的文化与其说是文明，倒不如说是天大的愚昧。

于是，他创办学校，命学生全部寄宿其中，以观其才德，并于校内建立操场，供学生练习骑射。又制订保甲、保马之法，令农民学习马术武艺，先以自卫，终以服役官府，以期逐步恢复唐的“府兵”、秦的“农战”。但是，宋代的疆域处于中原和江南最为富裕地区，宋更是历史上士大夫文化最发达的朝代，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任职江南东路的见闻，使他认识到“举国奢靡，全

民腐败”的现实，宋代的士大夫文明，不但与生产和经济活动相脱离，也与治国理政完全脱节，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文明，几乎彻底丧失了自我批评和自我改造的能力，王安石之所以感慨宋代最大的失败在教育，叹息“变成法易，变世风难”，这就是因为在“文明发达到了糜烂程度”的地区实行变法和改革，他遇到了当年商鞅在魏时所遭遇的同样问题：改革者不仅需要改造制度，而且还需再造文明。而王安石的命运，自然也就难免要重复墨子式的悲剧：“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虽独任，奈天下何！”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而毛泽东这里的深意，则是史家不可不知的。

中原的士大夫文明之华丽的外表令人向往，但其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和斗争的本质更使人堕落，正是对这种文明/野蛮辩证法的洞悉，正是对“文明异化”的自觉，方才使得辽朝设立了“南面”和“北面”两种制度，它既不要求中原人契丹化，也不鼓励契丹人中原化，而这种措施的用意所在，就是唯恐契丹民族沾染了中原士大夫政治脱离现实的腐败，从而消磨了英勇斗争的志气。

明代的思想家，同样是从铁木真子孙的堕落中，看到了对士大夫文明的迷信，于人心诱惑之甚，他们对于中原文明弊端的自我批评，尤其集中于对崇虚文、鄙实践的士大夫的批评，口诵莲花而不分五谷、不谙耕战的士大夫，绝对不可能打得过不善言辞、但却习惯了披霜浴雪的夷狄。文饰是虚伪的渊藪，实干才是诚实的品格。而华夏文明的悲剧，正可概括为“只说不练”、眼高手低的悲剧，华丽的士大夫文明脱离生产与斗争的悲剧，这便是清末郭嵩焘的感叹：“故夫士者，国之蠹也。”张居正《陈六事疏》，其首在“省议论”，其重在“核名实”。王阳明《传习录》：“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这些痛切反省都表明：崇虚文、鄙实践，与现实生产活动完全脱离的士大夫，完全不足以与战斗和生产相联系的夷狄相对抗。

16世纪以降，西欧之所以能实现迅速崛起并最终超越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西方文明乃是建立在知识与实践、科学与生产活动的密切联系之上的，那个文明的主体——企业家与工人都是从行会师傅中分化而来的，因此，重视生产、科技和实践，便是现代科学文明的特点。与之相对，中国的士大夫文明却鄙视动手、鄙视实践，更

鄙视劳动和劳动者，于是，从这样一种浮华的士大夫文明中，也就不可能产生出观察和实验的偏好，因而，也更不能产生出现代科技文明。

戊戌变法之际，严复在《上皇帝万言书中》曾这样感慨说：

国之富强，民之智勇，臣愚不知忌讳，不敢徒以悦耳之言欺陛下，窃以为无一事及外洋者。而之所以获全至今者，往者以外人不知虚实故耳。故中国今日之大患，在使外人决知我之不能有为，而阴相约，以不战而分吾国。使其约既定，虽有圣者，不能为陛下谋也。

宝爱和平，珍惜生命，享受生活，热衷消费，说学逗唱，皆大欢喜——这是中国几千年士大夫文明之花繁盛的基础；但是，这也就是武将畏死、文臣贪财、见利忘义、醉生梦死、吹牛拍马、敷衍塞责、举国腐败的渊藪，而这便是极其残酷的文明辩证法，是文明异化的残酷逻辑。

这个逻辑，最终化为毛泽东石破天惊的总结：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下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

资产阶级的捧场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而所谓“艰苦奋斗”，无非是说：“文明”绝非表面的文饰，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真正的文明起源于不言不语，伟大的文明，就是埋藏在行动（生产与战斗）中的朴素精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血的教训，是医治文明衰败症的苦药，是撬动“天下兴亡周期率”的杠杆。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才是延安作风的实质。

正是为了重建中国政治，正是为了重建中华文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发动了整风运动。

毛泽东指出，要重建中华文明，要重建中国政治，就必须从三个部分入手。

首先，“必须改造我们的学习”。

中国历来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读书人阶层，中国上层精英的根本问题不是不学习，而是理论脱离实际，生活脱离群众。

知识脱离实际，学术脱离政治，这是中国精英阶层的

痼疾。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学风问题”。

而“学风问题”由来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关于学术脱离政治，王安石曾经这样说：

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未尝在于学，学者亦漠然自以礼乐刑政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当知也。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

王安石的感慨是很深的。因为宋代以来，随着出版业的发达，也形成了空谈泥古的士大夫作风，宋真宗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更把读书当作了一门生意。而士大夫阶级的无能与腐败，就因此而铸成。

而正是为了对抗这种风气，王阳明方才提出了这样的见解：

天下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

毛泽东继续着王安石和王阳明这种批判。他说：什么是知识？难道读了几本书，就可以说是有知识吗？难道读书人就算是知识分子了吗？

毛泽东的话，只有放在中国历史极为沉痛的教训之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

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

我们现在看看一些学生，看看那些同社会实践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他们的状况是怎样呢？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

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学生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

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说来，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

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

所谓“主观主义”，其在学风上的表现，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的读书人、上层精英生活脱离群众。就在于中国的上层与下层是完全脱节的。

因此，要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首先就必须在读书人中反对“主观主义”这种学风。

其次，必须反对宗派主义。

在中国历史上，“宗派主义”的另一个说法，其实就是“朋党”或者“党争”。

所谓“朋党”大盛于北宋。由于王安石的改革诉诸《周礼》，于是，这就使得熙宁以降，围绕着具体改革方略的

争论，转变为围绕着儒家经典真意的争论。

欧阳修做《朋党论》，他便以为“君子”们争的是“大义”，而“小人”争的是利禄，故“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

然而，正是“党争”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与内讧，“党争”更是导致北宋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故雍正在《御制朋党论》中说，“朋党”就是结党营私，其名曰追求“大义”，实则是追求自己的私利。对于官员而言，这就是把小集团的利益，置于国法之上，置于道义之上，党争是大私，是官场痼疾，党争一日不去，天下则难见公道与公平。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名曰一党，而实质上没有党派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把人民的利益置于党派的利益之上：

宗派主义的残余，在党内关系上是应该消灭的，在党外关系上也是应该消灭的。其理由就是：单是团结全党同志还不能战胜敌人，必须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战胜敌人。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上，二十年来做了艰苦的伟大的工作；抗战以来，这个工作的成绩更加伟大。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同志对待人民群众都有了正确的作风，

都没有了宗派主义的倾向。不是的。在一部分同志中，确实还有宗派主义的倾向，有些人并且很严重。

我们的许多同志，喜欢对党外人员妄自尊大，看人家不起，藐视人家，而不愿尊重人家，不愿了解人家的长处。这就是宗派主义的倾向。这些同志，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之后，不是更谦虚，而是更骄傲了，总是说人家不行，而不知自己实在是一知半解。

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假定一百个人中有一个共产党员，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中就有四百五十万共产党员。即使达到这样大的数目，共产党员也还是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党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和非党人员合作呢？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一部分党员却不懂得这个道理，看不起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人，甚至排斥他们。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给了我们这样的根据吗？没有。相反地，他们总是谆谆告诫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了我们这个根据吗？没有。中央的一切决议案中，没有一个决议说是我们可以脱离群众使自己孤

立起来。相反地，中央总是叫我们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所以，一切脱离群众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的根据，只是我们一部分同志自己造出来的宗派主义思想在那里作怪。因为这种宗派主义在一部分同志中还很严重，还在障碍党的路线的实行，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个问题在党内进行广大的教育。首先要使我们的干部真正懂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使他们懂得共产党员如果不同党外干部、党外人员互相联合，敌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达到。

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都和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当同时并进。

而第三个要反对的，就是“党八股”。所谓“八股”就是教条主义在文风上的表现。

毛泽东更认为，中国有两个八股，一个是旧八股，一个是新八股或者“洋八股”，而“新八股”、新教条是五四的产物，它向右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思想，而向左则发展为党内的教条主义，即机械地、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打倒封建主义、打倒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也要打倒党内的教条主义。而

这在文风上，就必须同时打倒旧八股、洋八股和党八股。

毛泽东深刻剖析了现代中国教条主义产生的根源。毛泽东不仅反思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他也反思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现代史：

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

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五四运动还有和这相联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功绩；这个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斗争，也是它的大功绩之一。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

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这种新八股、新教条，在我

们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们今天要进行改造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这样看来，“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这就是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继承五四，如何评价五四呢？

毛泽东说：

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

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这样看来，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東西。我们懂得这一点是有好处的。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

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至于我们党内一部分（当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

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对于老八股和老教条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影响，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条在全国许多人中间的影响，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也就达不到加以摧毁廓清的目的。

毛泽东最后这样总结说：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

1942年，面对着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面对着中华民族的空前危亡，毛泽东向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指出了再造文明，重整乾坤的道路，而他的出发点，就是造就一支中华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先锋队，而造就这样一支先锋队，那就必须从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

党八股入手。

只有懂得了中国历史，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的整风。

只有懂得了什么是朴素的政治、朴素的文明，我们才能真正读懂毛泽东那首最著名的词：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连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

毛泽东第一次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那一年，他50岁。

7月8日，王稼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第一次正式、公开提出“毛泽东思想”，文章

指出：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而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国共产党仅仅用了6年的时间，就夺取了全中国。

367

第十五章

人民是我们的观世音

1942年初，造访延安的作家萧军问毛泽东说：共产党究竟有没有自己的文艺政策呢？

毛泽东回答说：现在忙着打仗，种小米子，文艺政策重要，可是实在是顾不上呢。

萧军说：应当有个文艺政策，否则争论不休，没有标准，难明是非。

毛泽东赞同说：你这个建议很好！

这次谈话后，毛泽东便先后找了艾青等人，请他们帮助收集、了解延安文艺界的情况，而艾青也对毛泽东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

毛泽东似乎有些吃惊：我讲，会有人听吗？

艾青肯定地说：至少我是爱听的。

而直到这年的4月底，萧军看毛泽东那里还是没有动静，就再给毛泽东去了一封信，说他已经等不及了，要准备离开延安到三边去了。

4月27日晚，毛泽东致信萧军：准备本周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以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月报1-14期收到，谢谢你！

信很短，但极为周到。而当时的萧军以傲慢著称，他曾经放言说：鲁迅是我父亲，毛泽东只是我大哥。萧军的话说的固然狂放，但这封信则充分说明，毛泽东对待作家的态度是亲切而尊重的。

信很短，但极为周到。而当时的萧军以傲慢著称，他曾经放言说：鲁迅是我大哥，毛泽东是我二哥。萧军的话说的固然狂放，但这封信则充分说明，毛泽东对待作家的态度是亲切而尊重的。

同一天，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何凯丰向一百多名作家发出请柬：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这封请柬同样写得简短、客气而周到。体现了整风之后，共产党人文风的巨变。

1942年五月二日下午一时，毛泽东步入延安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会议室，他比规定的开会时间早到了半个小

时。毛泽东先是与到会的各位作家逐一握手寒暄，然后落座，当时的人们注意到：毛泽东穿的棉袄破了，一抬手，胳膊肘上就露出了棉花。

开会前，毛泽东先给大家吃了这样的“定心丸”，他说：敌人一时不会打过来，娃娃也不必送给老乡，一干一稀，开会期间大家有饭吃，所以，可以畅所欲言，安心讨论文艺问题。

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这样召开的，而在炮火连天的战争期间召开文艺座谈会，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

毛泽东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全部三次会议讨论，期间，他偶尔幽默地插话，但更多的时间是听会、思考，并埋头记录。

5月23日晚，是最后一次会议，应作家们的要求，毛泽东为会议做总结讲话。

那天晚上，晚霞还笼罩着延安的天际，而杨家岭小广场上的一盏汽灯却早早地点亮了，作家们围绕在这盏汽灯下，他们看到毛泽东从杨家岭住处的山坡上走下来，因为坡陡路滑，毛泽东怀里还夹着讲稿，所以走得小心翼翼。而版画家罗工柳当时就坐在讲桌前，细心的他留意到，直到开

始讲话前，毛泽东还在自言自语地说：这个总结可是不好做呢！

谦虚低调的毛泽东，就是在那一次讲出了一篇经典。

毛泽东一开始讲话，就立即抓住了作家们的心，全场鸦雀无声，偶尔听众中会爆发出会心的笑声。毛泽东一口气讲三个小时，结束时全场起立，长时间的鼓掌，人们久久不愿散去，毛泽东自己说：真没有想到，大家这样鼓掌，我都不好意思了。

诗人何其芳回到鲁艺，兴奋得一宿都没有睡着，与大家讨论到天亮。

毛泽东对讲稿进行了精心的整理，一年后，他方才把改好的稿子送给了《解放日报》，报纸排版后，毛泽东在清样上删去了562个字，同时又加上了562个字，一字不多，一字不少。

这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讲话共分五个部分。

这篇讲话最为独特的地方是：全文五个部分，统统都是从“我们”开头的，而其中的三个部分的开头的第一句话，分别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

系问题”，以及“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

处处以“我们”开头，这表明，毛泽东这是在向自己人交心，他把延安的作家们，看作是自己人。

而既然有“我们”，就必然有“他们”，“我们”与“他们”是对立的，正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能够成立。

于是，在讲述“我们的文艺”之前，毛泽东首先说明了什么是“他们的文艺”。

正像毛选中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从“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开头一样，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则是从什么是“他们的文艺”，什么是“我们的文艺”，“我们的文艺”与“他们的文艺”的不同说起的。

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能够抓住作家们的心，首先就在这一点上。

那么，什么是“他们的文艺”呢？所谓“他们的文艺”，就是封建主义的文艺、资产阶级的文艺和汉奸的文艺。

毛泽东说：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

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毛泽东在发表讲话前，曾经认真参考了列宁写于1905年11月13日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毛泽东的讲话中，也多次引用了列宁这篇文章。毛泽东的讲话与列宁的文章，遵循了同样的叙述逻辑，这个逻辑就是：在“他们的文艺”之外，努力创造“我们自己的文艺”。

列宁所说的“他们的文艺”有两种：一种是为沙皇的统治服务的文艺，一种是为资产阶级赚钱服务的文艺。因此列宁说，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新的文艺，这种文艺是对“被亚洲式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欧洲的资产阶级所玷污了的写作事业的改造”。

列宁提倡的是一种新的现代文艺，因为它同时要超越

“落后的亚洲”写作和“先进的欧洲写作”，同时要超越“警察的监督”和“买卖关系”的束缚。

于是，列宁这样说：

我们决不是宣传某种划一的体制或者宣传用几个决定来完成任务。不，在这个领域里是最来不得公式主义的。问题在于使我们全党，使俄国整个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都认识到这个新任务，明确地提出这个新任务，到处着手完成这个新任务。摆脱了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以后，我们不愿意而且也不会去当写作上的资产阶级买卖关系的俘虏。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们一定会创办起来，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

因此，列宁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其在以下两个方面是自由的，即既摆脱了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也不是资产阶级买卖关系的俘虏，既摆脱了警察的压迫，也摆脱了资本的束缚，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

毛泽东同样如此。他说，大家跑到延安来，不仅是因為延安的小米比较的好吃，大家跑到延安来，是因为长期

受到国民党书报检查制度、国民党监禁与屠杀的压迫，同时，大家跑到延安来，更是因为艺术家们在上海的亭子间里，受到出版资本家的剥削和压榨，总之，大家跑到延安来，就是为了寻找自由、寻找光明，寻找自由的文艺和自由的创作。

那么，艺术家们所理想中的自由和自由写作究竟是什么呢？相当一部分作家认为，这就是表现自我、表现内心、表现普遍的人性。

今天不也是同样如此吗？

但毛泽东认为，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而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与大资产阶级的观点并不遥远，这种小资产阶级观点，是在大资产阶级压迫下所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幻觉终究是不能持续很久的。

1944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写下了《启蒙辩证法》这部杰出的理论著作，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样，《启蒙辩证法》也是在战争中产生的，这两篇文献论述的主题是相似的。

《启蒙辩证法》揭示出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变，这就是文化的资本化——即文化生产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有实力的广播公司离不开电力工业，电影工业也离不开银行，这就是整个领域的特点，对其各个分支机构来说，它们在经济上也都互相交织着。所有行业都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人们一旦把注意力集中起来，就会忽略不同企业和技术分支部门之间的界限。

由于文化的资本化，由于文化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部分，所以，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谓个人的文艺，所谓文艺表现作家的个性，这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所谓“表现内心”，正是启蒙的产物，因为它来自康德所说的“内心的道德法则”，而《启蒙辩证法》这样指出：

康德认为，心灵中有一种秘密机制，然而今天，这种秘密机制已经被揭穿了。如果说这种秘密机制所针对的是所有表象，那么哲学表象却是由那些可以用来支持经验数据的机制，或者说是文化工业计划好的了。

简而言之，所谓内心的秘密法则，如今一点也不神秘了，它不过就是计算和推理能力，而在文化生产中，它不过就是对成本得失的精密计算而已。

而所谓“人性”，不过就是通过概率计算而得出的平均数而已：

在概率计算中，意识形态遮蔽了自身。尽管表面上看，快乐工业总是在不遗余力地追去着天赋，然而在快乐工业面前，所有人都没有那么幸运，除非有人赢得了彩票，有的人凭借高官厚禄，能够做到这些。实际上，只有一个女孩子才能赢得幸运彩票，只有一个男孩子才能获得赏金，如果算起来，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机会，然而每个人的胜率却都是非常小的，不管对男孩子来说，还是对女孩子来说，他（或她）最好都要对自己忽略不计，准备去分享他人的胜利，也许每个人之间没有什么不同，但最终还是不一样的。

可见，在资产阶级文化生产中，所谓的普遍人性，不过是文化制造商算出来的平均数，而这种虚假的人性，掩盖的恰恰是真实的人性，它制造了人人平等的概率假象，但掩盖的是现实社会里人欺压人的真实。

毛泽东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就是还沉浸在虚假的内心、自我、普遍人性的梦幻里的人们，他们不知道所谓内心、自我和普遍人性，已经沦为了资产阶级精心设计的骗钱的工具与产业。

正因为小资产阶级们没有看穿这种骗局，所以，他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人性。

于是，毛泽东说：

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当然没有读过《启蒙辩证法》，但是，他与霍克海默及阿多诺一样，认为广大艺术家们之所以还存在着“小资产阶级思想”，就是他们还沉浸在“启蒙”的大梦里没有醒来。

故毛泽东这样说：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

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实际上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危险，那就是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其结果是得到了资本主义，但是，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的道路是根本上走不通的，《启蒙辩证法》这样的著作已经表明，资产阶级的文化生产对于作家而言，乃是一种新形式的压迫与剥削，对于人类的文化则是一种新形式的摧残，中国的文艺，它的未来绝不能走那样一条路。

毛泽东是高瞻远瞩的，他指出，如果沿着启蒙的文学那条路照走下去，中国最可能建立的，便是《启蒙辩证法》中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文学。而列宁告诫俄国人说：“摆脱了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以后，我们不愿意而且也不会去当写作上的资产阶级买卖关系的俘虏。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们一定会创办起来，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而毛泽东则指出，摆脱了统治阶级的文学之后，我们也绝不能走向市场的文学、拜金的文艺、走向资产阶级的文

艺——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作家们讲清楚。

毛泽东指出，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汉奸的文艺，便是“他们的文艺”，是与“我们的文艺”对立着的；而“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则可能把我们带到歧途，而“我们的文艺”，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文艺，是不懈地反对上述潮流的新文艺。

郭沫若当年曾经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经有权”，所谓经，就是指毛泽东的讲话预言了中国文艺发展的命运。

要建立我们的新文艺，首先必须处理好党与艺术的关系。

列宁说，党与自由的文艺之间的关系，就是“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之间的关系。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但是结社也是自由的，你有言论自由，但党作为“自由结社”，为了维护“结社自由”，可以与散布反党观点的人分手：

每个人都有自由写他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不受任何限制。但是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内），同样也有自由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言论和出版自由应该充分的自由。但是结社也应该有充分的自由。为了言论自由，我应该给你完全的权力让你随心所

欲地叫喊、扯谎和写作。但是，为了结社自由，你必须给我权力同那些说这说那的人结成联盟或者分手。

列宁的观点斩钉截铁，那就是：党员作家不能反党，如果反党，那就请你从党的组织里出去，这样，你就可以享受你的自由了。

而与列宁比起来，毛泽东则要苦口婆心的多了。

毛泽东说，大家到延安来拥护共产党，追随共产党，这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这是因为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自由与解放，因此，作家们服从的不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也是人民群众的小学生，只有人民才是我们的观世音。

于是，只要摆正了自己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那么，党与作家的关系，党与艺术的关系就很好解决了。

因此，延安当时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党与艺术，党与作家的关系问题，我们开座谈会，所要真正解决的问题，其实是我们这些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为人民服务、以及怎样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作家里面存在，而且，在党员作家中，在党里面，是严重地存在着的，我们开座谈会，其实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为什么是难以解决的呢？因为精神的根本问题，尤其是艺术的根本问题，不仅在知识，在不仅认识，

而更在情感。

因为在知识上，在口头上，大家都主张为人民服务，但是，在情感上却并不然，对于服务人民这件事，大家并不是在思想上转不过来，而是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这是因为大家在感情上“不爱人民”——毛泽东说：“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正因为感情上没有转过来，所以，大家写的东西就不生动、不感人、不动人，既然连自己都感动不了，那就不可能感动老百姓。

精神上的转变不仅是理论上的转变、知识上的转变，而更是情感上的转变。毛泽东说，由于情感没有转变，所以大家的头脑里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

毛泽东青年时代即认为，人的精神生活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情感与意志，一部分为知识与理性。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说：

精神生活，亦有两方面，意志及知识是也。意志之动，为冲动、为感情、知识之动，为感觉、为知觉、为思维。

而毛泽东在旁批注说：“此以感情属于意志”。

那么，为什么在思想上整风之外，还要开一次文艺座谈会呢？毛泽东说，这是因为文艺从根本上说就是情感，开文艺座谈会，就是为了解决感情的问题。只有在思想上

通了，而感情上也通了，那么精神和灵魂才会焕然一新。

毛泽东说：

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

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

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

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

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

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这段话，是整个讲话的主旨，是讲话的核心。

延安，旧称肤施，意思是“肤肉恩施”。传说毗卢遮那佛在此地看到老鹰追逐小鸽，遂割肉饲鹰，救出鸽子。这就是割肉贸鸽的故事。如今清凉山上依然有胜迹可寻。

是陕北养育了走投无路的红军，是陕北人民，养育了山穷水尽的共产党人。

什么是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呢？

毛泽东说：人民是我们的观世音，我们共产党人，没有人民群众该怎么办啊？我们要像念佛一样，时时刻刻念着我们的人民群众啊！

当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枣园的百姓蜂拥而至，他们喊着：毛主席不能走，毛主席不能离开延安。

当毛泽东从重庆归来时，延安万人空巷，父老乡亲在机场翘首以盼，他们奔走相告：菩萨保佑，咱们的毛主席好好地回来哩！

当共产党撤离陕北时，王家坪的房东一遍遍地问毛泽东：主席，咱们延安的小米好吃不好吃，咱们延河的水可甜？

在转战陕北途中，毛泽东到一个老乡家讨水喝，他惊讶地发现，灶台上挂着竟然是他的画像。毛主席问女主人说：大嫂啊，你家怎么不供灶王爷啊？

大嫂说：祖祖辈辈供灶王爷，还是被人家欺负，毛主席来了，咱们穷人才不受欺负了，咱们穷人也成了人了，咱们不挂灶王爷，要供就供咱们毛主席！

同志，你们从延安来吧？借问咱的毛主席，他可好？

当时那位大嫂，并没有认出进来讨水的人，就是毛泽东本人。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咱们穷人也成了人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不久，延安鲁艺的师生排出了大歌剧《白毛女》。

1945年6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当天晚上，《白毛女》在此首演。

泪水合着掌声，叹息伴着喝彩。

当台上的大春牵着喜儿走出漫长阴暗的山洞，东方的太阳冉冉升起来了。

悠远的合唱仿佛从历史深处响起，全场震动、全场欢呼：

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

太阳，太阳！光芒万丈，万丈光芒。

上下几千年，受苦又受难，如今盼到出了太阳！

太阳就是毛泽东！太阳就是共产党！

而毛泽东却说，不，太阳是人民群众。

毛泽东这样教诲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追求人类进步与解放的作家们说：

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做了这样闭幕词，他说：

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

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曾经这样概括中国数千年治理之失败：

人民与国家之关系，不过讼狱、纳赋二者而已，此外无有也。故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惟无关系也，故曰缺乏国家思想、政治

思想。

国家视百姓如草民、草芥，而百姓视国家如无物、如寇仇。这就是中国社会一盘散沙之根源。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从三皇五帝到如今，唯有毛泽东这位主席方才这样告诉黎民百姓：你们也是人，是与统治者完全平等的人，你们不是草芥。于是，老百姓要地，共产党就给他地，老百姓要公道，共产党就给他公道，老百姓要打扁担、要骂娘，甚至要“雷劈了毛泽东”，共产党就请他们打扁担，请他们结结实实地骂娘，直到老百姓认为扁担打得太重了，娘骂得太过分了——如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那个候忠全老头子，感叹说“我这不是在做梦吧！”而毛泽东又告诉他说，你不仅是人，你就是新中国的主人——平头百姓也许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但他们知道，跟着毛主席走，这就对了。这是最朴素的真理。

当家徒四壁的井冈山、延安、太行人民，以仅有的五颗鸡蛋、一筐红枣、半条驴腿支援共产党的时候，当“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这人民的呼声响彻大河上下的时候，困扰中国数千年的一盘散沙的死循环，终为之焕然顿解，“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终因之而逆转。

当一个农民士兵高举炸药包呐喊高呼“为了新中国，前进”的时候，当一个不到15岁的农家女面对铡刀慷慨陈词“怕死不当共产党”时，毛泽东率领的共产党人的奋斗感动了上帝。

第十六章

赶考

393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说：

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而中国历史上最为剧烈的沧桑巨变，就发生在1947年3月-1949年3月之间。

在这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旧中国的统治结构，如坍塌般地轰然倒下，而在旧世界的废墟中，新中国如光芒万丈的太阳，喷薄而出，跃出了东方。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无论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没有想到这巨变来得如此迅疾，如迅雷不及掩耳。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

当时，他若有所思地对卫士闫长林说：又是3月啦，

好像一到3月，我们就要有行动呢！

闫长林则欢天喜地地说：是啊！主席，前年三月，我们离开了延安，去年三月，我们离开了陕北，今年三月，我们要去北京啦！真没想到，胜利来的这么快啊！

毛泽东幽默地说：连你都没想到，那蒋介石就更没想到喽！

的确，蒋介石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失败，他更没有想到失败到来的如此迅疾而彻底。于是，他的后半生在咀嚼着失败的苦果的同时，没有一天放弃复辟、翻盘和“反攻大陆”的梦想。

共产党人想到了胜利，他们渴望胜利。

在1945年6月11日的中共七大闭幕词中，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口号：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但是，无论毛泽东还是共产党人，的确都没有想到胜利会来得这样快。

1945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演讲中这样感慨万千地说：

同志们，我们24年没有胜利，这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太大了，这也算是一个缺点，如果我们的国家小一点，假如

只有一百万人我们就算胜利了，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的名字叫做中国人，落在这个地方那也没有办法，国家太大就出了一个长期性，这个国家太大了，敌人太多了，没有胜利，三次革命都没有胜利，北伐战争没有胜利，国内战争没有胜利，抗日战争还没有胜利，总而言之还没有胜利。开党校干什么？办八路军、新四军，一百万党员，就是要胜利。

现在到了这样的時候，有可能胜利。中国的客观条件，国际形势，国内形势，有胜利的可能。就是不要缺乏主观条件，什么叫主观条件？就是我们要不要胜利，我们的思想有准备没有，要不要胜利，问我们刚刚出生只有这样高的三岁的小孩，他也要胜利。就是没有本钱，就是我们没有思想上的准备。

毛泽东和共产党固然渴望胜利，他们固然看到了胜利的可能性，但是，那毕竟只是可能性，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革命者的“本钱”还是不够的，而革命者对于胜利，在主观上也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1947年7月21-23日，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于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小河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从1946

年7月算起，准备用5年时间打败蒋介石，但是，毛泽东又说，这个计划不对外宣布，我们还是要准备长期作战，准备五年十年甚至十五年，我们不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我们，不能实现就说再过几个月。

当会后合影时，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是两个天真的儿童，其中一个，便是当年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伍云甫的幼子伍绍祖，后来人们问伍绍祖说，你当时怎么会站在毛泽东身边，怎么还就乐成了那样？

而伍绍祖则不假思索地说：因为马上就要胜利了吗！

正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当时，“我们刚刚出生只有这样高的三岁的小孩，他也要胜利”。

1948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的中直机关食堂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这次会议，是抗战胜利以来到会中央委员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也是自1947年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召开的第一政治局会议，而随后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也正是在这个烟熏火燎的食堂里召开的。

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方才第一次对外公开宣布：要用五年的时间打败蒋介石、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但是，毛泽东当时又再次强调说，这只是一种可能性。

毛泽东是极其慎重的。

事实上，即使从1946年7月算起，毛泽东的这个预计，他说的这种“可能性”，与后来的事实相比，也显得大为保守了。

实际上，当蒋介石在1947年3月对延安发起大规模进攻的时候，毛泽东是做了最坏的打算的。他把中共中央一分为三，由刘少奇、朱德领导中央工委，向太行转移，由叶剑英领导中央后委，向山西临县转移，而他和周恩来、任弼时则组成中央前委，留在陕北与胡宗南的大军周旋。

毛泽东是于3月18日傍晚离开延安的。他乘坐美军留下的一辆吉普车，经过数天的行程到达绥德县的田庄。之后弃车步行，与中央前委折而向西，迷惑了胡宗南的部队。胡宗南以为他们会一直向东行进，渡过黄河，到达山西的安全地区。然而，毛泽东却转而向西，迎着胡宗南追击的部队走去，最危险的时候，毛泽东与胡宗南的部队仅隔一道山沟。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空中监视，中央前委只在夜间行进，直到抵达安塞县的王家湾。从4月12日至6月7日，他们一直停留在这里。当国民党利用无线电追踪技术追踪到王家湾之后，中央前委又转移到了附近的小河村，并在这里

召开了著名的小河会议。

所谓最坏的打算就是：即使中央被打掉一个，还有两个，留下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就是这样再次做了前委书记，他化名为李得胜，而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使用化名。

但这个化名只用了一个多月，1947年5月，当毛泽东指挥蟠龙战役时，他便抄起电话来说：我是毛泽东！

1947年5月14日，新华社播发消息，公开宣布：毛泽东与中共中央还在陕北。

蒋介石闻讯大喜。

他下令说：要全力以赴消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能活捉最好。只要消灭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则共产党必然群龙无首，陷入混乱，重回一盘散沙，共产党的崩溃指日可待，他还这样告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最晚今年的10月份，就可以消灭共产党了。

毛泽东料到，在这个世界上，最一心一意地惦记着他的人，其实就是蒋介石。而为了抓到或者消灭他本人，蒋介石会把什么都置之于九霄云外的。

知蒋者，毛也。

蒋介石动员了26万精锐之师进攻延安，而共产党在陕

北的军队只有2万6千人，双方兵员比例为10:1，胡宗南则动用了4个半机械化旅追踪毛泽东，而毛泽东率领的所谓“中央纵队”却只有4个连。

蒋介石断言：只要毛泽东留在陕北，他就插翅难飞。

那时的蒋介石，朝思暮想的就是一朝陕北传来捷报：生擒或者打死了毛泽东。

蒋介石的心思全在陕北的毛泽东身上，他确实把什么都忘了。

当蒋介石全力以赴注视着中国的西部的时候，东部战场却率先传来了令他出乎意料的消息：1947年7月，蒋介石的爱将胡宗南占领延安的两个月之后，他的另外一个爱将张灵甫，却被陈毅和粟裕的华东野战军击毙，而国民党最精锐的整编74师，则在山东临沂的孟良崮全军覆没。

那时的张灵甫，就已经在用一套轻便的铝合金桌椅办公，而74师装备的现代化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孟良崮战役结束之后，这套精致的铝合金家具，被粟裕作为礼物送给了朱德，而它至今还摆放在西柏坡朱德故居里。

早餐必吃牛奶咖啡、行军时用铝合金家具办公的张灵甫，竟然被吃着山东煎饼卷大葱的粟裕消灭了，这怎么可能呢？陈毅和粟裕的军队不过是从新四军整编而来，在皖南事变中，

那支军队不是不堪一击吗？他们怎么可能在一瞬之间便消灭了张灵甫全部美式装备的机械化部队呢？

在当时的蒋介石看来，粟裕不过是方志敏手下的一个幸存者，他不过就是个年青的游击队员而已。

蒋介石藐视陈毅，更藐视粟裕，于是，他不思悔改，而是更加全心全意地盯着那带着四个连在陕北“散步”的毛泽东。

而也就是这一年的8月，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部队南下进入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中原大门洞开——而蒋介石对这件天大的事，依然还是没有真正上心，他的心思还在陕北，依旧还在毛泽东那里。

孟良崮战役爆发同时，毛泽东便指示林彪向南满发起攻击，并命令陈谢、刘邓、陈粟三大野战军会师中原。

大智大勇的毛泽东，舍下自己的一条命，为共产党的军事行动争取了时间，而蒋介石却只顾盯着毛泽东，竟然却忘记了全中国。

对毛泽东的刻骨仇恨冲昏了蒋委员长的头脑。固执己见，害了心胸狭窄的蒋介石。

就这样，毛泽东用他自己率领的四个连，吸引了蒋介石全部的战略规划。

双方开战一个月之后，毛泽东便在靖边县王家湾为新华社撰写社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人民的包围中》，他预言说：“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

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1947年3月——8月这短短5个月里，全中国的战局发生了倾斜式的变化。

而当蒋介石意识到这种变化时，他觉悟得已经太晚了。

蒋介石死死地盯着毛泽东，而这个时候的毛泽东最惦记的人，却是刘少奇。

1947年6月，拖着胡宗南在陕北转圈的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朱德，指示中央工委必须在六个月里全力做好如下三个工作：一，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

在毛泽东看来，这三件事比天还大。而他留给中央工委的时间并不多——只有六个月。

1947年7月，刘少奇率领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办公。

7月17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召开，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刚刚结束了在山西临县土改的毛岸英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是全国土地会议上最年青的代表。

这一年的10月8日，毛泽东给毛岸英写了一封信，毛

岸英经常问父亲说：“我怎样做你才能满意呢”？而在这封信里，毛泽东这位严父少有针对性地夸奖儿子“有进步”，并且这样说：“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信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

就在十几天前，毛泽东留下了一张著名的照片：他骑在马上，衣扣敞开，露出里面的毛衣，帽子后倾，露出宽阔的额头，跟在毛泽东马后的，是警卫排长闫长林，前面牵马的是王振海，后面马上的人则是江青。

为了确认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与地点，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周锡瑞分别于2013年和2014年两次重走毛泽东转战陕北的道路，他最终确认，这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9月23日，毛泽东由张家崖窑到神泉堡的路上，具体地点叫马背梁崮。

那张照片是在白天拍摄的——这说明：那时的毛泽东摆脱了胡宗南的追击，他已经处于相对安全的境遇，而那个相对安全的所在，就叫神泉堡。

10月10日，在神泉堡，毛泽东发布了两个极为重要的文件。

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

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布，这个宣言第一次提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称，也第一次以宣言的形式发出号令：“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同日，《中国土地法大纲》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陕北神泉堡向全国公布。

土地改革，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

真正把中国基层农村组织起来的，就是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建立起坚如磐石的依靠力量，同时，它也标志着中国社会的重建，从此有了真正的根基，而这个根基，就是前所未有地组织起来的农村和农民，

正是由于丧失了这个基础，蒋介石政权便如水中浮萍一般，再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也正是由于建立了这个基础，共产党的胜利才有了真正的保障。

随着土改的完成，中国基层几千年来一盘散沙的局面，就此结束了。

1950年，毛泽东回顾土改时这样说：

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

共产党靠一亿六千万农民打胜了解放战争，而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是中国最贫穷的，但也是中国最富有的。

在河北平山，流传着这样一首支前歌：

最后一碗饭，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上战场。

送亲骨肉上战场，就是为了“保家卫田”，如果不去打仗，那么蒋介石来了，农民就连牛马也做不成了。

带头唱响这首歌的人是邓颖超。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邓颖超，时任中共平山县委副书记，主持平山土改工作。每次到老乡家访贫问苦，都是她走在前面，因为她是个亲切和善的女同志。

邓颖超这位中央候补委员，就是这样住在老百姓家的炕头上，帮他们推碾种谷，和他们共话春华秋实。

中国数千年来“官不下乡”的传统，就此打破了。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平山县是冀鲁豫解放区的中心，1937年，栗再温等在此开辟抗日根据地，令日寇闻风丧胆的“平山团”，全由平山子弟兵构成。

1947年11月，晋察冀野战军攻克华北重镇石家庄，这标志着中央工委完成了毛泽东布置的又一项任务：“将晋

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

“平山团”担任了攻打石家庄的先锋队。这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部队，解放后随王震进入新疆，现驻扎在阿克苏地区。

石家庄解放，具有三个重要意义：一，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体；二，为城市攻坚战提供了经验；三，使石家庄成为中共管理城市的实验田。

就这样，到1947年底，中央工委在刘少奇的领导下，胜利完成了毛泽东布置的三项任务中的两项：一，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

当时的刘少奇得了严重的胃病，人瘦的不成样子，而他却总是通宵工作。

而中共全党上下、全军上下，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拼命的。毛泽东后来这样决绝地说：我们靠的就是坚忍。陕北我们只剩下一个县，蒋介石说我们只能吃树叶。吃树叶就吃树叶，我们就是吃树叶，也要打倒旧社会。

1948年3月22日，毛泽东率领中央前委到达佳县——佳县，就是《东方红》产生的地方。

《东方红》在佳县诞生，如今，毛泽东就要从这里离开陕北，离开《东方红》的故乡了。

那时，毛泽东也病倒了。《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是他病中口述，江青记录，再由毛泽东改定的。这是毛泽东唯一一篇没有自己亲手动笔完成的文章。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从此告别了他生活了十三年的热土陕北。

回首陕北13年，毛泽东面对滚滚长河，感慨万千，他当时说：陕北人民真金子！

蒋介石终于没有抓住毛泽东，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却丢掉了华北和东北的绝大部分。

是因为胡宗南太笨吗？

今天，甚至还有人故作聪明，说什么当时的胡宗南不卖力、甚至对蒋“有二心”。

绝不是的。

中央办公厅政策研究室主任师哲一路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他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毛泽东一行离开天赐湾不久，胡宗南的军队抓住了一个老汉和他的小孙女，逼问毛泽东的去向。老汉一言不发，国民党就把老人绑在树上，用马鞭猛抽，小女孩吓得大哭，但关于毛泽东的去向，老人和孩子最终也没有吐露一个字。

这就是陕北人民，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真金子。

1947年3月25日，撤离延安数天后，毛泽东在子长县王家坪听取任弼时讲述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

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刘胡兰，为保守党的机密牺牲在敌人的铡刀下。

毛泽东为刘胡兰而动容，他慨然为这个15岁的女共产党员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人民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人民就是共产党的活菩萨。

3月26日，毛泽东跨过晋陕黄河，到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山西兴县蔡家崖，在那里，他挥毫为即将创办的《光明日报》题词：“光明在前”。

光明在前，新中国的曙光，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要求立即纠正土改中的左倾错误。

毛泽东指出：土改中的左倾错误，其表现有三个方面：第一，“把许多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错误地划到了地主富农圈子里去，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第二，侵犯了工商业。三，不经审判，不经法律手续，就乱抓人，有的地方出现了乱打乱杀。

毛泽东说，土改必须讲政策，革命更必须讲原则。所谓“群众想怎么来就怎么来”，那就是“胡来”。

如果是那样，我们共产党人，与李自成究竟还有什么区别？

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以上三种左的错误，必须立即纠正。

毛泽东在这里批评的，主要就是康生。而当时的毛岸英，就在康生领导的山西临县郝家坡土改工作队里，康生是把少年时代的毛岸英和毛岸青一路从法国护送到苏联的人，但是，在郝家坡土改中，第一个造了康生左倾路线的反对的，却是毛岸英。

后来，毛泽东这样幽默地说到了毛岸英的“犯上之举”：三娘教子，现在成了子教三娘了。

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毛泽东说：必须与那些破坏党的政策和革命的原则的错误倾向做斗争，而无论这个人是谁。

什么是共产党的政策呢？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结尾，毛泽东这样强调：让我再说一遍：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是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献。

毛泽东对晋绥地区的干部说：李自成是农民起义军，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土改中的左倾路线，那就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原则的。

于是，毛泽东发出号召，必须一边土改，一边整党，一边改造中国，一边与党内的错误倾向做斗争。

1948年5月9日，毛泽东率领中央前委到达西柏坡，从这一年的9月开始，毛泽东用308封电报，指挥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

而西柏坡的中央军委作战指挥室，只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张桌子。

凡是到那里去过的人，都会油然而生这样的感慨：从此之后，世上的人们，再也不能将办不成事情，归结为客观条件不好了。

而此时的蒋介石当然也在调兵遣将，但是，蒋介石那时所发出的与其是“命令”，还不如说是哀求，蒋介石一

面封官许愿，一面哀求他的下属能够“精诚团结”，救党国一命。

但是，这种哀求，如今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

中国的上层社会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但是，历史的巨变反复告诉我们：在变局到来的时候，最不可靠的就是利益。中国的旧的上层结构，其实是最脆弱的。

一时间，飞鸟各投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国共两军的区别在于，国民党军是靠利益纠合在一起的，而共产党的军队却是靠信念组织起来的。

一支没有意志的军队，不过是乌合之众，而一个没有信念的党，必将灭亡。

这是蒋介石兵败如山倒的真正原因。

而当一群势力之徒，面对着一支正义之师的时候，其结果就是：毛泽东用三个月零十天，308封电报，便横扫了蒋介石数百万大军。

在全盘失去了中国的基层之后，蒋介石统治集团的上层也树倒猢猻散，土崩瓦解了。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发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自1927年毛泽东第一次在井冈山颁布“三大纪律，六

项注意”算起，整整20年过去了。20年——当年衣衫褴褛、走投无路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如今已经壮大为摧枯拉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20年弹指一挥间，20年没有变的是信念、是革命的意志。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信念与意志的体现。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三大战役结束，又逢元旦。

1948年12月30日夜，北国飞雪，悄然覆盖了西柏坡的农家小院，雪落长河，寂然无声。

在1949年的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毛泽东挥毫写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

那个时候，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已经不是蒋介石所代表的那个旧世界了，他开始全神贯注地思索怎样建设一个新中国、怎样缔造一个新世界。

于是，这篇文章以这样一句话开头：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而这篇文章，则是以一系列繁重的工作计划结尾的：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一九四九年所应努力求其实现的主要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将不怕任何困难团结一致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如同那些波澜壮阔的伟大乐章的最后音符，毛泽东这篇文章把千钧之重，落在了薄羽之轻之上，它使重显得更重：“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是诗一样的文字，是铁一般的规划。

毛泽东到达西柏坡之后，中央工委拦**沕沕**河水发电，使西柏坡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有电的指挥所。

《将革命进行到底》，是毛泽东在电灯下写的文章，而此前，他绝大部分文章都是在油灯下写就的。

毛泽东和共产党，从此要去创造一个现代化的中国了。

在毛泽东看来，领导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的国家，这一任务比革命更为艰巨而繁重。

这个任务是中国共产党过去不熟悉的，这条道路，是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而且，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既成的样本，供我们照抄照搬。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所面临的与其说是胜利，还不如说是考试，是空前的大考。

这是历史上最艰难的考试，因为所有的题目都是前人没有见过的，而顺利通过这场考试的人，在历史上还没有过。

鲁迅曾经感慨说：我们的前人最糊涂的地方，就是事情总拣容易的做，而把难题留给了后人。

而毛泽东则是这样的人——面对空前大考，他的性格却是题目先捡最难的作。

最难的题目是什么呢？

对于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来说，最难的就是组织现代生产与交换，而这里的关键就是货币。

货币问题，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问题。

中国历代闭关政策之核心，尤在保存货币，唐以来，皆有“金银铜铁货不得下海”、“不得出边”之禁令，这就是因为中国是个贵金属缺乏的国家，且以贵金属为币。

1567年（明隆庆元年）开始的大规模进口美洲白银政策，把中国推向了一个新时代，它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使东南沿海地区日益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心，但是，这也使得中国经济日益依附于海外白银的供应，更使得买办商人逐步取代地主阶级，成为中国社会的支配性力量。

而从1567年的白银大规模进口，到鸦片战争的纹银大规模外流，这前后共计270年的时间，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走完了宗族革命和宗族国家的旧时代，开始面临着现代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新时代，面临着现代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新问题，在这个新的革命时代里，买办阶级、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一起，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

中国现代化的根本瓶颈究竟在哪里呢？这个瓶颈，就在社会发展的组织力量之阙如。

要发展现代工业产业，关键就必须把包括农业在内的社会剩余，有组织地加以有效之投资，而这里的前提是三个：第一，社会必须有组织；第二，必须有有效的投资工具；第三，治理者必须有信用。

而1500年来，中国所缺乏的，恰恰正是这三个根本条件，它又集中体现为中国数千年来没有国家主权货币。

“货币革命”，这原本就是孙中山革命理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直到1931年国民党四大，国民党政府方才实行了“废两改元”，即废弃银两，改用国家自铸之银元。而直到1943年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国民政府方才决定废弃金属货币，发行国家信用货币。而迫于当时的情况，国民政府决定：法币汇率与英镑联系，为了照顾美国的利益，又采用了银本位制。

国民党治下的中国一盘散沙，社会毫无组织性，故税收极为困难，明确的财政预算根本无法做出，因此，国民政府只能是靠借英美两国的钱来发行法币，对待百姓，只是拉伕派捐，这样，国民党发行的法币，就不仅不是组织中国经济的手段，而更沦为了帝国主义剥削中国的工具。

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是与法币的迅速崩溃紧密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直面了中国历史上最难的考题，而这个最难的题目，就是创立现代财经和金融制度，而其核心，也就是为中国创造历史上第一个信用货币。

毛泽东成功了。

毛泽东和共产党成功地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用货币——人民币。

正是人民币的创造，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这是千秋伟业。

而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他的革命成功地把中国基层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在中国基层建立了严密的组织，从而极大地把中国农村的生产力焕发出来，更把农业的剩余组织了起来，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立足于基层的最严密的经济核算体制。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总结发言，题为《党委的工作方法》，其中第七条即“胸中有数”。

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

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不能不犯错误。

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的最大的本领，就是“胸中有数”，即靠数目字说话，要管理好一个现代化国家，就必须做到这一点。

除了组织社会的本领之外，中国共产党比中国历史上一切治理者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本身拥有巨大的信用，而这种信用，就来自人民对于中共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则在1948年达到了高潮。

社会的有组织性、执政者所拥有的高度信用，这为货币的发行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现在所需要的，就是立即建立一个有效的现代金融制度和财经制度了。

而这就是毛泽东交待给中央工委的第三个任务——而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

1947年5月，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筹备处，在邯郸冶陶镇召开华北财经会议，会议决定，立即着手进行统一全国货币、发行国家主权货币的工作。

会议决定：新的人民币将与帝国主义国家的货币完全脱钩，不以贵金属为准备金，而以解放区的收支和中国共

产党、人民政府的信用为担保。

1947年底，第一套人民币票版设计完成，它遵循了世界各国将开国领袖像印在本国银行钞票上的惯例。而当绘有毛泽东主席头像的第一套人民币设计票版报请中央审查时，毛泽东却否定了这种设计，他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现在我是党的主席，而不是政府的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

毛泽东之所以反对印他的像，大概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毛泽东平生最不爱摸的东西就是钞票，二是他反对宣传个人。

于是，董必武又组织人员重新设计，最终确定了以反映解放区劳动生产建设为票面的原则。

1948年初，董必武在西柏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家小院里，写出了极不普通的6个大字：“中国人民银行”。

1948年4月12日，华北解放区的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迁至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11号小灰楼内，实行联合办公。

1948年12月1日，这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金融史、货币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石家庄中华北大街11号宣告成立，并公开发行了第

一套人民币。

2015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人民币为世界三大储备货币。自人民币诞生起，这只用了短短的67年。这是人类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

历史学家黄仁宇说：成功发行人民币，这是共产党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之一。

从此之后，中国就能够运用货币手段，以社会剩余有组织地投资于工业和产业，从而建立起中国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则因此而奠定。黄仁宇还说，从此而后所余者，无非两点：其一，如何保持共产党的唯一信用地位；其二，在技术上不断改善中共组织社会经济的能力，特别是如何建立一个涵盖金融、保险和法律为一体的现代社会服务机制。

建立了独立自主、得到人民充分信任的货币体系，中国共产党因此便找到了组织现代社会的根本手段。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考卷，那么，在进城之前，在西柏坡这个地方，共产党就已经率先拿下了60分。

毛泽东既没有为第一套人民币题字，他更拒绝了在货币上印上他自己的像，毛泽东认为这60分根本不值得骄傲，

他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毛泽东关心的是：人民币是信用货币，而共产党怎样保持自己的信用呢？

毛泽东说，共产党的信用就来自人民的信任，要保持这种信用和信任，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与作风。

人民币是组织现代经济的手段，而共产党怎样不断改善自己组织中国社会经济的能力呢？

这种能力只能来自谦虚谨慎地学习，只能来自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不断改正自己的缺点，只能靠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我们过去不会的东西。

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壮烈的，当胜利来的如此斩钉截铁、不容置疑，以至于连反动派都不怀疑这种胜利的时候，当人民已经给共产党打了一百分，乃至一百二十分的时候，毛泽东却认为，我们充其量只有60分，要获得那未来的40分，势必将更加困难。

而保持这60分，也非常不容易，一旦失掉这60分，那就是不及格了。

伟大的胜利到来了，但是，毛泽东的脸上，却写满了严峻，他的目光里，从此更加充满了忧患。

1948年3月5日-13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中央机关伙房召开。

会前，中央警卫部队紧急拆除了伙房内的炉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则把几面鲜红的党旗挂在了四壁，如此方才挡住了烟熏火燎的痕迹。

从东北赶来的林彪带来了一张虎皮，铺在了主席台上，成为整个会场里最值钱的陈设。

毛泽东当时却这样批评林彪说：林彪同志，我看你是山大王还没当够呢！

这个朴素的会场，成为了世上最壮丽的会场。

七届二中全会与会者中，习仲勋是最年轻的一位，当时他有36岁的习仲勋，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乌兰夫是当时唯一的少数民族中央候补委员，当时他的名字是云泽。

李立三和罗迈是两个毛泽东湖南一师时代的校友，而蔡畅、罗迈则是除毛泽东外，另外两个新民学会成员。他们都当选了中央委员，出席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有34位，而蔡畅是唯一的女性中央委员。

当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时候，出席七届二中全会的中

央委员中，当年的中共一大代表只剩下了两个：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是董必武。

七届二中全会不是一次欢庆胜利的会议，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

刘少奇在3月12日大会报告发言《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中，率先带头就土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做了坦诚的自我批评。

一直拼命工作，当时已经被胃病折磨得几乎垮了刘少奇，却没有讲一分自己的功劳，反而是带头做了自我批评。那些从前线回来，一身硝烟的战将们，更是没有讲述自己的一分功劳。

唯一为自己辩解和评功摆好的人，竟然就是王明。

3月13日，毛泽东在会议总结时，集中批评了王明提出的“毛泽东主义”的提法，毛泽东说，已经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毛泽东还为党立了这样几条规矩，他说：

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

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3月5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做了主报告。毛泽东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已经由破坏旧世界，转向了建设新世界；由农村转向了城市。

从此后，怎样“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便是衡量我们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

毛泽东向全会历数了中国的“家底”：“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而如今连这个比例也达不到了。

毛泽东说，“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尽可能快地把这个比例颠倒过来，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工业国。

我们的路径就是全力以赴地发展国营经济，在节制资本的前提下，鼓励民族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大规模开展对外贸易，并把分散的农业集中起来。

今天看来，毛泽东是否兑现了他在1949年3月，在那个烟熏火燎的伙房里对历史做出的承诺呢？

莫里斯·麦斯纳用一系列毛泽东的反对者们提供的数

字说明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逝世后，一些评论家关于毛泽东主义经济遗产的著作，没有详细叙述那个时代的成就，而大谈那个时代的“不合理之处”和“不平衡状态”。不过，这些著作却披露了：在毛泽东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38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从1950年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如果从1952年算起，那就是11.3%。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而且，中国工业产量在这个期间增长的步伐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在毛泽东时代，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30%增加到72%，这反映了中国已经从一个主要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国家引人注目地变成一个比较工业化的国家。

“天翻地覆慨而慷”。

1973年11月2日夜，80岁的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了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惠特拉姆问：主席是怎样把一个弱小的中国迅速地改变为世界性力量，世界大国的？毛泽东却这样说：“我做的事很小。中国到现在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用美国总统的话讲叫作‘潜在力量’，发展

中的国家。可见我的工作不行啊！”

1949年初春三月，在一间烟熏火燎的伙房里，毛泽东以这样的话作为他的报告的结尾，他更以这样的话，预言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他说：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

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

整整40年前，16岁的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开始了他人生第一次远行，离开韶山冲，去邻县湘乡，就读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

当时，他的担子上一头是书和简单的行囊，另一头是供几天吃的口粮。

40年天翻地覆，40年弹指一挥间。

而这一次，两辆卡车就装下了中共中央的全部的家当。这些历经磨难的革命者，从那一刻起，成为了世界上最朴素的国家领导人。

遥望北京，毛泽东说：我们要赶考去了。

当时他还这样说：李大钊同志要是活着，该多好啊！大钊同志是个好人啊！没有李大钊同志引路，我还不知道在哪呢！

1918年6月，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而在北京大学，他遇到了李大钊，也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三十二年还旧国”，遥望远方，毛泽东这样自言自语：牺牲了多少好同志啊，我们这些人，不过是幸存者。

1949年3月25日下午5时，昔日长发飘飘的书生毛泽东，回到了古都北京。他随即出颐和园，至西苑。阳春三月，沙场点兵。

在北国漫天浩荡的黄沙里，当年的毛委员向四野的装甲部队挥手敬礼——而这支部队的前身，就是红一军团。

经历了漳州会战、广昌会战、湘江会战、平型关战役和辽沈大战，如今，红一军团再次集合起来，向老政委毛泽东报到。

冒着硝烟炮火，红一军团一路高举红旗，前赴后继地

走来了——“毛泽东的旗帜迎风飘扬”。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历史没有终结，而今才是迈步从头越的时刻。

那一年，毛泽东56岁。

